



歲月章回

田農·著





田英成（田農）

田農，原名田英成。1940年6月生于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祖籍福建詔安。資深報人、作家、歷史學者。

長期從事文化工作，在砂拉越出任多間華文報章主筆與總編輯。從報界退役後，在吉隆坡數間大專院校任教，講授中國近現代史，馬來西亞華人史及新聞評論等課程。

1956年開始寫作。迄今已出版著作十多部。包括、詩集、文學史、政治評論、歷史研究等。



# 歲月章回



本書由李志明文學出版基金會  
贊助出版

砂拉越華文作家協會出版



四美图（四美）

國畫。與克誠為伴。1940  
年其畫中寫滿寂寞和孤  
獨。憂鬱。悲憤。感嘆。與  
世隔絕。孤獨。悲壯。

在解放前最後的歲月，在  
抗戰中他畫過許多條幅來  
鼓舞士氣。在抗戰最艱苦  
時期，他畫過無數間天界  
的仙宮。這些仙宮是現  
在。用他的畫中人更在  
他的精神生活。



他畫過許多條幅，包  
括：四美圖、四美  
圖、四美圖、四美  
圖、四美圖。

# 歲月章回



本書由李志明文學出版基金  
贊助出版

砂拉越華文作家協會出版



# 自序

《歲月章回》所收錄的篇章，包括文學、歷史、政治與社會。時間的跨度逾二十年，深刻著歲月的痕跡。

第一輯所收的前幾篇，是我在一些研討會或講座會的講稿。另外的幾篇則是應約而撰寫的。

第二輯的多篇短文是應〈東方日報〉言論版編輯邀約的專欄文字，那時我在吉隆坡的新聞學院任教，其餘的時間則讀書寫作，日子也還過得充實。

第三輯則是悼念幾位已故朋友的文章。近年來，海內外多位朋友作古，也常感自己生命的老去。有數篇同類悼亡之作，但一時找不到剪報，只好作罷。這些年來，承多位朋友的邀約，為彼等的新著寫序，將這些序文收在這裡，以誌文字的因緣。

南京大學中文系的韓雪臨博士，乃是我在南京作研究時的舊識，她對我的兩本著作《砂拉越華人社會的變遷》及《田農文史論集》寫了兩篇評介宏文，這裡收錄其中一篇，作為友誼的紀念。

1988年之後，在詩華日報任職的十多年，盡管工作忙

迫，得長期從事編務與撰寫社論。但這段時間是我較能集中精神讀書與寫作。所寫的作品也多收集在已往出版的多本著作，包括《砂拉越華人社會的變遷》、《田農文史論集》、《砂華文學史初稿》及《政論選集》等書，另外部份的散篇文章也就是收在本書裡的。

多年來，我能盡情遨遊於書海中，讀書寫作，得感謝先室操持家務，使我無後顧之憂。不幸的是，2006年正月11日晚間，先室趙逸蘭女士病逝古晉諾瑪專科醫院，讓我悲痛至極。這些年來，生活環境已大加改善，她原可多加休養，但她竟因心臟血管阻塞而逝去，令家人悲痛萬分。本書的出版謹此紀念已故妻子，希望她在天之靈安息。

本書出版多承吳岸兄鼓勵。老報人朱自存先生封面題字，謹此一併致謝。

2006年4月

于砂拉越美里雅京花園



# 目 錄

## 自序

### 第一輯

- 1** 戰后馬華文學創作的時代精神（1946-1965）
- 13** 南洋華人抗日救亡與民族主義運動成長之研究
- 26** 砂拉越的福州人 - -  
一個海外華人族群的社會考察
- 39** 成邦江的開埠與發展
- 46** 砂拉越客家社團組織的考察
- 54** 砂拉越華文報業的坎坷路

### 第二輯

- 59** 重現歷史的真相  
～《林清祥和他的時代》評介～
- 62** 文化與商務的結合
- 65** 新加坡偽西方社會的困惑
- 68**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新氣象
- 71** 胡風與知識份子的節操
- 74** 砂拉越華人史研究
- 78** 維新改良與革命
- 82** 基督教與新福州壟場
- 86** 沙巴津僑村：一個華北移民村莊
- 89** 歷史人物的評價與翻案
- 93** 極左思潮政策的危害
- 97** 城市發展與文化建設

### 第三輯

- 101** 天涯何處覓知音  
～悼巍明～
- 104** 悼林廣明
- 107** 竹的懷想  
～記中國老作艾煊
- 111** 哲人其萎，我懷何如  
～追悼房年勝兄～
- 114** 追懷劉子政先生
- 117** 開拓“華族研究”新領域  
- 序《砂拉越華族史論集》
- 121** 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  
～序饒尚東博士著《海外華人問題研究文集》
- 125** 理想者與實踐者，彰顯知識份子的本色  
～序沈觀仰著《野地裡的政治獨白》
- 128** 對人類社會關懷的交匯  
～序嚴建安著《盡在我言中》
- 131** 土地改革與農業生產  
～序黃孟祚著《邁向永續農耕》
- 134** 序徐然著《牛場村雜筆》
- 137** 放眼紅塵，不應有淚  
～序許敬平散文集《紅塵有淚》
- 140** 在荒野中開出文學之花  
～序晨露散文集《荒野裡的璀璨》
- 143** 從廟宇古蹟追尋華人社會的根  
～序陳漱石博士、周澤南合著《追根·探緣》
- 146** 序蔡宗祥著《伊班族歷史與民俗》

- 148** 衝出雲霧，迎向朝陽  
～序煜煜散文集《迎向朝陽》
- 151** 序黑岩著《各舉門神的風采》
- 153** 不容青史盡成灰  
～序于東著《風雷激蕩的歲月》
- 156** 序方竹詩集《明月石上流》
- 158** 序何春萍評論集《萍水相逢》
- 160** 序張野波著《風水叢談》
- 162** 中汶歷史淵源的見證  
～為南京文物局長楊新華教授《汶萊》書序

## 附 錄

- 165** 讓歷史告訴現在和未來  
——讀田著《砂拉越華人社會的變遷》  
～韓雪臨博士（南京）





戰後馬華文學創作的時代精神  
(1946-1965)

第



輯

101	《...》	...	101
102	《...》	...	102
103	《...》	...	103
104	《...》	...	104
105	《...》	...	105
106	《...》	...	106
107	《...》	...	107
108	《...》	...	108
109	《...》	...	109
110	《...》	...	110
111	《...》	...	111
112	《...》	...	112
113	《...》	...	113
114	《...》	...	114
115	《...》	...	115
116	《...》	...	116
117	《...》	...	117
118	《...》	...	118
119	《...》	...	119
120	《...》	...	120
121	《...》	...	121
122	《...》	...	122
123	《...》	...	123
124	《...》	...	124
125	《...》	...	125
126	《...》	...	126
127	《...》	...	127
128	《...》	...	128
129	《...》	...	129
130	《...》	...	130
131	《...》	...	131
132	《...》	...	132
133	《...》	...	133
134	《...》	...	134
135	《...》	...	135
136	《...》	...	136
137	《...》	...	137
138	《...》	...	138
139	《...》	...	139
140	《...》	...	140
141	《...》	...	141
142	《...》	...	142
143	《...》	...	143
144	《...》	...	144
145	《...》	...	145



附 錄

102

# 戰後馬華文學創作的時代精神 （1946-1965）



（一）

馬華文學的發展已走過八十多年崎嶇的歷史路程，它發端於1919年，與中國五四運動步伐幾乎一致。方修在論述馬華文學時，他所包括的地區是新加坡、馬來亞及北婆羅洲（砂拉越與沙巴）。這樣的地區划分在1965年以前是合理的。砂拉越與沙巴在1963年9月時與馬來半島及新加坡組成馬來西亞聯邦，但新加坡已在1965年8月脫離馬來西亞成為一個獨立國。

本文所論述的年限即是二戰之後1946-1965年，也即是新馬尚未分家時的馬華文學。雖然砂拉越華文文學（砂華文學）包括在馬華文學範圍內，但砂華文學的發展顯然有其獨特的一面（注1）。當馬華文學在1957年處於低潮期，但砂

---

注1：參閱田農著《砂華文學史初稿》1995年，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出版

華文學卻是成長而至高潮期。

日本在1941年12月發動太平洋戰爭，1945年8月投降，結束了三年八個月的戰亂與苦難。在日本三年多的殘酷統治下，新馬婆人民慘遭屠殺，無辜喪失生命的不計其數。日本投降后，英軍隨即在9月重新占領新馬並恢復殖民統治。可是英殖民主義這時已難以再憑借軍力維持其統治的合法性。1946年，北婆羅洲（砂拉越與沙巴）地區也正式成為英國殖民地。

戰后亞非拉殖民地國家爭取獨立運動，一波接一波震撼了西方殖民帝國。新馬婆人民經過抗日浴血戰鬥，民族解放的意識已經覺醒，尋求獨立自主的運動隨即熱烈展開。

二戰后的新馬婆華人，在國家認同意識上有了根本的改變，把自己的命運和他們所生長土地緊密地聯系，視自己為這國土的主人，開始放棄中國籍的海外公民。他們積極通過政治運動與文化運動，為爭取新馬及砂拉越的獨立而鬥爭。這種國家認同意識的轉變明顯的反映在馬華文學各種的文學作品中。

就戰后這個歷史階段而言，反殖民主義爭取獨立自主強調愛國主義是這一時期馬華文學的思想主潮。早年南來的文藝工作者，不少被逼返回中國，新一代的寫作人不斷湧現，戰前的僑民意識被新的思想所取代。

## （二）

戰後二十年馬華文學創作的收獲頗豐，在新馬兩地出版的小說單行本計有290部之多，詩歌70多部，散文達90多部，劇本的產量較少。砂拉越與沙巴大多數寫作人的作品也多在新馬印刷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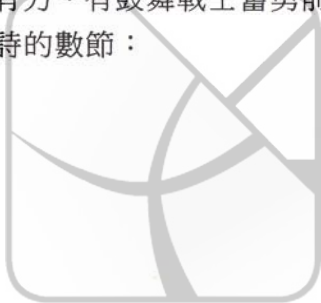
詩歌是這個時期表現比較突出的文學創作部分。它比較能敏銳地體現時代精神。新進寫作人的迅速成長，以及老一輩詩人積極創作，展現了戰后詩歌創作一股新風貌。

在詩歌創作隊伍中人才湧現，鐵戈、米軍、周燾、杜紅、鐘祺、馬陽、魯彬、范北羚、原甸、槐華、吳岸、柳北岸、威北華、堅石等，都是這一時期詩歌創作具有成就者。

這裡舉鐵戈的詩為例。鐵戈的詩集《在旗下》出版於1947年，他的詩仿似中國詩人田間及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風格。詩句沉重、有力、有鼓舞戰士奮勇前進的激昂。這裡引述《在旗下》一詩的數節：

每天  
    每天，  
我在旗下，  
    跑著……

在這兒  
我靜靜地傾聽：  
地球的嘆息，  
向往著：  
人類底  
    呼喊，  
戰爭底  
    警笛；  
在這兒  
我在注視



憤恨的烈焰洪流般奔騰的  
旗幟的波浪……

旗下的路，  
是那麼美麗呵！

旗下的路，  
是倔強的呵！

旗下的路  
是壯健的呵！

旗下的路  
跑著一支  
最龐大的隊伍呵！



在〈我們是誰〉這首詩的開頭，作者寫下：

我們是誰  
我們是  
赤道底土地上  
    生長的孩子！  
我們是誰  
我們是  
    被鐐拷鎖住的  
    苦難的人民！

《在旗下》（注2）是戰後馬華詩壇的第一本詩集。鐵戈的詩充滿著熱愛土地，熱愛人民的激情。讀他的詩就像看到一個熾熱燃燒著的生命。而鐵戈最後也為理想而獻出了生命，在五十年代中逝世。

二戰後，新一代年輕作者對祖國的共同認識，源于民族意識的覺醒，源于反殖民主義爭取獨立運動的展開。這時期新馬婆客觀環境有了頗大的變化，左翼政黨發動的政治鬥爭震撼了殖民地政權，特別是在新加坡這個以華人人口占大多數的城市。

歌唱自己的祖國，要成為自己祖國主人翁思想，已成為這一時期新進詩人共同的心聲。請看杜紅〈我不能離開你，我的母親土地〉一詩：

我不能離開你，我的母親土地／你曾經是我們祖先的樂園，／也是我們祖先的墓地；／他們掛在椰樹上的眼淚，／已變得糖般甜，／他們藏在樹膠干中的汗滴，／已變得牛乳般粘，／他們埋在礦下的白骨／已經閃亮起來了……………

…

我不能離開你，我的母親土地，／如果有人敢來侵犯你，／如果你不把海盜當親戚；／我們也會保護你，／我們的血／將混著強盜的血，／川流不息！

---

注2：《在旗下》詩集，鐵戈著。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7年11月

同樣是表達對母親土地的熱愛，槐華的〈昨天，今天〉，（見詩集《水塔放歌》）在訴說自己曾經想北歸而后留下的內心變化時，對自己土地的熱愛。

我曾經這麼渴盼， / 飛向春花燦爛的江南； / 我又曾如此夢想，探望那維吾爾姑娘，

可是，像薄霧，像雨后的炊煙， / 我不再渴盼和夢想， / 我不再渴盼和夢想……

我怎能忘記母親的恩情？ / 我怎能忘記遠離並肩作戰的伙伴？ / 呵！愿那向往的心…… / 變成向日葵，變成迎春花，為這綠色的膠林撒上繽紛的彩霞……

槐華的詩作於1958年，這正是新加坡政治風起雲湧的時期。對自己出生國土的熱愛，顯示了認同的轉變，這裡節錄砂拉越詩人吳岸寫於1957年〈祖國〉一詩（引自《盾上的詩篇》）。

你的祖國曾是我夢里的天堂， / 你一次又一次地要我記住， / 那里的泥土埋著祖宗的枯骨， / 我永遠記得——可是母親，再見了！

我的祖國也在向我呼喚， / 她在我腳下，不在彼岸 / 這椰風蕉雨的炎熱的土地呵 / ！這狂濤衝擊著的陰暗的海島呵！

我是個身心強健的青年， / 準備為我的祖國獻身； / 祖宗的骨埋在他們的鄉土里， / 我的骨要埋在我的鄉土里！

再見了，我的親愛的母親。 / 輪船消失在河流的遠方， / 擁擠的碼頭只剩下一個青年， / 只有河水依然在激蕩！

吳岸的詩表達了母子兩代對祖國立場的不同，年輕的一代選擇獻身自己生長的國土。

對砂拉越的熱愛，另一詩人寫下這樣的詩句；例如吳弢的〈我是砂拉越人〉。

我是砂拉越人，／我在這裡土生土長，／她是孕育過我的母親／在她豐腴的處女地上，／有著數不盡的寶藏，／高的山來低的谷，／美的平原麗的沃壤，還有伸展／在赤道邊緣的廣漠膠林……

詩中除了蘊涵濃厚的鄉土之情，也刻劃了這一塊土地的獨特色彩。（注3）

五十年代時期，詩歌創作者不論是身居馬來亞、新加坡或砂拉越，他們的詩表達對祖國土地的贊美，對人民的熱愛，以及對殖民者的鬥爭。詩中所具有的社會意識高度顯現出詩歌創作的時代精神。

### （三）

戰後馬華文學創作中，以小說的收穫最為豐富。就創作形式來說，詩的表現往往較為激情，而小說所觸及題材非常廣泛。

戰前馬華文學作品，因為作家大多是從中國南來，因而

---

注3：此詩寫於1956年10月，刊於新聞報副刊〈椰風〉。引自黃妃著《反殖時期的砂華文學》。2002年出版

具有強烈的僑民意識，作品所反映的多數是中國的人與事，鮮有本地色彩。這一時期的作品可稱之為“僑民文藝”。

在1947-1948年間，新馬文壇上展開一場波瀾壯闊有關“馬華文藝”與“僑民文藝”的論爭。在這場論爭之后，才確立了馬華文藝不該只是中國文藝的一個支流，而是應具有它的地方色彩與思想內涵，要具有本身的獨特性。這場論爭稱之為“馬華文藝獨特性”的論爭，之后“僑民文藝”才正式退位給“馬華文藝”。這個思想意識的轉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當文藝工作者認清了文藝的服務對象之後，才能寫出具有新馬意識的作品，文藝作品才能具有更強的生命力。

戰後二十年，新馬華文長篇小說共出版8部，苗秀的《火浪》、韋暈的《淺灘》、林參天的《熱瘴》、方北方的《遲亮的早晨》、《剎那的正午》、趙戎的《在馬六甲海峽》、李汝琳的《漩渦》與李過的《浮動地獄》。

中篇小說的數量很多，短篇小說集更多達一百七十多部。這二十年新馬華文小說不僅數量豐富，其質量也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

戰後馬華文學的創作精神，首先是現實主義傳統的繼承與發揚。我們可以說，不論是戰前或戰后，馬華文學的創作及其思想意識都深受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即文學與社會的緊密結合。由於戰后新馬婆人民反侵略、反殖民統治、反封建意識的提高，作家更明確意識到文學作品社會功能的重要性，自覺地堅持文學反映現實社會生活、反映人生，引導人生的歷史使命。

日本投降後，馬華作家很快的以亢奮的精神努力創作，隊伍也日益壯大。戰前已開始創作的作家，這時期表現更積

極，諸如韓萌、白寒、丘絮絮、苗秀、韋暈、方北方、于沫我、趙戎、姚紫等。新一代如謝克、田流、雲里風、陳全、巍萌、黃孟文、賀巾等也寫下諸多堅實的作品。

苗秀是戰后在小說創作方面最為特出的作家。他的長篇小說《火浪》在1950年完成，稍后由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

苗秀小說創作的特點是具有鮮明的時代性。他在〈寫在《火浪》前面〉寫道：“我曾經不自量力，許下宏愿，要把近三十年來，馬來亞這個殖民地社會的歷史動態刻划下來。……但我所要寫的，決不是單純的歷史記錄。我還要刻划出那貫串在這歷史事變中間的整個精神世界的洶湧波瀾，寫出人民的歡樂與痛苦，表現人民的愿望，說明他們所追求的是什麼。……這些作品結合起來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讀者能從中看到整個時代的面貌、動態。”苗秀為實現其宏愿，所作的奮鬥與努力，終于寫出《火浪》這部長篇巨作。

《火浪》這部二十多萬字長篇，是以日本法西斯軍隊侵略馬來亞時期為背景，在大戰前夕及戰爭爆發后新加坡各階層人民的生活和他們思想感情的變化。他們其中有堅強的抗日份子，進步的文化人，熱血青年，也有苟全性命于亂世的小市民，代表反動勢力頭家，出賣同胞的漢奸等。作者歌頌了光明的一面，也批判了丑惡的一面。作品展示一幅幅血淋淋民族苦難圖，日軍的凶殘，抗日志士的勇敢，為后人留下一幅真實的歷史畫卷。

同一時期，苗秀的中篇小說《年代和青春》，也以淪陷初期的新加坡社會為背景，寫出日本侵略者的凶殘，抗日青年男女如何潛入地下，英勇地與法西斯進行鬥爭。之後的《夜殘》（1964年）及《小城憂郁》也以抗日戰爭為題材，描

寫淪陷期城市地下工作者及他們可歌可泣的英勇行為。

苗秀的小說創作題材是多樣化的，中篇小說《新加坡屋頂下》，揭示了戰后新加坡殖民地社會底層人民的畸形生活，以一個妓女和扒手的故事，暴露了社會的黑暗與罪惡，給予這個社會進行批判。

苗秀的著作豐富，另有短篇小說集《旅愁》、《邊鼓》、《紅霧》、《第十六個》等。文藝理論《文藝與生活》與《馬華文學史話》。他長期在文化教育界工作，七十年代曾任南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1980年逝世。

這裡應該簡述年輕一代新進寫作人的小說。五十年代，新馬的政治局勢正處於激變時期，學生運動與工人運動熱烈展開，給文學創作帶來多姿多彩的內容。這時期寫作界新人為數眾多，大都是土生土長由華文教育培養出來的青年作者。賀巾是其中特出者。他的《青春曲》也是這時期的名篇。

《青春曲》是個三萬字的短篇，內容刻劃了一個在當時是屬於新的類型的中學生形象。這個中學生叫馬賓，他的父親是一位汽車司機，抗戰時期赴中國參加后方的運輸隊，犧牲了生命。馬賓和他的寡母和妹妹住在一個貧民窟，靠著每天清晨派報紙來維持一家的生活和自己的學雜費。這個全班上最窮苦的學生，卻是一個骨頭最硬的青年，始終拒絕同學們的慈善接濟，靠自己的勞力來維持家庭生活與學習。他刻苦自愛、力求上進、關心時局、關心大夥兒的學習與進步。他致力於新加坡中學生的重新聯合，決心打破人為的隔離。他也熱心幫助個別同學搞好功課，搞通思想，連自己病倒了還是想著別人的事情。一個想逃避現實到中國去的女同學張燕，就在他的關懷與幫助下逐漸覺醒，而積極起來參與學



生組織工作。

賀巾同時期的小說《沈郁蘭同學》以及稍后的《青青草》都頗受讀者矚目，引起評論界注目。賀巾原名林金泉，九十年代在泰馬邊境還寫下不少新的篇章。

在砂拉越，五十年代中以后的文學創作可以說進入成長期。數年間文學作品不論是小說、詩歌、散文或劇本，呈現一片繁榮，寫作者倍出。巍萌是這一時期最主要的小說作者。由於作者出身農村，對農村生活較為熟悉。他的作品也多反映農人的生活，但不少篇章也反映知識份子的出路、戀愛與工作。〈魯素英〉是他這一時期最突出的短篇小說。

這篇一萬多字的小說，寫於一九五六年。小說中的主人翁是作者筆下女性解放的象徵，魯素英擺脫了傳統女性的任勞任怨，自顧自憐的形象，能在困難的境遇下自立自強。她與父親在思想觀念上的衝突激發了她出走，反映了那個時代年輕人對舊社會的鬥爭，以及對新生活的追求。

巍萌此后還出版了多部短篇小說集，諸如《女記者》、《狂風暴雨》、《聞人》、《微波》及《紅毛丹成熟的時候》等。巍萌不幸於1986年5月逝世。


這時期砂拉越還有許多年輕寫作者寫出反映社會現實、工農生活以及知識份子追求理想的作品。

## 結 論

戰後二十年是新馬婆社會由日軍侵略到恢復殖民地統治，而后走向獨立的過渡時期。這是一個風雲激蕩的時代，一方面是舊社會垂死的掙扎，一方面是為新社會而鬥爭。作

家不可逃避地生活在迅速變遷的時代，並以其作品反映了這個時代的面貌。這也是馬華文學從中國文學的支流走向獨立發展的過程。

時代賦予作家的任務，反映了這個時代的現實生活。儘管這時期的作品在藝術上仍多有不足之處，但作品多能顯現出時代精神。文學的抒寫固然應該更寬廣、更多元，不能只限於一個調子，才能百花齊放。但應該強調的是，脫離時代，不具社會意識的作品，其生命力也隨之薄弱。



2005年8月2日


#### 參考資料：

- (1) 馬華新文學大系，戰後（2）  
方修編，新加坡世界書局印行，1979年
- (2) 新馬華文文學大系，小說（2）  
苗秀編選，教育出版社印行
- (3) 新馬華文文學大系，史料  
趙戎編選，教育出版社印行
- (4) 新馬華文文學大系，詩歌  
周燦編選，教育出版社印行

#### 附記：

2005年8月間，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舉辦一項研討會，本文乃作者受邀發表的論文。

# 南洋華人抗日救亡與 民族主義運動成長之研究



## 一. 緒言

今年（2005年）是二戰結束的六十週年，也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與東南亞戰敗投降之後的六十週年。這個日子帶給世人的歡欣，也勾起幾許痛苦的回憶。日本是二戰之前的亞洲強國，在其擴張領土以掠奪資源的國策下，不斷向其近鄰的中國、韓國以及東南亞國家發動侵略戰爭。1895年甲午之戰距離現在已超過一個世紀，日本以其船堅厲炮侵略中國，戰敗後的中國割地賠款，加深了近代史上中國屈辱苦難的日子。近入二十世紀，日本更肆無忌憚地對中國加強侵略。1931年9.18侵佔東北，導致中國陷入14年之苦戰。1937年7.7抗戰是中國人團結醒覺的日子，抗日救亡運動在中國大地上展開。1941年杪，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對東南亞多個國家展開殘酷的迫害，造成史無前例的傷亡，至今仍留下創痛記憶。

東南亞國家是海外華人移民群最多的區域，新加坡、馬來亞、婆羅洲三邦、印尼、菲律賓在二戰時都遭受日本的侵略。本文以星、馬、婆作為研究對象，並藉此探討戰後民族主義意識的成長，追求殖民地解放獨立的鬥爭運動。

## 二. 日本發動侵華與東南亞華人的反應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是激發海內外華人反日情緒的基本原因；而華人的反日救亡運動，又成為日軍鎮壓與屠殺華人的藉口。在新中國成立前，星馬婆華人基本上認同中國國民，因此抗日救國乃成為東南亞華人普遍的政治行為。所以1937年7.7中國全面抗日之後，星馬婆華人展開的抗日救亡運動乃是自然與直接的反應。

在祖國的召喚下，海外華人義憤填膺。星馬華人抗日援華運動便發展至最高階段。1937年8月9日起，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發起抵制日貨運動。8月15日成立“新加坡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委員會”（簡稱“籌賑會”），公推陳嘉庚為主席。1938年10月10日更擴大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總會”，其成員包括新加坡、馬來亞、英屬婆羅洲、印尼、泰國、菲律賓、越南等國家。籌賑總會設於新加坡。“總會”的成立使抗日援華行動步驟統一，抗日情緒更為高昂。

在極端困難情況下，籌賑會積極捐獻物資予中國國民政府。

下表為民國28年、29年及30年中籌賑成績概況：

区域	华侨人口数	每月平均义款
菲律賓	十四萬	七十萬元
馬來亞（包括新加坡）	二百三十萬	四百二十萬元
緬甸	四十五萬	五十四萬元
印尼	一百六十萬	一百六十萬元
越南	四十五萬	二十餘萬元
英屬婆羅洲		十餘萬元
共计		七百三十四萬元

另據1938年10月南僑大會各地代表口頭報告，砂拉越三個城鎮義捐國幣如下：

	义捐国币	公債
古晉	300,000.00	150,000.00
詩巫	300,000.00	
美里	60,091.91	

其他：1939，1940，1941年數目不詳。

從以上表中，可以看出星馬華僑是捐獻最多，英屬婆羅洲三邦當時華人人口不多，但也落力捐獻。

南僑總會成立後不久，就在各地設立分會68處，其中設於新加坡與馬來亞者計有20處（注1）。砂拉越古晉、詩巫、美里、沙巴（北婆羅洲）之亞庇、山打根及納閩皆有設立分會。義捐及公債的籌募工作積極進行。1942年1月以後，因日軍入侵，完全停止（注2）。

統計籌募多少，據僑務委員會的記錄，1944年底收到全

部海外華人義捐國幣近7億4千萬元，認捐愛國公債至1940年1月為2.5億元（注3）。星馬地區據不完全統計，共籌國幣約9,285萬元。就整個南洋華人而言，星馬地區的捐款實居第一位。

於籌款之外，南僑總會還應國民政府之請求，供應急需之大宗藥品，如金雞納霜、仁丹等，以及戰時物資。

至於人力之投入，主要表現於支援機工與返國從軍兩方面。1938年秋，滇緬路通車，需要大量司機與修機工人，南僑總會乃於1939年2月7日發出通告，數月間應徵者3,192人，其中2,654人於8月前，分9批由馬來亞經越南往昆明，538人則分6批由仰光往昆明。其中砂拉越回國青年機工計共76人參加，反映出海外華人積極參與抗日救亡的不屈行動。

總之，七七事變之後的星馬婆華人，明知南洋有被日本侵占的可能，仍然加強團結，或捐獻物資藥品，或返國從軍效命，或在當地抵制日貨，癱瘓日僑經濟。不惜因此而遭受饑寒，入獄之災，表現出不屈的精神，這顯然是南僑總會領袖諸如陳嘉庚等人以及各埠國府領事，以及華僑抗敵後援會等地下組織所共同策動的。因此，不僅引起殖民地政府之警惕，也引起日本之憎惡，成為日軍佔領星馬婆后屠殺華人与剝削華人之藉口。

### 三. 日軍對華人的暴行與勒索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國主義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同日，日本軍隊在泰南北大年、宋卡、馬來亞吉蘭丹哥打峇魯及登嘉樓等海岸登陸，並轟炸新加坡。1942年2

月8日，日軍強渡星馬海峽，星馬完全淪陷，為時不過70天。日軍同時攻占英屬婆羅洲之砂拉越與沙巴，這是星馬婆華人更大災難的開始。直到日軍投降，為時三年八個月。

### 日本的“華僑政策”

日本在發動太平洋侵略戰爭時，提出所謂“大東亞共榮圈”，這完全是一個騙局，實際上是推行其帝國主義與種族主義，而中國人民及南洋華人是所受迫害的族群。

日軍攻占馬來亞遭遇華人頑強抵抗，攻陷新加坡後，便在全馬展開大逮捕、大屠殺、大掠奪行動。有關日軍這方面的舉動被認為是日本人蓄意已久對華種族歧視政策造成的。其中“華僑對策綱領”訂下的兩點基本策略：

一．誘使華僑和日軍經濟合作，並利用華僑的商業才幹，以期實現日本的經濟目標；

二．採取一項絕對適合和堅決行動對付有害於我們的華僑，以便展示我們的威力。（注4）

日寇在展示其威力行動中，對華人所採取就是殺戮政策，星馬檢證集體屠殺對象，即依此綱領進行。日軍占領星馬後，主要採取以馬來人制華人的政策，留美日本學人明石陽至（Yoji Akashi）在其《日本對馬來亞華僑政策》一文中指出：“勝利的日軍開進了新加坡，全馬淪陷，馬來人和印度人雖感到震驚，但卻很欣喜，當上下奉文將軍徵服部隊入城時，他們都表示歡迎。然而對絕大多數華僑來說，一種不定的空氣卻沉重地壓在他們頭上。……就在局面混亂不清，和有關日本人將如何對付華僑的各種謠言中，華僑社會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注5）

日軍之敵視華人態度，固然與華人之愛國運動有關，但日軍如此之屠殺華人只能視為一種獸性的表現。

日軍之暴行罄竹難書，此舉出其中之一二。

### 1. 星馬檢證大屠殺

占領星馬後，日軍即展開瘋狂的肅清行動。並為撲滅抗日力量和鎮壓民眾，在全馬各地實施“大檢證”，主要肅清對象為：

- (1) 華僑義勇軍
- (2) 抗日份子
- (3) 共產黨員
- (4) 籌賑會成員和資助抗日的份子。

所謂肅清行動，幾與“南京大屠殺”之殘酷手段同出一轍。在新加坡大檢證行動中，被無辜殺害者數以萬計。戰後1947年審訊時，日本同盟社隨軍記者日盛隆夫的書面供證說日軍參謀部計劃屠殺5萬名華僑，但在屠殺半數後停止。1942年版《朝日東亞年報》則報導有7萬人被檢證。

全馬各城鎮“大檢證”中，檳城、柔佛新山遭殺害者最多，而華人婦女遭奸殺者，不計其數。

### 2. 五千萬元“奉納金”

日寇不僅要華人的生命，亦要華人的錢財。日軍徵戰與殺戮二個月後，星馬的經濟已完全破產，經濟活動停頓。作為南洋經濟重要力量的華僑，成為日軍敲詐勒索的主要對象。他們隨意封閉華人的工廠、商店、礦場等，任意沒收華僑的物資、財產，並不顧華僑的死活，向華僑社會勒索巨



款。其中，使用手段最卑鄙、索取金額數目最大的，是所謂“奉納金”。

“奉納金”計劃是由當時駐馬日軍軍政部長渡邊及其屬員高瀨策劃。當時，星馬居民經過“大檢證”這場浩劫，萬念俱灰，不得不任人宰割。幾乎所有知名領袖，均被拘捕。日軍對僑領施加種種壓力，通過他們迫使華僑於4月20日前奉納五千萬元（叻幣），以助軍費。但屆時所籌得金額只略超過半數，其餘則以財產向日本橫濱正金銀行抵押。這是日軍佔領星馬後最初三個月的主要財源。但日軍司令官山下奉文尚未滿意，對華人說，這筆錢絕不能贖過去支持英國及重慶政府的“罪行”，必須完全效忠於日本才行。這是日軍要華人的生命與金錢，還要華人效忠侵略者。

在婆羅洲三邦，日軍同樣對華人施於各種殘酷的暴行，並要華人奉獻金錢，榨取所謂“國防金”、“人頭稅”等。在死神威脅下，不少華人變賣產業，以應付日軍搜刮。

日寇在大屠殺及搜刮奉納金之後，日僑大批湧入星馬等地，很快地控制了歐洲商人及華人的財產。三井、三菱、石原等大企業壟斷了主要工業，把華人逐出商業領域，控制了物品價格，物價於是飛揚高漲，人民更是苦不堪言。

總之，日軍占領星馬婆期間，華人族群遭到最大的迫害。但其作用反激起華人更強的抗日情緒。明石陽至在其論文中指出：“新加坡淪陷後，日軍所採取一項報復行動，就是對華僑社會進行一次肅清，這一次的殘酷肅清給華僑社會留下一道無法消除的深邃傷痕，結果驅使許多華僑投入共產黨支配的游擊隊懷抱。”

南洋的抗日救亡，以及星馬婆華人的抗日，不僅是民族

主義的意識，更是對侵略者殘酷鎮壓的一種反抗。

#### 四. 展開武裝抗日鬥爭

日軍入侵星馬婆後，抗日運動也達至另一高潮。馬來亞共產黨隨即提出“行動起來，武裝起來，抗日衛馬”的號召，並致函新加坡總督湯姆士建議合作抗日。

華人在抗日運動永遠站在第一線，新加坡成立“星馬義勇軍”。這支軍隊配備十分簡陋，也只受過短期的軍訓，但它卻在英軍撤退後，擔負起多重艱巨任務。1942年2月5日英軍投降，新加坡淪陷，義勇軍迅速轉入地下，轉移至馬來半島參加抗日軍。

馬來亞共產黨在日軍入侵時，即已組織起來，建立起抗日游擊隊。1942年5月30日，馬共中央作出分析，申言“馬來亞民族解放必須先驅逐日本法西斯”，同時制定三大基本任務：

(一) 建立馬來亞各族抗日統一陣線，爭取馬來亞民主共和國實現，為蘇聯中國勝利而鬥爭到底；

(二) 聯合遠東各被壓迫民族，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蒂，爭取遠東各民族獨立解放而鬥爭；

(三) 擁護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在三年零八個月中，依據新馬僑友會的前抗日軍領導人所記錄，人民抗日軍與日軍作戰超過三百四十次，其中主動襲擊日軍超過兩百次。可以說，馬共所組織起來的抗日軍是一股最重要的武裝抗日力量，給予日本侵略重創。

另一方面，馬共與聯軍一三六部隊曾有過緊密的合作。

聯軍的代表戴維斯、查普曼和林謀盛與馬共取得協議，協議言明馬共及抗日軍接受聯軍的指揮，聯軍提供軍訓及軍費補助，供應武器彈藥等配備。抗日軍協助聯軍反攻。

聯軍136部隊，其實是一支情報部隊，並非作戰部隊。從1945年5月始至日本投降為止，136部隊總共只有400多人分布於全馬各州，部份駐在抗日軍中的136部隊人員充當抗日軍教官。3個月後，日軍遽然投降。136部隊的部署未曾發揮預期作用。

除了馬共組織的人民抗日軍，國民黨人亦組織了三組游擊隊，稱為華僑抗日軍（簡稱華抗）。分布在泰馬邊境的霹靂、吉蘭丹山區作戰，人數約400多人。華僑抗日軍原由前中國十九路軍來馬軍官與當地華人所組織的。1942年與洪門游擊隊合并，增強了作戰的力量。

當日軍於1941年杪入侵婆羅洲島時，砂拉越與沙巴一樣遭受到殘酷的迫害。在砂拉越，一樣有零星的抗日游擊隊，打擊日軍的銳氣。在沙巴，北婆羅洲神山游擊隊起義事件，更是一件震撼人心的義舉。

1943年4月，神山游擊隊司令郭益南等人與蘇祿群島打維打推美軍取得聯繫，得到一批武器，回到亞庇後建立了以華僑為主體抗日游擊隊，命名為神山游擊隊。1943年10月，日軍準備徵調大批青年壯丁，並驅使女青年到日軍駐地充當軍妓，引起龐大群眾憤怒。此時恰好日軍主力抽調到南方，亞庇防守空虛，神山游擊隊在郭益南領導下乘機起義。10月9日晚，100多名游擊隊員持械向亞庇進發，攻占敵人憲兵部、警察局，焚燒敵人的碼頭和倉庫，殲滅敵軍三十多人，還繳獲一批武器，取得了輝煌戰果。幾日後，日軍從古

晉、汶萊等埠調集大兵救援，向游擊隊反攻。游擊隊糧盡彈乏，後無救濟，乃退匿大山林忍饑挨餓。四個月後，終以山窮水盡，無法對抗，為日軍擊潰。這次起義之後共有千人被捕，數百人遭殺害。郭益南也英勇就義。神山游擊隊的起義雖告失敗，但他們的英勇壯舉卻在華僑抗日鬥爭史上寫下光輝的一頁。

## 五. 戰後反殖鬥爭與民族主義運動

日軍南侵，抗日運動及武裝抗日以華人為主，華人族群受害最大。二戰後，當英國人重返星馬及婆羅洲攫取統治權時，華人再度遭到迫害。殖民統治者懷疑為共產黨的華人，將他們逮捕監禁或被驅逐到中國去，英國人視星馬婆為他們永久利益的所在地。因此在砂拉越甚至有“不需要人士”的法令，驅逐原本土生土長的華裔青年。高壓的統治逼使馬共在1948年實施“緊急法令”後重返森林，進行游擊戰。而砂拉越的共產組織也在1962年杪發動武裝鬥爭，對抗殖民地政權。

日本人入侵星馬婆時，殖民地政府並未給予當地人民保護。實際上，當新加坡的白思華將軍簽下投降書時，英國的海上霸權已成為過去。但日本投降後，他們又強行回到這塊他們統治過的地方，希望再過光輝的日子。

戰後，東南亞諸多國家紛紛取得獨立，印尼、緬甸、菲律賓擺脫了殖民地統治，自行當家做主。但為何在抗日戰爭中，作出積極貢獻的星馬，英國人不愿意讓它自治或獨立呢？因此，戰後星馬婆人民展開反殖反帝，追求民族獨立的

鬥爭，不僅是一種醒覺的運動，更是民族主義運動。

戰後民族主義運動的主軸，是擺脫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自主。這一民族主義運動有兩股國際外在勢力的支持。即美國勢力和蘇聯陣營勢力，兩股勢力的運作皆基於本身政治利益的考量。蘇聯陣營借民族主義運動傳播其意識形態，擴張其影響力。因此民族主義運動往往與共產主義運動結合，以達到民族解放的目的。

美國勢力支持也在於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羅斯福總統在大戰臨終前夕的雅爾塔會議提出“民族自決”的原則，這是基於美國本身的海外幾乎已沒有殖民地，它可藉“民族自決”削弱西方那些老牌殖民帝國（英國、法國、荷蘭等）的國際勢力，為自己的西方盟主地位鋪路。而“民族自決”的口號可以在意識形態上抗衡蘇聯陣營的“民族解放”，從而發揮美國的影響力。正是“民族自決”或“民族解放”，促進了亞非拉被欺壓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星馬婆於戰後的反帝反殖，乃是民族主義運動的體現。

南洋華人的抗日運動，對日本帝國主義不斷侵略中國、殘殺中國同胞、掠奪中國資源，敵愾同仇，在海外施以人力與物力的援救，顯然已達到民族主義的高潮。當日軍侵佔自己所居住的國土，起而武裝捍衛家園，這是民族主義自然的延伸。

戰後，海外華人的國家認同有了很大的改變。即從原先認同於中國，逐漸轉向認同於居留國。由於時移勢易，海外華人為了生存與發展，逐漸疏離中國，而決意在居留國落地生根，將自己的利益與居留國的利益渾為一體。表現在行為上，把居留國視為祖國，效忠祖國，為祖國的生存與發展作

出貢獻，甚至犧牲。

這種認同的轉向，為海外華人產生了一股新的力量，特別是星馬婆華人，他們在反殖民地鬥爭所作的犧牲乃是最具體的表現。

戰後，當英國人重回星馬攫取政權，施以殖民統治，以華人為首的抗英組織號召反帝反殖的抗爭。英國人低估了反殖民統治的力量，然而終究還是放棄了它歷時百多年的殖民統治。可以肯定，民族主義思潮下的反殖鬥爭，最終取得了勝利。砂拉越和沙巴在1963年成為馬來西亞的州屬，這固然是英國人的一項陰謀，但東西馬之間仍存在一些問題，主要包括種族問題和地區關係問題。

## 六. 結論

日本侵略中國，發動太平洋戰爭，為人類製造了無數的禍端。日本戰敗投降迄今已60年，應已取得慘痛的教訓。但日本右翼份子仍然在做著軍國主義的夢，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與有良知的人民，將會結成一道堅強的鏈，給予這些右翼份子痛擊，唯有強大的反戰力量，世界才能永久和平與進步。

2005年7月7日

## 附記：

2005年7月，砂拉越詩巫中區友誼協會舉辦一項〈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週年講座會〉，本文為作者受邀發表的論文。

## 注釋從略

### 參考文獻與書籍

1. 南僑總會編：《大戰與南僑》新加坡南洋出版社（1947年）
2. 維多吧素著，劉前度譯《馬來亞華僑史》
3. 許云樵、蔡史君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  
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
4. 新馬僑友會編，《馬來亞人民抗日鬥爭史料選輯》  
香港，見證出版社（1992年）
5. 陳嘉庚：《南僑回憶錄》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46年）
6. 陳平：《我方的歷史》  
新加坡 Media Masters Pte Ltd 出版（2004年10月）
7. 尼古拉斯·塔林主編  
王士錄、賀聖達等審校《劍橋東南亞史》一、二冊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8. 陳崇智著《我與一三六部隊》海天發行與代理中心（1994年3月）

# 砂拉越的福州人

## 一個海外華人族群的社會考察



(一)

福州人(注1)是砂拉越最大的華人方言群，人數約略為20萬，佔砂州華人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強。與客家、閩南、潮州等方言群相比，他們移居砂拉越較晚。砂拉越在1840年開埠之後，客家、閩南及潮州等華人方言群，已陸續來到石隆門、古晉及成邦江數城鎮，但福州人卻遲至二十世紀初方從中國原鄉遷移詩巫。

1901年，福州籍舉人黃乃裳與砂拉越第二代白人拉者察爾斯·布洛克(Rajah Charles Brooke)簽訂一項移民協議，第一批為數76名的福州移民，從福州乘船輾轉到砂拉越的詩

---

注1：福州人，一般指的是操福州方言語系的十個縣邑。清朝時福州府轄下閩侯、長樂、閩清、古田、屏南、福清、連江、永泰、羅源及平潭諸縣邑。



巫，正式揭開了福州人移居砂拉越的序幕，隨後另兩批近千人的移民陸續抵達詩巫，成為福州社群在拉讓江流域的奠基者。在福州人抵達詩巫之前，這小鎮已有閩南及潮州籍的商人在此營生，但人數不多。因此可以說福州人移民進入詩巫，為這一地區帶來一股主要勞動力，並且由此改變了拉讓江流域的面貌。

1902年7月，詩巫省長狄遜（H. F. Deshon）曾在其報告書中如此說：「自福州籍農民首批抵達詩巫後，迄今已一年六個月，其人數千餘名。渠等之行為，足以證明渠等為政府所欲得之移民。蓋渠等之清醒頭腦、勤力、守法、成家立業之精神，此乃余所樂於報告者。」

1935年，砂拉越第三代拉者維納·布洛克（Vyner Brooke）於一封公函中，也極為稱贊「福州人為砂拉越之資產。（Foochews are the Assets of the State of Sarawak）。」

上述兩位砂拉越統治者對福州人的稱許，一定程度說明了福州人對砂拉越墾拓開發的貢獻，當然統治者們對其他華人方言群的貢獻也曾作過類似的稱贊。

砂拉越在建國之初，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來墾拓發展。在此之前，華人對東南亞諸多國家的開發所作的貢獻，是西方殖民統治者都知曉的，因此他們無不竭力從中國引進勞動者來開發這片荒蕪的土地。砂拉越第二代拉者是一個有膽識與謀略者，在雙方互利的情況下，1901年與黃乃裳訂立了農墾契約，由此引進了千多名福州籍移民，到來拉讓江流域進行農耕墾拓，這一批先行者在百年後，已繁衍了近二十萬的同籍子民，在砂拉越開闢了一片新天地。

## (二)

早年移民到南洋的華人，以福建與廣東兩省人為多。到南洋的福建省籍以閩南漳、泉二府人為主，福州人極少，馬來半島的實兆遠以福州屬居多，但人數遠不如砂拉越。黃乃裳與砂拉越統治者簽訂協議之後，集體引進了閩清、古田兩縣人，少數來自長樂、屏南等縣區。

這批南來開荒的福州人，由此在拉讓江流域的詩巫、民丹莪、及泗里街等鄉鎮從事農耕業。布洛克政權對這批移民寄予厚望，他們也為砂拉越創造了財富作出貢獻。二戰之前，福州人從事農耕為主，至到戰後，情況才有了改變。1970年代之後，福州人逐漸成為砂拉越許多城鎮的主要經濟商業的中堅力量，90年代之後，福州人幾乎控制了砂拉越大型的商貿企業，財大氣粗凌駕了其他華人方言族群。

戰前福州人由詩巫或泗里街遷移到另一鄉鎮，基本上是農業移民。他們集數十戶或少至十多戶人家，向政府申請一大片土地從事耕種。例如1920年馬魯帝蒲悅區的墾場或稍後老越區的墾場，他們申請到土地與政府簽了協約之後，即胼手胝足種植，而后形成一個新的移民區。但七十年代之後，這種農業移民的模式已轉變為商業移民的模式。許多城鎮的新店屋區，諸如美里或民都魯，業主多為福州人，他們開始在這些地區從事商業貿易，而后這些城鎮福州籍人口逐漸增加，進而改變了方言族群的社會結構與經濟形態。

以下圖表顯示福州人口分布。

1991 年砂拉越福州人口分布：

縣區	福州人數
古晉 (Kuching)	11,077
石隆門 (Bau)	83
倫樂 (Lundu)	58
三馬拉漢 (Samarahan)	126
西連 (Serian)	165
實文然 (Simunjan)	241
斯里阿曼 (Sri Aman)	2,127
魯勃安都 (Lubok Antu)	84
木中 (Betong)	183
砂拉卓 (Saratok)	451
泗里街 (Sarikei)	14,028
民那丹 (Maradong)	9,749
達羅 (Daro)	310
如樓 (Julau)	658
詩巫 (Sibu)	69,337
達叻 (Dalat)	485
木膠 (Mukah)	1,829
加拿逸 (Kanowit)	1,109
民都魯 (Bintulu)	11,992
達島 (Tatau)	1,274
加帛 (Kapit)	2,890
桑埠 (Song)	417
布拉甲 (Belaga)	990
美里 (Miri)	11,798
馬魯帝 (Marudi)	4,696
林夢 (Limbang)	2,505
老越 (Lawas)	631
巴都 (Matu)	111
<b>总数</b>	<b>149,293</b>
	(占全州華人之 33.5%)

在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資金雄厚的企業也多由福州人掌控。福州人早年南來，率多在拉讓江流域的城鎮，從事農耕活動，但為何有少部分人迅速致富，取得了巨額財富，這是海外華人族群中一個經濟發達的奇異現象。

在二戰之前，福州人開始從事伐木業，但在當時，由於木材市場不大，伐木業未能取得高額利潤。戰後這一行業仍然由福州人來操持，當閩南人與客家人逐漸退出伐木業時，多數伐木場轉讓予福州人，新的伐木場更多由他們取得。儘管這一行業有著艱辛的一面。但卻由此獲得巨額利益，迅速致富。更多同鄉由是湧進這一行業。

二戰後初期，木材業多在拉讓江下游的沼澤地帶展開伐木活動。七十年代開始，伐木活動開始朝向砂拉越的內陸和高原地帶，從而開展了砂州木材工業的新紀元。首先，在這種地區木材生產活動需要較多技術上的支援，以進行砍伐和運輸工作，同時地理上的需要，須注入巨額資金做為重型機械和器材的費用，這使得木材工業朝向專業化和科技化發展。

詩巫人向外省遷移，對木材工業向州內和州外其他地區伸展，有著密切關係。這種情況，尤見於福州人逐步遷移至沙巴、印尼、巴布亞新幾尼亞等地區。

當他們在伐木業取得利潤時，將部分資金投入房地產的發展、金融業及大規模的種植業，進行多元化的投資。再者，他們所雇用的管理人，也多是同一屬人，這樣，同一方言群就往往控制了某一行業。伐木業幾乎八成以上由福州屬人操控。

根據一項非正式調查，在砂拉越排名前十名的大集團，有九名是由福州籍人士掌控，只有一名是廣東籍人。閩南籍

與潮州籍人士的經濟優勢，自七十年代之後已風光不再。  
(注2)

企業商貿易發展，往往需要借助於銀行的借貸與融資。詩巫有兩間銀行原由福州人創設，即福華銀行（Hock Hua Bank）與公明銀行（Kong Ming Bank）。它對福州人的經濟成長具有相當的助益。福華銀行於1951年由多名福州籍商人創設，已故福州屬社團領袖陳立訓為發起人之一。初時銀行行址設於詩巫福州公會樓下，1958年方自建大廈。（注3）

銀行的營運為「貨幣資金的媒介，以信用為基礎，產生便利大眾消費，促進經濟發展、誘導資本形成，與增加貨幣供給彈性等作用，以便利財貨與勞務間的交易轉換」（注4）。商業銀行即是企業發展尋求資金援助的重要管道，福華銀行給予福州籍商人的貸款，一方面固然仍需以“信用”為基礎，但同鄉的鄉情也具有其方便之處。當這些商人發達之後，也往往會把大量資金存入福華銀行，增加其流動資金。這之間的相得益彰使福華銀行的利潤迅速增加，穩健成長。從福華銀行的成長，也反映出福州人的經濟活動，其成長與擴張的層面。奈何由於政府對銀行業政策的操弄，導致福華

---

注2：二戰前至二戰後六十年代，閩南人及潮州籍人士在古晉及詩巫從事土產（樹膠、胡椒等）出口與米糧進口，掌握了經濟優勢。由於土產出口多年來已陷於萎縮狀態，經濟優勢已難持續。

3：參閱陳立訓『福華銀行發展史』，收錄於《陳立訓七秩華誕雙慶紀念冊》。

4：參閱李孟茂『現代銀行業務論』。

銀行於數年前被兼并。

### (三)

一項值得關注與研究的課題，是基督教會對福州社群從事墾拓開發及文化教育工作的影響。

海外華人大多崇奉佛道，信奉基督教的並不多，福州社群的宗教信仰卻有其特異之處。帶領福州人移民砂拉越的黃乃裳(1849-1924)是一位頗具傳奇色彩之人物，就其一生而言，家世務農，少時半耕半讀，18歲時歸信基督，加入福州美以美會(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出任傳道，遂至福州，其後轉習八股，參加科考，中年中舉，成為閩中士紳。期間因為出身教會，故於福州參與興辦新式教育及新聞事業，貢獻甚大。

1898年，黃氏參加維新運動，倡導變法，成為福建省有數之改革家。戊戌政變失敗，黃氏南下新加坡，已有為其窮苦同鄉“辟一生活路徑”之念頭，且其時義和團反教蔓延至福建，以及福建旱災，黃氏遂親赴砂拉越勘察，並得砂拉越古晉華人領袖王長水引介，得以謁見砂拉越王察爾斯·布洛克，並簽下協議回國招募大多數具有美以美會背景之福州華工前往詩巫開墾，從而在詩巫建立新家園。

黃乃裳於1904年因故返回故里，從此不曾重返詩巫，臨行之時特將新福州墾場事務交付美國衛理公會富雅各牧師及同鄉劉家沫等人。兩人對詩巫的布道及福州墾場的墾拓並進入現代化有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富雅各牧師居功至偉。

富雅各是一位來自美國衛理公會的牧師，原籍賓州格林

鄉，曾在故鄉任教九年，是一位熱心的衛理公會會友。1898年，升任教會年議會議員。1899年奉衛理公會之派遣，前來馬來亞檳城擔任英華書院教員。1901年，福州衛理公會移民來到砂拉越詩巫後，雖然設有禮拜聚會，但是缺乏專人照料。1903年3月，富雅各從檳城被調派到詩巫，作為第一任衛理公會駐詩巫傳教士。從此開始他三十二年在詩巫的墾荒傳教工作。他在新珠山橋頭河邊搭建亞答屋一座，內設聖堂供信徒禮拜之用，此為砂拉越第一所衛理公會。同時開辦英華學校於同址，教堂與教室同建，此後成為衛理公會之傳統。富雅各之妻弼瑪麗女士，祖籍英國，父母均系自英國派往檳城之宣教士。弼瑪麗本人出生於檳城，精通馬來文，與富雅各結婚後，隨即投身砂拉越福州墾場之教會、社會及教育工作，並在1906年於詩巫創辦以後聲譽極佳的毓英女校並擔任校長。

富雅各的勤奮努力，贏得了墾民、政府及教會當局的信任、支持與愛戴，在福州墾場開發歷史中，成為最具影響力的一位重要人物。

就福州墾場的開發與發展，黃乃裳的功績，已永記史冊，但富雅各牧師往後的繼往開來，對墾場悉心努力，則也居功至偉。

教會對墾民的宣教傳道，從移民初期開始就創立了良好社會風範的基礎。尤其是禁賭博、禁鴉片大煙，新福州墾場讓人看到一個新面貌。教會更重要的是推廣教育，在詩巫鄉下的農村港門，教堂成為崇奉禮拜之用，也往往是學校的教學場所。或者是在學校的鄰近，即有教堂的建立，兩者緊密關連。筆者於九十年代末在詩巫鄉區進行訪問調查，這種情

況仍持續存在。

早年福州人居於鄉下耕作，交通不便，文化閉塞，年輕一代能在鄉間的學校讀書，衛理教會扮演了積極的角色。而衛理教會所興辦的學校也培育了許多在社會、經濟和政治上作出貢獻的人士。自七十年代以來許多福州籍人士能夠在馬來西亞新經濟政策（NEP）開放機會中，占有良好的一席不能不歸功於教會學校所提供的教育（Leigh 1988）。

我們可以這樣說，打開福州人在砂拉越開荒墾拓的歷史，就等於打開了砂拉越衛理公會在砂拉越的傳播史。衛理公會植根社會，深入文化，影響教育。而衛理教會所提供的國內外聯系不但造福了衛理宗信徒，也對砂拉越的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帶來了重大正負面衝擊（黃孟祚 2001）。

另一方面，表現在政治層面上，福州人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已日益加強。國陣成員黨的人民聯合黨，在成立初期的領導層，是以客家及閩南人為主，但自人民聯合黨加入聯合政府之後，我們可以觀察到福州人在黨內的影響力逐漸加強。由於華裔族群中福州人人口居首，特別是在拉讓江流域的城鎮，更是福州人的集中地，主導了經濟與政治權。現時砂拉越國陣成員黨中六名華族國會議員，福州籍占了4名。在州立法議會，人聯黨的華籍議員，福州屬也占有高比率。由於商業利益與政治的互動關係，靠近政權使社群的領袖更能獲得顯著的利益。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反對黨民主行動黨現時的領導層也以福州籍為主，他們在詩巫與民都魯福州人占多數的城市，獲得了最好的生存空間。在某種情況下，反對黨對執政黨的施政偏差，起了制衡與監督作用。



#### (四)

今日福州人在砂拉越，其經濟實力和政治參與表現皆有目共睹，其之能在砂拉越拓殖深耕，實有得於百年前黃乃裳之滿腔熱血與鄉梓情懷，到海外辟一新天地進而在詩巫开辟了“新福州”墾場。

砂拉越近代拓展史，華人可以說扮演著相當主要的角色。實際上，東南亞諸多國家的開發，實得力於華人的勞力與智慧。一則中國人為最能適應氣候之民族，凡最寒最熱及氣候不良之地，皆能忍受，此為地理學者所公認者。（注5）而當地土著長期處於落後環境，不懂得較先進的耕作法。二則中國人之於南洋，完全是經濟之殖民，而無政治之野心，故歐人樂為利用之。歐洲學者有言：“歐洲人獲牛，則中國人取其乳。”

黃乃裳於百年前率領同鄉移民砂拉越，想必不會料到今日福州人在砂拉越的成就。福州人對砂拉越的影響，從他們最初在拉讓江畔的詩巫建立墾場開始，拉者政府對這一群新移民是寄以厚望的。這可從戰前政府多方鼓勵福州人至各地墾拓，加以看出。隨著福州人境內遷移步伐的加快，由早期的農業移民逐步變為商業移民後，開始成為城市主要居民時，人們可以輕易察覺到福州社群對各領域所產生的影響。

以砂拉越首府古晉來說，百多年來，古晉這個城市的居民以閩南、潮州及客家人為主，傳統上被視為福州人勢力較弱的地區，即使到1970年的人口統計，福州人也只有4,896

---

注5：參閱李長傳《中國殖民史》208頁。

人。但1991年的人口統計則達到11,077之數（見1991年砂拉越人口分布圖表）。十多年來，古晉的福州人估計已超過三萬人，各行各業多有福州人參與。近年來，由於拉讓江上游峇貢水壩的建設，拉讓江流域時有水患現象，更多福州人湧往古晉購置房產，作定居的打算。古晉已開始成為福州企業家及專業人士遷移及投資的主要城市。城市社會階級的流動加速了各方言群政治與經濟結構的變動。

二戰後福州人向砂拉越各城鎮遷移，人數愈來愈多，導致許多城鎮原有社會形態的變動。華人是一個喜歡結社的民族，福州人當然不會例外，砂拉越許多大小城鎮皆有福州公會的成立，除了藉由公會組織達到自我凝聚的目標，同鄉們互相照應與生意往來也增強了他們營運作業。筆者數年前所撰之〈砂拉越福州人的移殖、經濟活動與社會組織論析〉一文中有所論述。（注6）現時越來越多福州人成為城鎮的社會領導人，由於這一方言群所具有的經濟實力，由砂拉越中區到北區的獨立中學及教育團體，也多由福州人領導。

## 結論

福州人的表現，他們勇於創業的精神，人們可以看到福州籍商人開始將業務從砂拉越擴展至馬來西亞其他州屬，甚至到印尼、澳洲及中國大陸地區作大量投資。

他們被譽為海外華人社群奮鬥的一個成功典範，已經連任23年的砂拉越首席部長泰益瑪目最近在詩巫福州人所舉行

---

注6：參閱田英成《砂拉越華人社會的變遷》頁22-41。

的一項慶典中，再度盛贊福州人的創業努力所達致的成就，但他同時作出警告年輕一代的福州人已遺忘他們先輩的艱苦奮鬥，而只坐享其成。

福州社群雖然擁有許多富豪，但我們也注意到更大部分的福州人，尤其是鄉村的農耕者，還得胼手胝足謀求溫飽。這種階級差異的懸殊，也產生了許多社會問題，尤其在詩巫這福州人的集中區域。由於在詩巫缺乏就業機會，許多人遠走他鄉謀生，以致詩巫的人口增長緩慢。一位評論者指出，有本事的福州人越來越富，沒本事普羅大眾則日趨貧困，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是一種非常惡劣有社會趨勢。

福州人的經濟成就是明顯的，他們從農業耕作，而後由木山資源所賺取的財富，對其屬人甚至整個社會的繁榮都有正面的意義。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拉讓江流域與峇南河流域，多年來無限制的砍伐開采木材的結果，已破壞了沿岸的水土保持，大量的泥沙隨著雨水沖刷流入河川，兩岸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已帶來另一個嚴重影響。

為求企業發展的“永續經營”，木山業者植林保育工作，是保護生態環境一項重要工程，這是一項涉關人類幸福的工作。福州人是砂拉越木山的主要開采者，他們負有更大的責任。在工業發展與環境保護上取得平衡，這是砂拉越人民應有的共識，亦是木山經營者歷久不衰的最佳運作模式。

2005年7月23日

#### 附記：

2005年8月中，雪蘭莪福建會館與多個鄉團聯辦一項“東南亞福建學”研討會，本文為筆者受邀與會的講稿。

## 參考資料：

### 【中文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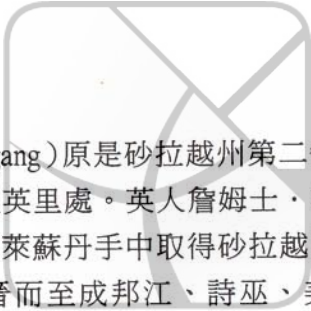
- (1) 陳康勝等譯，《婆羅洲的美以1901-1910》  
砂衛理公會華人年議會文字事業部，2001。
- (2) 林宜慧，《砂拉越福州人領導層研究》  
詩巫，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1999。
- (3) 黃孟祚，《衛理宗對砂拉越社會、經濟與政治發展影響》  
砂拉越華人年議會文字事業部，2002。
- (4) 林文聰，《八十三自述》  
中國信徒布道會（台北），1971。
- (5) 蔡增聰，《歷史的思索》  
砂拉越留台同學會詩巫分會，2004。
- (6) 田英成，《砂拉越華人社會的變遷》  
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1999。
- (7) 李長傳，《中國移殖民史》  
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1990。
- (8) 砂拉越古晉、詩巫、美里、林夢及成邦江各省縣福州公會歷年  
所出版的特刊。

### 【英文部分】

- (1) Law Yan-Pao, Report On The Foochow Chinese Of Sarawak Regional Information Office, Hong Kong 1962.
- (2) Leigh Michael, "The Spread Of Foochow Commercial Power Before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Centr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1988.
- (3) Kiu, Mee Kuok, The Diffusion Of Foochow Settlement In Sibiu-Binatang Area, Centre Sarawak 1901-1970. (Sibu: Sarawak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1997)
- (4) Ko Tee Hock, "Chinese Dialect Groups In Sarawak" Composition And Growth Between 1947 And 1983", Sarawak Gazette, Dec 1986, Vol CX11.

# 成邦江的開埠與發展

——一頁海外華人的拓殖史



成邦江(Simanggang)原是砂拉越州第二省的省會，位於峇當魯巴河口四十五英里處。英人詹姆士·布洛克(第一代拉惹)於1841年從汶萊蘇丹手中取得砂拉越的統治權后，逐漸擴張領土，由古晉而至成邦江、詩巫、美里以及最后在1905年占有了林夢省，擁有了現今砂拉越的土地面積。

1849年，詹姆士·布洛克在魯巴河支流實加蘭河口建築“詹姆士堡壘”，以防止海盜及上游伊班人的襲擊，堡壘建成后，布洛克即將峇當魯巴的省會設在實加蘭港口。這時以鄭子升為首的數位潮州籍商人，遂在堡壘附近建立了五間店屋營業，與上游一帶的土人進行物物交換的貿易。

詹姆士堡座落在江畔河口，易受潮汐山洪的泛濫以及伊班人的襲擊，詹姆士·布洛克遂於1864年遷設省會於成邦江，並建設愛麗斯堡於臨河的山崗上，原在實加蘭港口經商的潮籍商人也跟著遷移，在此開荒僻地，建立了一個以潮州人為主的小鎮，鎮上蓋有十來間亞答木料的店屋，經營日常

用品與雜貨，土人是貿易的主要對象。

成邦江開埠初期，人口稀少，1871年的人口調查，當時峇當魯巴這一省的華族人口總共只有八百零七人。小鎮的經濟主要依靠樹脂、藤等土產出口，樹膠與胡椒要到十九世紀末才有出產。隨著人口的增加，貿易流動的增長，鎮上的商店也隨之陸續增建，1872年4月1日出版的《砂拉越憲報》記載，成邦江鎮上的店屋已增至四十六間。這些店屋樓高兩層，底層做生意，樓上作為住宿與儲貨之用，商店售賣的貨物，大都是餅乾、腌制的食品以及花布之類。

砂拉越建國初期，人口稀少，詹姆士·布洛克認識到需要大量勞動力才能使砂拉越發展，中國移民於是被引進了砂拉越。第二代拉惹查爾斯·布洛克延續了這個政策，在他統治的五十年期間（1868至1917年），以優惠的移民條件從中國華南引進了大批勞工。查爾斯·布洛克在1874年8月1日的《砂拉越憲報》曾這樣寫道：“我們認為，婆羅洲未來的發展只有靠華人才能完成，這點是不應該有所懷疑的。”拉惹的副官克拉克也曾說過：“鼓勵勤勞的華人移入人口稀少的砂拉越，不但能夠保證國家繼續發展，同時這些人對國家也是有益的，……。”

在這種較為優惠的移民條件下，中國華南的勞工陸續移民砂拉越，1895年中國汕頭有一批移民到成邦江砂巫路一帶，從事種植咖啡等農作物。稍后更多潮人在同鄉族人的資助與接引下，遠涉重洋到成邦江投親謀生，成邦江遂成為砂州潮人的重地。

成邦江早年的發展與繁榮，潮州人所作出的貢獻應予肯定。史料記載，成邦江開埠后第一任華僑僑長（甲必丹）為

潮安縣劉隴鄉人劉己卯，第二、第三及第四任甲必丹為成裕商號的鄭宋興、鄭勝欽及鄭林典。成裕商號在開埠后不斷接引潮安縣禮陽鄉的族人南來墾殖經商，鄭氏族人相繼出任成邦江僑長，早年的成邦江遂有“小禮陽”的美稱，鄭氏家族不僅是地方上的大家族，他們幾乎操控了商業貿易，迄今鄭氏仍然是成邦江華人族群中最大的姓氏，族人有不少分居到鄰近的鄉鎮，諸如英吉利里及魯拔安都等。

早年華人飄洋過海，在踏足異地時，面臨的是惡劣的生活環境與疾病的侵襲，因此他們每到異地，便供奉神靈以求人畜平安、風調雨順，到成邦江拓殖的先輩也莫不如是。現時香火鼎盛的慈雲閣，早年原是一間座落在店屋后面的小廟，廟里供奉慈悲娘娘的神位。1899年，小廟被拆遷重建在魯巴河畔，供奉慈悲娘娘及金童玉女的金身。慈雲閣落成后，地方人士成立一個取名順興公司的組織，負責管理廟宇的香油及義山基地的墓葬事宜。由于成邦江是潮人的重地，順興公司的領導人幾乎全是潮屬人士。不過順興公司在1976年重新注冊，成為一個廣東人的聯誼團體，並改名為順興公會。而潮州公會也在1995年正式成立，作為潮人地緣性的組織。

隨著人口的增加，成邦江華人社會確認須要開辦華校，讓適齡兒童就讀。1930年期間，華人領袖鄭林典、鄭寶勝等潮屬先輩於是倡議成立培僑學校。培僑成立時，借用順興公司的店屋作為課室。1932年，培僑校董會發起建校計劃，進行募捐，並成立樹膠公會，徵收樹膠及日羅冬（樹枳）出口捐作為建校基金，歷經四年，培僑的建校大計在1936年落實。這間學校較后改名為華僑公立中華公學，其後再改名為

成邦江中華公學。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揮軍佔領東南亞多個國家，砂拉越同時遭到日軍侵占，成邦江改稱“志滿岸”，人民經受痛苦的生活煎熬。1945年8月日本廣島遭受原子彈轟炸，日軍投降，被日本侵略的國家由此光復。當日軍撤離成邦江時，當地曾一度處於無政府狀態，達雅人乘機登岸，聲稱要成立政府，同時要求商家施贈糧食等物品，后由華人領袖及馬來領袖調解，事件始告平息。1946年砂拉越割讓予英國，成為英國殖民地，戰后的成邦江逐步取得進展。

戰后砂拉越城鎮的變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福州人在各城鎮的擴張。福州人在二十世紀初由黃乃裳帶領集體移民到拉讓江流域，他們原是農耕移民為拉惹政府招募前來從事農業種植。早期的活動領域主要集中在拉讓江流域一帶。后來在政府鼓勵下，以及戰后社會環境的變化，這一方言社群開始向其他地區遷移，以協助農業生產。峇南河流域、魯巴河流域以及林夢省地區，陸續建立了福州人的社區。七十年代以后，木山資源的大量開發，造就了這一方言社群強勁的經濟勢力，人口也逐步由鄉區移入市區，對原有具有支配權的方言群，帶來一定的衝擊，從而改變了許多城鎮原有的人口結構，對城鎮的經濟活動也產生重大影響。

五十年代之後，成邦江華社的人口結構以及各方言群的經濟形貌也產生一定的變化。

1954年，福州人領袖江友松來到成邦江，他向政府申請土地，作為種植樹膠及其他種植業用途。當時的省長吉利賓和土地局長高緯奇商量結果，很快批准了福州人的申請，于



是大批福州人從拉讓江流域遷移到成邦江從事農耕活動，所申請的土地約五千畝，即今日宜加多路一帶上至飛機場，下至新巴務地區。1954年11月19日成邦江福州墾植公會成立，江友松出任主席，1955年12月改名為福州公會，成為福州屬一個地緣性團體。

二戰之后，1947年砂拉越政府進行人口調查，以下圖表是成邦江華族各方言群的人口數：

福建	廣府	客家	潮州	海南	廣西	福州	雷州	
316	64	1185	1301	135	3	9	10	
							總計：3023	

1991年，砂拉越州政府進行人口調查，成邦江華族各方言群的人口結構已起了重大變動。

福建	廣府	客家	潮州	海南	廣西	福州	雷州	
743	125	3334	2581	189	49	2789	91	
							總計：9901	

上列圖表顯示華族人口最大的變動是福州人的大量增長，原本人口數居首位的潮州人已降至第三位。由於人口結構的變化，成邦江市區的商業經濟也產生重大變化，潮州人仍然多數經營雜貨商行，客家人則多在鄉區耕種，福州人在商業活動已后來居上，許多大商行多由該屬人經營。

華族基本上在市區營生，部分在郊區從事農耕，原住民伊班人則住在內陸地區，他們是華人商家的貿易對象。伊班

人將土產出售予華人商家，再購回食品與日常用品，兩族的人際關係保持良好。早年布洛克政府多鼓勵華人集中在市區做生意，不要到遙遠的內陸去，以免發生不測。長時期的異族交往，現時的關係更為密切。由于這個原因，華伊通婚的現象相當普遍，至今已歷數代。今日在成邦江市巫拉容路及砂巫路一帶，就有許多華伊通婚的子孫居住該區。

對成邦江來說，1973年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一年。這一年的10月21日，砂州首席部長拉曼耶谷在成邦江省長官邸（今之魯瑪斯里阿曼）與北加里曼丹國民軍政委黃紀作簽署諒解備忘錄，導致近五百名砂拉越共產游擊隊放下武器，走出森林。這項行動稱為斯里阿曼行動，為砂州長期的緊急狀態帶來和平。1974年州首席部長宣布將成邦江改名為斯里阿曼市，意為“和平之鄉”，借以紀念斯里阿曼行動。

### 小 結

戰后成邦江雖然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比起古晉、詩巫及美里等省份，它的發展腳步顯得緩慢，主要因素是成邦江地理環境及交通不便。成邦江省所管轄的縣區都處于偏遠內陸地帶，交通不便。作為砂拉越的一條主幹公路，竟然須要二十年的時間才能完成，與馬來半島的諸多大道相比，實在相差太遠，引致砂拉越人民的諸多不滿。砂州有豐富的資源，但由資源所帶來的稅收，卻很少為砂州帶來實質的發展，人民的不滿也就不難理解。

在過去成邦江市主要是依靠木材、胡椒、樹膠、可可及油棕維持地區發展與繁榮，提供了就業機會，也引進不少華

人移居此地。但好景不常，今日市道大為衰退，許多年輕人出外謀生，並且到別的市鎮落地生根，這是砂拉越許多內陸市鎮共同面對的情形。

看來，要落實聯邦政府公平對待砂拉越州的發展與繁榮，還有待砂拉越人不斷的爭取與鬥爭。

本文刊於〈人文雜誌〉

2001年三月號

### 參考資料：

#### 【英文部分】

1. Chew, Daniel, *Chinese Pioneers on the Sarawak Frontier 1841-1941*,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Sarawak Gazette (砂拉越憲報)

#### 【華文部分】

1. 《斯里阿曼省華族史料集》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編印，1999。
2. 鄭澤冰撰：潮州人之南來與成邦江早年的開埠與發展。文刊《斯里阿曼省：潮州公會五週年紀念特刊》。
3. 田英成：《砂拉越華人社會的變遷》，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1999。

## 砂拉越客家社團組織的考察



### 緒言

客家族群是砂拉越最早的移民群，迄今其人口約占砂拉越華族人口中的三分之一，達18萬之數。人口主要分布在古晉省，三馬拉漢省及美里省的多個縣區。

客家人是勤勞的農耕者，在鄉區從事種植與養畜業，在商業領域，也不乏成功者。由於人數眾多，他們同時是活躍的社團組織者。在一百多年的移民歷史中，客家人對砂拉越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而客家人的社團組織正是扮演了積極的角色。

本文主旨，即是對在馬來西亞整體文化結構中，砂拉越地區的客家人及其社團在保持華族文化和國家認同中，與其他方言群體和諧並進中作出相應的考察。

## 社團組織與分布

客家人是漢民族在中原動亂時避遷到華南地區的一個民系，千百年來與艱困的客觀環境搏鬥，在原鄉生存下來，部分則移居海外，迄今東南亞許多國家，客家人占著華族人口相當比重。

華人移民海外，在異鄉人地生疏，靠同宗或同鄉的互相濟困至為重要，會館的組織于焉產生。宗鄉社團的功能和角色包括安頓同鄉新客，互為濟困與推薦就業、排解糾紛。進而舉辦慈善事業。購買義山以安葬鄉親，此外也開辦私塾、義學、教育同鄉子弟。

早期客家人移民砂拉越，與其他籍貫人士一樣，創立公會乃是環境所需。古晉的嘉應五屬同鄉會成立于1881年（注1），為客籍人士最早成立的地緣性同鄉會。五屬乃梅縣、蕉嶺、興寧、平遠與五華。這五屬在廣東省為純客家縣份，他們移民海外為數極眾。

嘉應五屬之客家人在砂拉越雖非居多數，但他們多為城市居民，因此成立公會也較早。檳城之嘉應會館成立于1801年（其前身為仁和公司），也是客幫在馬來半島最早成立的會館。

嘉應州與廣東省大埔縣，同是純客家縣區，大埔縣舊屬潮州府，因此大埔人在海外往往獨自組成單一縣份的會館，

---

注1：古晉嘉應同鄉會于2004年5月杪慶祝成立130週年。唯筆者于1970年代，往砂拉越社團註冊局查閱有關古晉的華人會館註冊年限，古晉嘉應同鄉會成立于1881年。

或與豐順縣及福建的永定縣組成豐永大集團。在新加坡的豐永大組織即是一例。

古晉大埔同鄉會成立于1920年，但大埔客與嘉應州客同操客語，同屬一方言群體，因此當砂拉越客家公會于1934年在古晉成立時，這六個縣份的客家人，以及來自惠來、龍川、海陸豐、東莞、寶安、惠陽、揭西的客家人，成立了這一方言集團大型組織，並且將嘉應五屬開辦的公民學校及大埔同鄉會開辦的大同學校合並，成立越光學校，這是由小團結到大團結的表徵。

1971年成立的古晉惠東安公會及1978年成立的河婆同鄉會，同屬操客語的方言群。揭西縣河婆客家方言群中人數最眾，由于揭西縣早年屬揭陽縣區，屬潮州府邑，因此不少河婆客家人在二戰之前參加古晉潮州公會。惠東安公會的成員來自東莞、寶安及惠陽等縣份，這些縣份屬非純客家縣，其成員早年也有參加廣惠肇公會，一般稱為新安客。1898年首次集體移民進入砂拉越古晉三里地區進行農耕者，即屬這一方言群體。

砂拉越客家人眾多，遍布全砂，因此許多城鎮多有設立客家公會。

砂拉越許多大小城鎮，都有客家社團的成立。古晉及美里兩地的華族人口以客家人為多，因此這兩個省份有多個客家人的會館組織。

在中國，客家人原就善于組織社團，有些社團甚至成為起義與革命的組織。滿清道光與咸豐年間太平天國革命即由客家人領導。早期移民砂拉越的客家人，在石隆門成立的“公司”，也可視為一種秘密會社。一般上，組織社團可以增

進他們族群意識；客家人的族群意識看來比其他方言群強烈。他們組織社團聯絡鄉人，一方面也是“敏銳危機感”的表現（注2）。

### 砂拉越客家公會的分布

地區	公會名稱
古晉	嘉應會館 客家公會 惠東安公會 大埔同鄉會 河婆同鄉會
成邦江（斯里阿曼）	客家公會
英吉利里	客家公會
詩巫	客家公會 大埔同鄉會
民都魯	客家公會
美里	龍川會館 客家公會 河婆同鄉會 大埔同鄉會 嘉應會館
石山	客家公會
峇南	客家公會
林夢	客家公會

注2：鄭赤琰在〈敏銳危機感，與客家人的政治成就〉一文有所論述。參閱《客家源流遠流長》，第五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出版，1999年。

## 角色與功能

海外華人社團功能獨具特色。二戰之前尤為顯著。不少人在論及戰前華僑社會時，多將華僑社團、華文學校、華文報刊列為支撐華僑社會三大支柱。實際上，許多華文學校乃由華僑社團直接主辦或贊助。砂拉越客家社團在其族群社會中扮演著福利、教育、社會與宗教的角色。

### (1) 福利角色

戰前移居海外的中國人，大多仍保持中國之國籍，因而由他們所組成的社團，是為所在國中的外僑組織，形成一個內部自助自治以求自保的群體。可以說，自海外華人社團出現伊始，“聯系友情，互助互利”就是最基本的宗旨。早年華族移民生活于異質的文化環境之中，迫切需要在生活上相互幫助，以求生存，在情感上互相交流，以求慰藉。會館大多獨立地承擔起照顧鄉親生、老、病、死的種種職責。這包括華僑社團自行建立，並獨立管理的慈善機構與義山等。即使在百年后，古晉華人社會的方言群在他們逝世后，仍各自葬在各幫屬的墓園。

事實上，在東南亞許多國家尚處於西方殖民統治時，華僑遭受層層壓榨，在遭遇特殊困難時，往往不敢，也無法寄望于當地政府的支持，于是只能求助于華僑社團，鄉會為此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 (2) 教育角色

海外華人社團對華文教育的推動是顯而易見的，尤其在



二戰之前。華文教育無法寄望于當地殖民政府的支持，故而只能自求于華人社會。以古晉為例，二戰之前的華校是由各幫屬自行創辦學校。福建會館創辦福建義學（1912年），潮州公會創辦民德學校（1916年），廣惠肇同鄉會創辦益群學校（1918年），海南人創辦崇本學校，客籍的大埔同鄉會開辦大同學校（1923年），嘉應五屬創辦公民學校（1918年），此后兩校在客家公會統籌統辦下合并為越光學校（1936年）。古晉客家公會在其1937年出版的《砂拉越客屬公會概要》前言中即明言：“尤有進者，興學育才，發揚祖國文化，為我僑二十餘年來當務之急。故本會以吾屬既已統一機關，而尚以兩校分立，各自為政，視同秦越，每以為憾。遂于民國二十四年冬，依居留政府之美意，謀教育之改善，苦心孤詣，力向兩校董事懇切陳詞，乃合并公民、大同，而組織今之越光學校。”二戰之后，古晉華人社會組成中華校董會，統籌統辦各方言群所開辦的學校，由校董會領導辦理。大同與公民兩校的合并，直接或間接地啟發了二戰后古晉市華校統籌統辦的概念。

戰前華僑在各僑民居地興辦的學校，從經費的籌措，校舍的建設以及師資聘任及課程設置等，幾乎全由當地華僑社團自行籌辦安排。二戰之后，東南亞諸多國家先后取得獨立，華人在國家獨立的鬥爭中貢獻極大，先后取得公民權，但在強勢的土著民族主義操控下，華人尚須借助民間社團的努力辦學，藉此維系華校的生命。馬來西亞的華文中小學校，特別是民辦獨立華文中學，幾全靠華社的承辦維持。此乃海外華人社團具有鮮明自治性的例證。

為了培育同鄉子弟，砂拉越客家公會大多設有獎勵貸學

金。古晉砂拉越客家公會即是一例。在其宗旨中申言：“本委員會以培育專才鼓勵及協助品學兼優有志向學而家境清寒之會員子女完成學業為國家社會服務為宗旨”。多年來，這類獎助貸學金的設置對后進的培育發揮了積極的效用。

砂拉越客家人多居住鄉區農耕，許多鄉村學校，諸如以地方命名的中華學校，多由客家人出資開辦，他們在鄉村成立校董會，也與客家公會維持聯系，部份學校董事同時出任客家公會的理事。開辦鄉鎮學校，對推廣教育起著積極的作用。

### (3) 社会角色

華人社團同時扮演著社會角色，二戰之前，各屬公會各自推行文化活動。民間習俗，持續了各幫屬文化的發展。當日本侵略中國大地，海外華人展開抗日救亡運動，鄉會發動捐款並以人力物力支援中國抗戰，參與陳嘉庚領導的“南僑總會”。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東南亞國家大部分被日寇占領，砂拉越亦受日寇鐵蹄踐踏，許多鄉會領導人慘遭逮捕殺害，鄉團已完全無法活動。二戰之后，砂拉越處於英殖民地統治時期，許多社團扮演著反殖運動的政治角色。馬來西亞成立之后，不合理的法令層出不窮，華人社團聯合起來反對，對政府不合理的法令措施作出糾正。一般上，客家社團都積極參與。

在反殖運動時期，鄉村客家人廣泛參與政黨活動與農民協會的組織，顯示了客家人進取的一面。

## 結 論

百多年來，砂拉越客家社團凝聚了族群的力量。志願社團作為一種維系文化的構件作用，具有社會、經濟、政治、宗教與文教方面的功能，客家社團扮演了積極的角色。

縱觀客家公會的發展歷程，它由點而線，由線而面，由小團結而至大團結不斷地成長。二戰之前，由于華族人口稀少，客家公會的發展主要集中于古晉省，這是一個奠基時期。1941年杪日本侵占砂拉越，各屬公會處于冬眠狀態，客家公會亦然。二戰之后百廢待興，客家公會開始重振復興，古晉以外的許多城鎮先后設立客家公會。馬來西亞成立之后，各屬公會積極參與各項社會活動，客家人組成客家總會，藉以凝聚族群的力量。進入二十一世紀，面對國家社會的迅速發展，會館鄉團將會調適其步伐，在大時代中前進，可以預見的，客家社團將會繼續肩負時代的使命前進。

## 砂拉越華文報業的坎坷路

《民間評論》主編：

來函收悉。您要我談論東馬媒體的現況，特別是對媒體與政商之間的關係作個評論，以及談談東西馬媒體之間的差異。作為長期在報界執事的新聞工作者，對此等問題，我可以作出一些表述。

我在這裡談的媒體偏向于華文報章，而且以砂拉越為主。

砂拉越之報章發展，倘以1914年出版的《新聞啟明星報》(周報)作為最早出版的華文報章，則迄今已達九十個年頭。二戰之前，處於西方白人政權統治時期，砂拉越華人所具有的僑民意識，關注的主要是中國政局發展，報章雖然也報導當地新聞，但對處於日本侵略下的故國更多關注，這種基調與同一時期的新馬華文報章思想差異不大。

## 二戰后報章刊行達高潮

二戰之后，砂拉越淪為英國殖民地，華人的國家認同意識也逐漸起了變化。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在1950年之后政局起大變化，海外華人已不若昔時與中國能密切往返；認同意識的轉變使砂拉越華人更關注自身所居住的政治與經濟環境。這一時期，亞、非、拉等西方殖民地國家正掀起民族獨立運動，馬新的獨立運動正如火如荼展開，給砂拉越帶來相當衝擊。於是，先進的知識分子組織政黨，華文報章的刊行達到高潮，在砂拉越的三個主要城鎮，報章雜誌出版此起彼落。

這一時期，在砂拉越土生土長的年輕一代已逐漸步入報壇，為文化事業作出努力。他們的國家認同觀念也已轉變，不再認為自己是中國海外僑民，而是以土地主人的思想意識來爭取國家的獨立，這是本時期華文報章的最大特色。

以當時左翼報章《新聞報》(古晉)、《民眾報》(詩巫)及《砂民日報》(美里)為例，這三份報章互通聲氣，連成一線，自1956年迄1962年杪，在反殖反帝以爭取民族獨立運動思想指導下，進行文字宣傳工作，對華社產生廣泛的影響，這正是左翼運動迅速發展的時期。1962年12月8日汶萊人民黨起義事件，<sup>(1)</sup>導致英國殖民地政府採取行動大逮捕，波及鄰邦砂拉越，同時封閉這三份報章。

---

注1. 1962年12月8日，汶萊人民黨武裝起義，導致英國及其盟友出兵鎮壓。起義事件波及砂拉越，殖民地政府于是採取大逮捕行動，結果砂拉越共產組織在翌年轉向武裝鬥爭。

砂拉越處在英國殖民地統治的十八年間（1946-1963），正是國際間反殖民地統治，尋求獨立解放運動高漲的年代，特別是馬新。砂拉越的反殖民運動風起雲湧，左翼報章在思想宣傳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殖民地政府的敵視打擊也就可以理解。

1963年9月，馬來西亞成立，砂拉越成為馬來西亞的一州，然而華人黨團發生抗爭，反馬來西亞的鬥爭持續緊張。這是一個壓抑的環境，政府對報章頒布了多項法令，旨在壓制反對的聲浪。此後的三十多年間，多間報社開辦不久即停刊，銷路不振或遭受當局封閉，這反映出華文報章在砂拉越的艱困情況。

儘管如此，在困境中的報業必須與時代並進，砂拉越三個主要城鎮，即古晉、詩巫與美里，皆有報紙印刷出版。但因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市場狹小和商業廣告來源有限，報章要盈利談何容易。

### 財團操控惡質競爭

進入1990年代之後，報業競爭更形激烈，報業已進入財團操控的時代。早年是幾個文人書生用蠟紙油印出版，而後進入平版印刷機時代。然而進入電腦化操作之後，需各種款式器材，報章出版非有大資本不可，財團操控應運而生。財團控制報章不可避免的有它的政治利益傾向。現時報業法令的嚴控，言論自由原已受到極大限制，當財團考慮到自身的利益時，報章能否講真話，已是不言而喻。

報業競爭原可視為正常現象，然而惡質化的競爭將使報

章失去公信力。馬來西亞數年來華文報業惡質化的競爭打壓，完全暴露了財團操控報業的黑暗面，許多無良的新聞從業員助長這一風氣，令人慨嘆。東馬的華文報業，惡質化的競爭雖不如西馬，但財團的控制和政治利益集團的牽制已隱然呈現。

鑒於政黨與財團的操控，馬來西亞報業有太多不可觸及的禁區和太多的敏感議題，造成了新聞工作者思想上的禁地，包括語文、教育、種族和宗教等，大家都主動不談。

另一個現象是：報章尊重權力多過知識，幾乎是有權力就等于有知識，不論政治人物講的話是否合理，有權力就可以占主要版位。一個民族最偉大的其實是文化，忽視了文化的發展而只報導政治人物不實的言談，報章必然趨于低俗。當媒體的正義光環與社會漸行漸遠，也就逐漸失去它的公信力。

回頭談談砂拉越報業現況。砂州的土地面積與馬來半島相近，幅員遼闊，但人口稀少且交通不便。在移民條例嚴格限制下，半島與砂州有著諸多隔閡。在一個文化事業與人文精神不被重視的地方，報業的發展寸步不前。盡管砂拉越華文報業已有數十年歷史，但后繼者只在技術上求進步，管理層與編采人員知識層面的局限，阻礙了新聞事業的發展。

### 評論文字難反映東馬特色

砂拉越華文報界評論人員非常不足，這一方面是言論空間狹窄，評論者難以發揮，但更重要的是沒有多少人願意從事這方面的發展。華文報章所能讀到的評論文字多轉載自西

馬的報章，未能反映出東馬文化的特色。

新聞事業原是一項專業，但新聞工作者在本國屬於受雇用的階級，這是與其他專業人士不同之處。縱使他們具有專業資格，也無法自行開業。報社承認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地位與否，這是關鍵。其實，新聞事業較之其他專業有著更廣泛的影響，新聞從業員須有社會學、政治學、文學與史學的知識，因此專業訓練是重要的。要提高報章的素質，應培訓更多高素質的新聞工作者。

令人遺憾的是：馬來西亞新聞從業員的薪金往往比其他專業低。新聞工作不是一項吸引人才的工作，結果報社不容易吸引有良好素質的人從事新聞工作，這在東馬尤為明顯。東馬新聞事業特別是華文報業的拓展，還有待更多的努力與改革。

拉雜寫來，暫止于此。祝  
編安

2004年4月20日于砂拉越



第

二輯



# 重現歷史的真相

## 《林清祥與他的時代》評介

由朝花企業與社會分析學會聯合出版的《林清祥和他的時代》這部書，分上下兩冊，上冊〈林清祥與新加坡的故事〉收錄多篇政學界的評論文章，下冊收錄林清祥的政論文章和講演錄，以及部份朋友對林清祥的回憶悼念文字。

這部資料匯編體現了當代社會的歷史面貌，以及英國殖民地統治時期各種政治勢力的互動過程，進而反映了林清祥這位新馬反殖反帝運動史上傑出人物的生平、思想與個人風範。

長久以來，新馬獨立建國史，往往由于擁有權勢者的任意裁剪，刻意隱瞞和抹去真實的一面，以致歷史殘缺與不實。馬來西亞的獨立，顯然是由各民族各階層人民匯聚成一股強大力量，通過學運、工運、農運、文教及左翼政黨聯合斗爭而達致的。

以新加坡來說，二戰后乃至五、六十年代蓬勃的學運與工運，以及同步發展的政黨政治斗爭，對英國殖民統治構成

最大的壓力，終於讓新加坡自治與獨立。林清祥正是這風雲激蕩的領袖人物，但在新加坡獨立后，不論是新加坡的建國史，或某些掌權者的回憶錄，卻刻意隱瞞歷史的真相。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乃是在學運與工運蓬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這個政黨在1954年11月成立，領導了五十年代的獨立斗爭。應該承認林清祥與李光耀是人民行動黨的組織者，林氏更是最具號召力的群眾領袖。

### 與李光耀政見分歧

盡管林李稍后成為政敵，李光耀也不能不承認林清祥的領袖光輝素質。事實上，李光耀早期的政治活動，正是借助于林清祥在群眾中的威望建立起來。人民行動黨在競選中取勝最終獲得執政權，與林清祥及其伙伴所發揮的組織與影響力有著絕對的關係。由於與李光耀的政見嚴重分歧，林最終離開行動黨，組織社會主義陣線，並出任秘書長，直到1963年2月2日在內安法令下被捕。

### 反殖鬥士壯烈犧牲

這項取名為「冷藏行動」的政治動作，可說是新馬民族獨立運動史的一次政治大浩劫。林清祥身陷囹圄，竟然成為當時國家獲得獨立的一項條件。而從此也結束了林清祥短暫的政治生涯。

從世俗的觀點來看，林清祥的政治斗爭或許是失敗的，但若沒有這一群反殖鬥士及其所展開的廣闊政治運動，英國

殖民主義者最終會放棄新馬的統治權力嗎？今天新加坡的繁榮是建立在那些與殖民主義鬥爭的犧牲，而林清祥正是這一運動中的領袖，因此歷史必須給他適當的評價與定位。

現有新馬的史著，特別是新加坡，由於缺乏客觀評價與刻意隱瞞某些史實，顯得異常單調與殘缺。有志新馬歷史的研究學者，應以正確的史觀為此多做一些工作。《林清祥和他的時代》的出版，標志著重現歷史的另一面。



2003年2月13日

## 文化與商務的結合

商務印書館1897年在上海創建，迄今已逾百年。這家百年老店是近代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座豐碑。對近代中國乃至東南亞華人社會，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二戰前后的新馬、婆羅洲以及印尼地區的華文中小學課本，大部份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小部份是中華書局與開明書局出版。現在六十歲以上的讀者，大抵都是吮吸商務所提供的知識養份長大的。商務出版的《萬有文庫》與《大學叢書》更是近代學人所不可少的讀物。

1897年創辦的商務印書館，在中國近代出版業中，並不是最早的一家，也不是唯一的一家，比如同一年梁啟超就創辦了大同譯書局，但只有商務是在中國近代社會轉變中，起到了開路先鋒的作用。無疑的，這得之於張元濟、高夢旦與王雲五的魄力與識見，特別是自1922年起即開始掌管商務的王雲五，更是居功至偉。

商務印書館以推動文化教育為使命，但卻能以資本主義

的企業管理運作使之制度化。事實上，其英文譯名為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即已公開標明自己近代企業的性質，百年如一日勤奮地從事文化商務與商務文化的工作。就文化而言，它在企業管理與市場拓展兩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功。

### 名家主持編務

王雲五在主持商務之後，編輯所起用大批新人，如朱經農、唐鉞、竺可楨、段育華、任鴻雋、鄭振鐸、周建人、周予同、李石岑、陶孟和、顧頡剛、葉聖陶等都是一時之選，這些人中相當部份是當時新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少壯青年。後來大多是傑出的學者，對中國的學術文化卓有貢獻。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起，亞洲地區的矛盾焦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其他民族的反抗，中國更深受日帝侵略之害。1932年1月28日日本深夜發動了在上海閘北的進攻，上海的商務印書館總廠及編譯所、東方圖書館及100餘畝土地上的房屋建築、機器設備被炸毀。大量古籍善本藏書悉數變為灰燼。學者有謂：這是火燒圓明園以後最令人痛心的文化慘劇。

王雲五稍後能堅定意志，重建商務，使之在文化領域繼續發揮重大作用，確實需要極大的魄力。儘管王雲五在中國建立新政權之後受到諸多非議，但我們不要因人廢文。周恩來以王雲五為例子，談到一個評價人物的重要觀點，不要因人廢文。這是政治領導人在70年代十分困難的歲月裡，給予一位爭論的人物，指出要肯定他的功績。

商務印書館除了在中國許多大城市開設分館，也在海外多個國家城鎮諸如香港、新加坡、馬來半島都有商務的分

店。這些分店在推動文化教育起著一定的作用。

### 文化企業難為

事實上，一家好書局的創辦其所扮演的積極角色不亞於一間學校的開辦。辛亥革命前後在新馬許多城鎮的閱書報社及書店的創辦，在啟迪民智方面無疑是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香港位於中環的商務，是我早年讀書時期常去的書店，即使買不起書也還是常進去翻翻看看。吉隆坡商務的開辦已有很久的歷史，每每經過蘇丹街看到商務古舊的門面，都會想起百年來商務光輝的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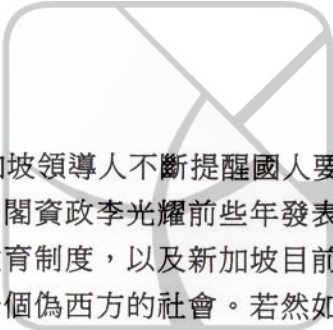
可惜的是，檳城與砂拉越詩巫的商務，都在年前停業，這說明文化生意的難為，許多受過教育的人不買書不讀書已是正常現象，這正反映出在急功近利的時代文化生態惡質變化。

盡管如此，我們仍期望更多好書店的創辦，以文化與企業管理的方式使之能恆久營運。一個所謂人文薈萃的大城市，如若缺少了具有規模的書店，那會是一個怎樣的城市？一個沒有書店缺乏資訊的小鎮，是多麼令人窒息啊！

2003年2月27日



## 新加坡偽西方社會的困惑



這些年來，新加坡領導人不斷提醒國人要正視年輕一代精神素質的萎落。內閣資政李光耀前些年發表言論指稱，以英文為第一語文的教育制度，以及新加坡目前的文化走向，可能使新加坡淪為一個偽西方的社會。若然如此，那將是一場災難。吳作棟總理也一再提醒年輕的國民必須具有危機意識，重視精神素質的提升。

### 華文小學式微

這類言論出自新加坡領導人，並非危言聳聽。獨立以來，新加坡以英語作為教學媒介語，以英文為第一語文，造成新加坡年輕人「非新加坡化」，或者說是「非東方化」。

東方文化在新加坡即使並非蕩然無存，但由於年輕一代的新加坡人所受教育的非東方內涵，以致變成邊際人（Marginal People）。這種文化教育趨勢，在接受西方文化思

想，對新加坡的現代化運動，可能有所幫助。然而，對新加坡這樣一個文化上未成熟的東方小國，將可能造成一種災害。

這種承襲英殖民主義傳統的語文教育政策，一方面是由于新加坡社會背景及地理因素所造成。然而，這種語文政策不僅阻礙了建立獨特新加坡文化的途徑，也形成年輕一代崇洋、缺乏東方社會的價值觀。

一個國家文化教育政策的偏差，往往對於後代造成災害性的影響。新加坡政府將「南洋大學」關閉，偏視學華文教育者，經已造成華文地位的沒落。華文小學的式微更是動搖了文化根基。

新加坡雖是一個多元種族國家，但華族人口高占75%。從民族觀點來說，構成民族的重要因素是語言和血統。一個民族對於本族語文的學習，是在於一種傳統的精神需求和文化的愛護。

一個人若沒有良好的母語教育基礎，他就缺乏母族的穩固文化基礎。這樣，他會可能輕易地、缺乏判斷的能力完全接受外來的影響。在這種情形下，產生一種現象，別人優秀的文化傳統他無法獲得，反之那些表面的，似是而非的文化假象，他卻照單全收。

### 維護民族文化

從文化觀點來說，維護和發揚一個民族的文化，必須以該民族的語文作為工具。文化是指語言、信仰、藝術、道德以及風俗習慣等多方面生活的綜合體，一個人接受起碼的母

語教育，才不會造成「文化喪失」的流弊。

在政府推行「英文至上」的教育政策下，新加坡年輕一代出現了文化認同、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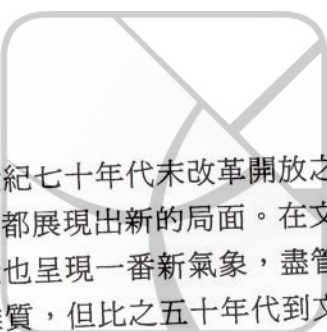
新加坡國立大學一名教授前些年作過一項調查，顯示受過高等教育年輕的一代缺乏民族自尊心與愛國意識，大多以個人的前途為主要考慮，甚至不想作為華人，而希望成為日本人或白人。

專欄作家余長年近日在英文報章 Star 發表文章指出：新加坡年輕一代大部分受過高等教育，具有各種專業知識，但缺乏道德意識與社會責任，對中華文化深層內涵的理解更不用說。他為此感嘆這種文化喪失的流弊將導致國家的危機。

實際上，一個人能兼通母語與英語（或其他西方語文），而又能為本身的傳統文化感到自豪的人，總是較能具有民族自尊心。新加坡領導人在文化上進行反思，但如若不改變它的語文政策，必將使新加坡成為一個偽西方社會，這在國家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勢必產生更多的流弊。

2003年3月6日

##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新氣象



中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之後，不論是政治經濟與文化教育，都展現出新的局面。在文學領域方面，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也呈現一番新氣象，儘管這種新氣象帶來一些負面的文化雜質，但比之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時期近三十年的政治干預，確實是一項好的發展。

改革開放的23年間，一般稱之為新時期，時間雖然不長，但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面，卻發生了驚人的變化，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進展，遠遠超過在此之前新政權建立以來的30年。

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是涉及許多現實政治問題的學科，其敏感性可想而知，五十年代初期出版了王瑤著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乃是最早的一部現代文學史專著，以後陸續有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以及丁易同類著作。

但從批判胡風時起，文學史及文學研究即不斷受到政治干預與衝擊。王瑤不得不要求出版社停止出版其著作，而劉

綏松更因為其著作在文革中遭受逼害，夫婦雙雙走上自殺的悲劇性道路。可以說這一時期搞文學或文學研究的學者們，都不免面對這樣或那樣的批判與打擊。

事實上，這類政治於干預在延安時代即已開始，儘管中國共產黨當時還在陝甘寧邊區過著顛沛的日子，但批判與整風即已不斷使文化人驚悚，不斷干擾了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

### 極左派危害文壇

五十年代中期反右斗爭之後，左風狂吹，對文學狂暴的干預更甚。四人幫之一的姚文元，在1958年曾著文批判巴金小說《家》，這裡略加引述其中一段：

「今天我們處於一個全新歷史時期，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早已過去了……。在這樣的條件下《家》中的積極作用，進步作用只存在歷史意義而失去了它的現實意義，而《家》中那些消極的、錯誤的東西，在今天卻顯得非常突出了，並且因為事實上，巴金同志的作品是在一種有體系的資產階級思想指導之下寫的，在人生道路、思想信仰、倫理道德方面有一整套和無產階級思想相敵對的主張，它影響有些青年整個人生觀，因此它們的害處就特別大。」

依據這種反科學的觀點，不僅《家》應該批判，許多在五四之後產生的文學作品，包括魯迅、茅盾、老舍等…之文學著作，都應該受批判，並且應該禁止出版。文學作品往往反映現實社會，五四時期的作品顯然也反映了當時半封建半殖地的社會面貌。姚文元的理論無疑是歷史的反動，導致文

學創作的萎縮，危害文學研究的進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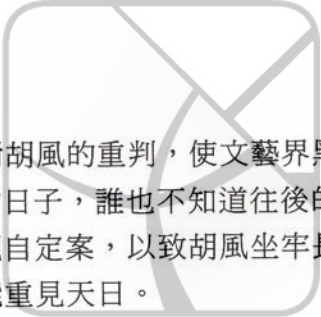
進入新時期以來，學術領域最重大的變化，莫過於擺脫過去那種禁錮學術自由研究，政治干預的惡劣情況。表現在具體研究中，在文學史方面不僅撥了五十年代中期以來極左錯誤之亂，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即已存在的左傾思潮也予以適度的糾正，這包括對王實味、胡風、丁玲、馮雪峰、艾青等一連串重大案件的清理，也重新探討了五四運動以來涉及眾多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的課題，給予胡適、徐志摩、林語堂、梁實秋、穆時英、沈從文、徐訏等展開不同層次的研究與肯定。

以往的現代文學史，對七月派予以批判，或甚至完全不提，這固然是胡風重案影響所及，對新月派、《九葉集》一批詩人及其作品，也完全漠視或不提，對沈從文不公平的評價，令人感到極左的政治思潮所產生的惡劣影響。新時期以來的思想解放，作了撥亂反正的努力，為文學研究領域帶來新的成果。不少具新觀點，掌握更多史料與論據的文學史著作陸續出版，標志了這方面的成績。

可以預期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將會在新的歷史時期有更大的突破與發展。

2003年3月13日

## 胡風與知識份子的節操



中國在1955年對胡風的重判，使文藝界黑影幢幢，知識份子開始過著煉獄的日子，誰也不知道往後的命運。由於胡風案件是由毛澤東親自定案，以致胡風坐牢長達25年，至到四人幫垮台後，方能重見天日。

《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三批材料，那些信件和日記都是指令胡風和他的朋友們交出來，或是從他們的家里抄出來的。「編者按」里的文字，充滿著猜測與仇恨，虛構了一個遍及黨軍內外、龐大的反革命集團，再用至高無上的權威加以肯定。然後動用全國的輿論工具，展開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批判。這些批判文字，在數十年後看來，仍然令人心寒。

那些缺乏理性思辨的文章，竟然是出自許多著名作家之手，似乎個個都與胡風深仇大恨，不共戴天。但也由此開始中國的人文環境被徹底破壞，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似乎已不存在。

作為一個文人，胡風在中國的文化史，乃至政治史所留

下的痕跡，是任何人難以取代的。廿世紀30年代，他投身左翼文藝運動，一度是「左聯」的中流砥柱，維系魯迅先生與「左聯」關係的紐帶，抗日戰爭期間，胡風創辦《七月》雜誌，培育了大批青年作家，為中國的抗日運動作了積極的貢獻。

然而，這樣一個為建立新中國而奮鬥終生的知識份子，在新政權建立之後，慷慨激昂地撰寫那部傾注他全部忠誠，卻將他推進災難的漩渦的「三十萬言」書，而受盡折磨嘗盡牢獄之苦，精神一度失常；就連他一手提拔才華橫溢的詩人阿壠，亦因他連累冤死獄中。

被視為文壇不可多得的奇才路翎，也因受牽連長時期的囚禁而精神分裂，「常常發出絕望的長嘯」。這位寫出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的青年作家，他的生命也就如熊熊大火之後留下一點灰燼，令生者為之痛惜。

許多與胡風有關連，甚至只是一面之交的作家，也因此坐牢受難。

筆者在90年代時在上海拜訪過賈植芳教授，那時他已從復旦大學退休，當他談及因「胡風集團成員」而坐牢時，不免多有感慨。

在《獄里獄外》一書中，獄中的賈植芳發出這樣的天問：「為甚麼在我坐完了白色恐怖時代里，國民黨的牢和日本人的牢後，還要繼續坐共產黨的牢呢？難道我們這一代的知識份子，真的要把牢底坐穿，我們的命運只能像古希臘神話中，那個搬巨石上山的西緒弗斯那樣，永劫不復嗎？」

讀者不免為此感嘆，中國知識份子的苦難，是何其深重呵！



## 硬骨頭作風受難

事實上，有良知的知識份子，也就因為其使命感，而常受災難。作為具有良知硬骨頭的胡風，也就因他的進言而受難。

魯迅先生在〈隔膜〉一文中早已指出：「進言者方自以為在進忠，而其實卻犯了罪，因為另有准其講這樣的話的人在，不是誰都可說的。一亂說，便是『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倘自以為是『忠而獲咎』，那不過是自己的糊塗。」

胡風的悲劇，是時代的產物，也有著個性因素，魯迅在30年代時即看出：「胡風耿直，易于招怒。」這話不幸而言中了。

然而，胡風也因此更受人尊敬。一度是胡風死敵的周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時，胡風的良知與正義感「使他連拍手稱快的心情都沒有，更不用說落井下石了。」

有人要胡風揭發周揚，胡風卻說：「不管報上說得怎麼嚇死人，我應該有我自己的看法，決不隨意地為某一個人說一句壞話或一句好話，問題是怎麼樣就怎麼樣。」由此也可見胡風的硬脾氣，讓人多一份尊敬。

胡風已在80年代中逝世，文革後胡風集團成員都已平反，但歷史的教訓，卻為知識份子留下不可磨滅的傷痕。

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作為魯迅弟子的胡風，承受了魯迅的遺教，顯示了硬骨頭的精神，為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寫下悲壯的一頁。

馬華知識界多有閱讀魯迅與胡風的著作，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學習魯迅與胡風的硬骨頭精神。

## 砂拉越華人史研究

華社研究中心近期出版的《人文雜誌》(第17期)刊載了砂拉越華族研究史數篇文章，從不同角度論述砂拉越華人社會的發展，這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

砂拉越在1963年9月與沙巴(前稱北婆羅洲)同時加入馬來西亞，迄今已40年。但東西馬的關係，似乎仍存在著一道猶待解決的鴻溝。

這一方面是地理因素使然，而兩地發展與社會歷史背景的差異以及東馬人民不平衡的心態有以致之。另一方面，東馬的移民條例，為半島人民的訪問與居留帶來諸多不便，一國兩制產生了隔閡。

政治上如此，文化上也深受影響。例如在論述馬華文學時，砂拉越華文文學的發展往往受到忽略。馬來西亞華人史的研究亦然，事實上，砂華文學在二戰之前以迄戰後反殖反帝時期，都有著非常豐富的篇章，文學創作的收獲較之西馬毫不遜色。

馬來西亞華人史的研究，一向以馬來半島中心，忽略了砂沙兩地的發展。西馬學者一般上都對砂沙兩地感到陌生，加上許多研究課題都要「身歷其境」，才能有效進行，為此他們的注意力也只能專注在西馬華人史的研究。

數年來，在西馬出版的任何一部馬來西亞華人史的編著，我們稍加檢視，即會發現有關華人史的記述，無法將東馬華人研究自然融入。據此觀之，編寫砂沙華人史的著作，有待東馬學者的努力。

華人到來砂拉越，始自一千多年前。砂拉越博物院於1947年及1961年曾經在山都望一帶進行有系統的挖掘，發現唐朝時用的古錢幣以及大量陶瓷石器碎片及其他物品。山都望三角州上六個遺址分布在河流兩岸，占地面積廣闊，彼此互相連接，組成一個工業發達的通商口岸，遺跡歷歷可尋。

各遺址所示器物的類似，可見屬於同一時代，都是唐宋時期的遺址。這時的砂拉越，還屬於汶萊統治時期。

布洛克家族於1841年至1946年統治砂拉越之後，需要大量勞動力的開發生產，中國移民於是逐步湧入。二十世紀初期由福州籍舉人黃乃裳率領一千多名同鄉進入拉讓江流域墾荒，這是華族移民史上的一大盛舉。

爾後廣東籍與興化籍同鄉也集體移民到拉讓江流域，共同開發這片蠻荒之地，迄今拉讓江流域的發展與繁榮，這三大移民居功厥偉。

華人湧入砂拉越，在這荒僻之地勞作生息，為砂拉越的繁榮打下了堅實的根基。作為移民社會的華人特殊社會結構，文化形態、經濟生活皆是學者們研究的課題。

## 民間學者特出

誠然，砂華歷史的研究仍然是海外華人研究年輕的一環。二戰之後，才逐漸引起中外學者的注意。中國社會人類學家田汝康博士於1948年間到砂拉越進行田野研究工作，詳細地分析砂華人社會組織結構，會館功能和城鄉華人經濟活動等課題，這本《砂拉越的華人》於1953年以英文在倫敦大學出版，至今仍是一本研究砂華移民社會的經典著作。

儘管這之後不少外國研究員繼續從不同層面與角度進行砂華歷史研究，但表現更為特出的，還是本土的民間學者。

數月前作古的劉子政，在砂拉越華族史的資料收集與撰述，有著可觀的成績。他常年寓居山林，終其一生著書近二十部，這種堅持工作的韌力與精神，難能可貴。已故劉伯奎先生在研究石隆門華工事件，成績卓著。著作《十九世紀砂拉越華工公司興亡史》及《抗日時期砂拉越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實錄》都是開山之作。

民間學者已結集成冊出版砂華人史或相關著作的有多位，包括饒尚東、陳約翰、田農、林煜堂、周丹尼、房漢佳、房年勝、蔡增聰、朱敏華、邱維國、蔡存堆、楊謙俊、吳誥賜等。

這批文史工作者以中英文撰寫的著作，其所累積的成果，豐富了砂華人史的研究。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近年來在收集資料致力推動相關的研究，都漸有收獲。儘管起步較遲，但可以預期的，他們的努力將會發出異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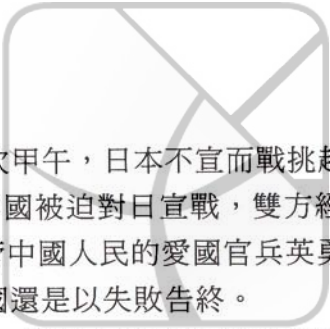
作為馬來西亞組成的一部分，砂華人史的研究，已豐富

了馬華史的篇章，在強調東西馬整合的同時，長期置東馬文化歷史于大馬之外，這將是不正常的現象，兩者之間如何調適，有待各方努力。

2003年3月27日



## 維新改良與革命



1894年，歲次甲午，日本不宣而戰挑起了侵略中國的戰爭。8月1日，中國被迫對日宣戰，雙方經過多場戰役，歷時8個多月，儘管中國人民的愛國官兵英勇作戰，但由於清政府的腐敗，中國還是以失敗告終。

1895年4月，清政府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主要內容是：中國將遼東半島、台灣全島及附屬島嶼、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賠償日本軍費二萬萬兩白銀，分8次在7年內清還，在交清第一次賠款後，余款按年加每百抽五的利息，添設湖北沙市、四川重慶、江蘇蘇州、浙江杭州通商口岸；日本人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並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只交所定進口稅。

《馬關條約》是繼《南京條約》後又一個嚴重的賣國條約，標誌著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馬關條約》的簽訂，敲醒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天朝之夢」，成為中國近代民族覺醒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激發了知

識份子以行動來加強清朝的革新，康有為是第一位夢醒之後有所行動之人。

1895年4月，康有為在京參加會試期間，傳來了日本逼簽《馬關條約》的消息，在京應試的舉人們群情激奮，積極活動，與省籍組織起來到都察院上書請愿，掀起了反對簽訂《馬關條約》的巨大聲浪。

舉人們的愛國熱情使康有為受到極大鼓舞，他決定聯合所有在京的舉人，進行一次更大規模的上書，為變法制造聲勢。於是他連夜奮筆疾書，起草了一份長達一萬多字的上皇帝書，這是他第二次上皇帝書。在這之前的1888年，當中法戰爭失敗之後，康有為第一次上書光緒皇帝，請求改革政治以挽救中國的危機。

康有為請求皇帝當機立斷，「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體，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同時指日本之強，乃是得力於1860-70年代的明治維新，改革成功的結果。這次上書提出了發展資本主義和實行君主立憲制度的要求，是維新派最初的政治綱領。「公車上書」是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第一次群眾性的愛國行動。

「公車上書」後，康有為考中進士。這之後他又寫成了上皇帝書第三和第四書，反復強調變法維新的重要，光緒皇帝讀到第三書，感到所述符合改變國家狀況和鞏固清朝統治的需要，於是立即抄送一份給慈禧太后。維新派開始取得光緒皇帝的支持。

這之後數年，中國繼續受到外強侵凌，康有為、梁啟超及譚嗣同等堅定了變法維新的立場。到1898年，光緒皇帝決定利用不斷高漲的維新運動來推行新政，於7月11日頒布

「明定國是」的詔書，宣布變法。從這一天開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歷時103天，史稱「百日維新」。

### 社會處腐朽階段

維新運動終究無法改變中國清朝的命運，慈禧發動政變，將光緒皇帝軟禁，並以「訓政」的名，重掌國政，這就是「戊戌政變」。維新派人士不得不逃亡外國，譚嗣同、康廣仁，林旭等6人被捕後殺於北京菜市口。戊戌維新運動宣告失敗。

維新運動的失敗是可以理解的，當國家機器仍然掌握在頑固派手中，他們如何會放下權力，失去既得的利益，只有通過革命的手段，才能達致改朝換代。孫中山在這個基礎上，也即是清末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中領導辛亥革命，終於於推翻了封建皇朝，盡管這之後的數十年中國仍然命途坎坷，但它終究是在歷史進程中大大跨前了一步。

近時讀到劉再復與李澤厚所著《告別革命》一書，深覺其言論之不實，該書紀錄了兩人平時的話，宣布要告別一切革命。不僅告別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也要告別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之後一切的革命。

按照「告別革命」論者的說法，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爆發的革命，似乎是可有可無的。如果改良搞得好，革命是可以避免的。

誠然，革命並不是社會歷史前進的唯一推動力。革命的發生是有條件的，不是任意可以制造出來的。當社會改良無能為力，而這個社會已處於腐朽階段，它只能通過革命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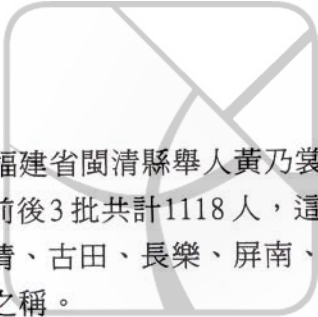
段推翻舊政權。

清末一群先進知識份子尋求變法維新最終嘗到到鎮壓失敗，辛亥革命也就無法避免，這是中國歷史的發展趨勢，觀之世界上許多大國，它們所走過的歷史軌跡，何其相似。

2003年4月3日



## 基督教與新福州墾場



20世紀初，福建省閩清縣舉人黃乃裳率領同鄉前往砂拉越詩巫省開墾，前後3批共計1118人，這批墾農來自福州十邑中的閩候、閩清、古田、長樂、屏南、福清等縣，詩巫省逐有「新福州」之稱。

1901年砂拉越政府辦的《砂勞越憲報》四月號如此報導：The Settlers are from Foochow and style their place the New Foochow。砂拉越政府並曾以「新福州」此一名稱通告各國郵局。至1935年，砂拉越王布律克三世（Vyner Brooke）於一封公函中，更盛稱「福州人為砂拉越之資產」。

雖然，在19世紀60年代詩巫開埠之後，已有閩南與潮州屬人來此經營貿易，但人數不多。迄今，在拉讓江流域，福州籍人口仍占華族人口的絕大多數。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早期的福州移民，多屬基督教衛理公會會友，可以這麼說，福州墾民在詩巫的發展與衛理公會關係密切。這與東南亞其他國家華族移民多半屬於佛教或民間信仰的崇奉者有著很大

的不同。

這種現象的出現，與帶領福州移民前往砂拉越墾拓的港主黃乃裳、其繼承者劉家洙、以及稍後衛理公會傳教士富雅各牧師（Rev. James M. Hoover）成為福州社群的領導者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

黃乃裳在青年時期，即受洗成為虔誠的衛理公會會友。自信仰基督教之後，熱心傳教，帶領家人皈依。稍後更考取「傳道」資格，並巡迴布道。

據《絨丞七十自敘》所記：「自20歲已誓願至死之日，遇有機會無論何等人，必教之闡揚贖罪救靈之大道。」衛理公會「未建教堂，先建學校」重視教育的傳統，對黃乃裳以及整個砂拉越福州籍移民群的影響非常大。

### 墾務既成志願既遂

1898年，黃乃裳參加康有為領導的維新運動，失敗之後，康梁逃亡海外，黃氏也返回家鄉，而後遠走南洋。一方面為避清廷暴政，另一方面為家鄉貧民尋覓一條生路，實踐基督教「利他主義」理想，於是他輾轉與砂拉越王布律克二世簽署開墾拉讓江流域的條約。1901年開始帶領福州衛理公會會友移民砂拉越。然而黃氏本人卻於1904年因故返回國門。他以「墾務既成，志願既遂」而體荏弱，環顧眾農能自為謀，並已倡禮拜堂五所，學校兩所。以教養基礎已具，遂以墾務交美籍富雅各教士及族弟諸人，於1904年6月末離開詩巫，從此不再涉足詩巫。

此後富雅各教士及劉家洙等人秉承黃乃裳之意願，繼續

領導福州移民在拉讓江流域的開拓工作。

黃乃裳于詩巫時，一度積勞成疾，嘗自題挽句云：「平生所事愿多違，差幸聞道壯年，天若有心，期盡藐躬份內事；故鄉久愁人太滿，遠辟殖民小局，我雖撒手，仍留餘地後來人。」由此可窺見其抱負。病愈之後，他隨即返鄉。作為港主，本有包賣煙酒及賭博特權，並以此謀利，惟獨黃氏力倡戒絕此等惡習。

砂拉越政府向以出售鴉片謀利，遍查各港，獨新福州詩巫無法推銷，遂向黃乃裳發出警戒，黃氏不為所動，致與布律克政府產生磨擦，此或與他提早返鄉有一定關係。這種廉謹或與他所具有之基督教精神相關。

詩巫福州墾場，經族人之努力創建，南來之福州移民漸增，於是興建學校，發展教育，讓子女接受文明洗禮。隨黃港主來詩巫墾荒的先輩中，多是基督徒，之後的富雅各牧師在詩巫的墾拓歷史中，更是一位最具影響力的領導者。

因此，早期所設立之學校，必有教堂，或者一周之內，六日為教室，第七日即作為教堂傳教。學校教育與宗教教育兼施的政策，是新福州墾場的特色。迄今已歷百年，但教會之影響力仍明顯存在。

黃乃裳本身是一個社會改革者，從他早年關懷教育參加清末維新運動可以看出。作為港主，他享有鴉片販賣、開設賭場的特權，並可由此賺取暴利，但他作為基督徒，卻嚴禁煙賭。這對早年南來的懇民道德教育極有作用。隨他之後的墾場領導人都極為重視宗教與教育的互動關係，從而培養具有現代意識智性的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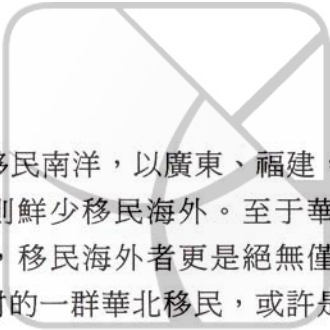
新福州墾場已歷百年，它是華人移民海外成功的實例，作為一位先行者，黃乃裳受到墾場後代的崇奉，並將永志史冊。

2003年4月17日



沙巴津僑村：

## 一個華北移民村莊



早年中國人移民南洋，以廣東、福建，廣西為主。長江以北省份的居民則鮮少移民海外。至于華北地區。諸如河北、河南等省區，移民海外者更是絕無僅有。為此，沙巴（北婆羅洲）津僑村的一群華北移民，或許是僅見的華北同鄉移民海外的族群。

津僑村位於亞庇（哥打京那巴魯）郊區的兵南邦路二里至六里間，是散居在東南部的一片廣大原野村落。筆者於八十年代初曾到這村落作田野調查，這村落的居民疏疏落落的多以耕種為生，保留著農村的風貌。當地人有說這兒的居民祖先是從山東省遷移來的，所以稱之為山東村。實際並非如此，這些居民的祖先大部分是從河北省東南部各縣份遷移來的。

在津僑村不遠處有「津僑墳場」，日期所志是民國二十九年（1940），在墓碑上刻著死者家鄉的城鎮，諸如壩縣、靜海、滄縣、永清、固安、天津、深縣與文安縣，這些縣城都在天津附近。其中最早的墳墓日期是民國九年（1920），

距離他們由中國南來的日子只有七年。

這些遠從華北南來的移民乃是依據當時中華民國政府與英屬北婆雙方訂立的條款計13項。包括北婆羅洲政府提供每戶十畝土地、農具給移民，以及地稅等優惠。條款也言明移民所種之地至少須一半種稻，谷種由政府發給。政府有義務為移民之孩童建立學校讀書。初次華民登船赴婆羅洲時，應由中國政府派員同往以便將所有情形回報政府。

### 照顧華民利益

條款中包括中國政府可商議英國政府派遣領事常駐北婆羅洲，以便照料華民之利益，此條款引致中華民國政府在1914年即在北婆設立領事館，此領事館同時處理砂拉越華民事務。砂拉越直到二戰之後方有中國領事館之開設。更早之前這一地區的華民事務多由新加坡中國領事館兼顧。

北婆羅洲於1881年由英國渣打公司管轄，居民以土著加達山人為主，那時雖有少數華人居住在山打根與亞庇一帶，但實不足以加速開發北婆，加上土著的農耕方法及勤勞程度，遠不如華族移民。

北婆羅洲以第一任總督特萊撒爾(W. H. Trecher)對華族的勤勞有很高的評論。1891年他在一文告中如此表示：

「海峽殖民地，馬來半島以及砂拉越的經驗表明，能夠使各馬來人國家在財政上迅速進展的民族，就是勤勞和愛好金錢的華人，公司應該設法把這些人吸引到婆羅洲來。……一旦能使他們自願地移來，我認為公司財政成就有了保障。」

## 華民土著通婚

特萊撒爾的此種觀點，一直支配著北婆的勞工及移民政策。二戰之前，北婆不斷有華工移民入境，成為墾拓的主要力量。華北地區的集體移民，尚且通過政府關係訂立合約，也為民國成立之后僅見者。

按照雙方協議，第一次華北移民以250戶為限。實則當日抵達亞庇的移民僅107戶。當時的理事會獲悉107戶由天津抵達亞庇，費用高達2500鎊，就取消更進一步的安排。這107戶華北移民凡433人，但至1925年，僅73戶留下來，人數僅剩353人。他們大多是水土不服而北歸。

早期的華北移民，多與本村的村民通婚。但現時與外省人通婚已甚普遍，甚且有與土著通婚者。北婆羅洲的加達山人，不少習俗與華人相近，他們甚至推斷其祖先是唐宋時期流徙南洋的中國人，有不少華北移民是回教徒，原因是他們南來前已經信奉回教，與回教徒的關係也較為親近。

這群華北移民有「華北同鄉會」之設。藉之聯絡族群，推行教育事業與協助政府推行發展計劃。日本侵略中國時。華北同鄉與許多海外華人一樣，曾給予中國物質支援，但數十年後，他們與中國的關係已漸疏遠。年輕一代對本身的原籍已不甚了然。事實上，這是海外移民群後代的普遍現象，地緣性鄉團的延續與發展將因此面對挑戰。

這群在東南亞僅有的華北移民，他們萬里投荒，為北婆羅洲的繁榮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這是值得稱許的。



## 歷史人物的評價與翻案

中國大陸學術界正在掀起重新評價歷史人物的翻案風，對許多早有定評的歷史人物提出另一種看法。近期中國教育部審定出版的《高級中學歷史教學大綱》一書，認為宋朝的岳飛與文天祥，都是參加國內民族之間的戰爭，而非「反抗外敵侵略」，因此不再將他們列為民族英雄。

該書在「金的建立與宋金的和戰」一節中指出「對岳飛的評價」是教材章節的重點、難點。書中寫道：「民族間的戰爭性質是兄弟鬩牆，家里打架，屬於中國領土內部的相互鬥爭，因此，各民族之間的戰爭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但沒有侵略與反侵略之別。

一般來說，以民族征服和掠奪為目的的一方屬非正義戰爭，順應統一趨勢，抵抗掠奪、反抗民族壓迫、平定民族叛亂的戰爭是正義的。基於以上標準，我們所熟悉的岳飛是抗金名將而不能成為民族英雄。」

岳飛是宋朝名將，文天祥是宋朝右丞相，他們的一生是

為國家為民族，前者抗金，後者抗元。南宋初年，金兵不斷南下，一路燒殺擄掠，岳飛率領岳家軍打敗金朝大將兀朮的主力騎兵。但就在這樣有利形勢下，以宋高宗和宰相秦檜為首的投降派為了向金乞和，竟解除了岳飛的兵權，並以「莫須有」的謀反罪名殺害了岳飛。

### 不是民族英雄？

文天祥，南宋狀元。元軍南下時，組織義軍抵抗，1278年在廣東被俘。元軍勸他投降，他寫了《過零仃洋》一詩，末句是「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漢青…」表達了他寧死不屈的崇高氣節。後被送到大都囚禁4年終被殺。

這等熱血男兒，現在中國的教科書竟然認為他們不是民族英雄，因為他們反抗的是中國自己的兄弟民族。但在當年，不論是金人或元人入侵中土，都對百姓進行擄掠屠殺。元朝入主中原，為了鞏固統治，採取民族壓迫和分化政策，對待漢人尤其苛刻，元世祖時，將全國各民族劃分為四個等級。漢人被劃為3等與4等，地位最低，並不視漢人為兄弟。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人們稱岳飛、文天祥為民族英雄，重視的是他們的民族氣節，而對敵對勢力表現出「精忠報國」、「威武不能屈」的氣節，這種氣節千百年來為本民族人民所敬仰，也為世界各民族人民敬仰，是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

為了順應政治潮流，將已有定評的歷史人物抽離歷史背景，重新翻案，那並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評價歷史人

物，應依據當時的歷史背景，才能客觀的評價。倘若以民族間的和諧團結的現代觀點，吳三桂迎清軍入關可以說順應歷史潮流，對吳三桂又如何稱呼？秦檜之殺害岳飛恐怕都可以為之開脫罪名了。

近時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長篇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也正引起爭議。該劇揭示了清末歷史人物李鴻章、慈禧太后、袁世凱及孫中山的另一面，為中國近代史翻案。

長期以來，李鴻章和慈禧太后都被視為「賣國賊」，而袁世凱則被指為「竊國大盜」，《走向共和》一劇稱慈禧為清王朝政治家，而不是執政的野心家。對李鴻章更給予肯定的正面評價。

前些年已有論者說，李鴻章「為中國近代化開的藥方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是可以挽救中國的」。為他的一生開脫，包括他簽訂對外條約，如中法《越南條款》、中日《馬關條約》、《中俄同盟密約》和《辛丑和約》時的責任。

簽訂屈辱的不平等條約，主要責任當然在腐朽的清王朝，但李鴻章作為對外交涉的首席大臣，就能沒有責任嗎？為甚麼駐俄公使楊儒寧死在莫斯科，也不愿在屈辱的條約上簽字呢？

1982年9月鄧小平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談話時，代表中國政府表達了收回香港主權的願望。他說：「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而李鴻章正是代表清政府在涉及香港的第三個不平等條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上簽字的。

在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李鴻章積極的一面應予以肯

定，但過度拔高他的歷史形象，為他重新翻案，則將產生失誤。對慈禧及袁世凱的翻案亦然。

2003年5月29日



## 極左思潮政策的危害

在中國近現代的革命鬥爭中，「左」傾冒險主義路線曾產生極大危害。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7月成立之後，陳獨秀出任總書記。1927年陳獨秀對中國各階級地位、其相互關係的理論及如何處理國共兩黨關係的理論遭到批評，指其右傾機會主義而失勢。這之後開始的年代，不論是李立三、王明（陳紹禹）或博古（秦邦憲）皆以「左」傾冒險主義激進的政策作為黨的鬥爭路線。

1928年之後，毛澤東、朱德及陳毅等率領南昌起義留下來一部分部隊和湘南暴動的農民武裝到達井岡山，此後即在湘贛邊界建立了革命根據地蘇維埃政權。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是中共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實際開端。毛澤東在論述中國紅色政權能夠存在和發展的歷史條件，第一次把武裝鬥爭，建立政權和深入土地革命緊密結合在一起。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

湘贛根據地此後雖遭國民黨軍隊的圍剿，但都能突破取

得勝利。隨著根據地的發展，中共「六大」以來黨內存在的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新的形勢下抬頭。

1930年5月起，蔣、馮、閻、李各派軍閥在中原地區展開大戰，革命形勢進一步高漲，時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和秘書長的李立三把共產國際關於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的「第三時期」的論述和「六大」關於中國革命的若干錯誤觀點加以發揮。在中國革命形勢和中共戰略方針等問題上提出了一系列左傾主張。

其主要錯誤是：在革命形勢問題上，極端跨大形勢對革命的有利方面，否認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認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形勢之下，準備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成為黨的戰略方針。」

### 中共被迫長征

而革命政權建立的開始，就是革命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開始，因此提出了沒收工商業，建立集體農莊的「左」傾政策，在革命道路問題上，認為中心城市無產階級鬥爭是「決定勝負的力量」，「以鄉村包圍城市」是一種極錯誤的觀念。（《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這個「左」傾冒險計劃推行的結果，使中共革命遭到嚴重損失，紅軍在攻打長沙、武漢、浙江、柳州數個城鎮過程中，損失數萬人以上。

1930年，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共產國際及其東方部負責人米夫的支持下，推行更為全面系統的極左政策。王明根據共產國際的有關文

件寫成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爭鬥》一書中體現了其極左思想。

王明跨大了資本主義在中國社會的比重，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把反對資產階級同反帝反封建並列，認為一切資產階級改良派和上層小資產階級都是「反動營壘的一翼」，提出打倒一切資產階級和中間派別的關門主義政策。要求紅軍攻打中心城市，要求白區黨組織各大城市的罷工、罷課、罷市、示威遊行。飛行集會和準備武裝起義，配合紅軍攻打各大城市。

兩次極左冒險主義的路線給中共的革命極大的危害，在蔣介石發動第五次圍剿之後，紅軍與優勢敵軍拼消耗，遭受極大損失，日益陷於不利地位，被迫突圍走上萬里長征之路。

### 文革影響大馬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結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冒險主義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重大轉折點。中共第一次自主地解決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問題。1936年之後，中共在陝甘寧邊區建立了根據地，在八年抗日戰爭中逐漸壯大了力量，終於在1949年取得政權。

然而不幸的是，在1957年之後的反右鬥爭，大躍進，以及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共又再次患上極左冒進的路線。「文革」危害之大，史不絕書。可以說在中共革命史上，左的

危害比之右傾的危害大得多，為中國人帶來無比的創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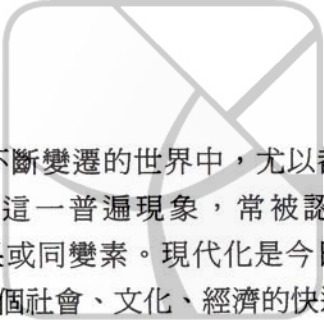
中國作為共產大國，對周邊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的左翼運動有著廣泛的影響，文革之極左路線給柬埔寨的波爾博帶來靈感。紅吉蔑製造了滅絕人性的鬥爭。文革對馬來亞共產黨甚至一些公開性政黨也產生較大的影響。然而，馬共在二戰之後，即日本投降之後採取「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卻使馬共鬥爭陷入苦境。

馬共在1945年8月27日發出的「八大主張」與1943年2月馬共在雪蘭莪召開的七屆三中執委會的決議「抗日九大綱領」，政策上明顯大有改變。「九大綱領」的第一條驅逐日本法西斯出馬來亞，建立馬來亞民主共和國，在「八大主張」則已放棄，這顯然不再阻止英國重回統治馬來亞，放棄建立一個馬來亞民主共和國的主張。這項決策性的改變，使馬共從此陷入一場更艱苦的鬥爭旅程。

2003年6月13日



## 城市發展與文化建設



我們生活在一個不斷變遷的世界中，尤以都市生活的變遷更顯快速。都市化這一普遍現象，常被認為是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結果或同變素。現代化是今日大多數開發中國家，正在經歷的一個社會、文化、經濟的快速變遷過程。

隨著古晉於多年前陞格為市之後，位於砂拉越北區的美里也將晉陞為市。數十年前還是一個漁村小鎮的美里，發展至今進入現代化的市鎮，這是人民血汗的努力與智慧所成就的。

實際上，美里的開埠與油田的開發是直接關係的。油田的開發引進了中國勞工，同時引進了大量的華族農民，從而在這裡勞動生息，創造了財富，也繁榮了這片原是荒僻的土地。任何一座城市的發展都有其內外因素。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拉讓江流域局勢動盪，吸引了大量該區居民移居美里，尋找謀生機會，促進了市鎮繁榮。另一方面，汶萊國與美里一水之隔，該國人民往來促進美里商貿，帶動經濟成長。數年來，美里在基本設施方面，有很好的建樹，大專院

校的設立，機場設備的改進，以及人口的增加，商貿的發展，成就了美里成為一個城市的基本條件。

毫無疑問地，人口移住於都市地區的現象，必會在都市生態、人文制度、社會組織及政治經濟結構上引起種種變遷。

都市人口的急速膨脹，可以吉隆坡與古晉為例子。吉隆坡近二百萬的人口，已為這都市帶來各種社會問題。古晉市近年人口迅速增長，鄉區及外省移民相繼湧往，古晉的人口數量已佔砂拉越總人口的四分之一，為市鎮的發展帶來負荷，這是城市發展無可避免的現象。

然而，一個城市的建立，單只重視基本設施而缺乏人文精神那是不足取的。所謂人文建設，可以解釋為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生態環境的保護，從而建設一個人人安居的城市。

人們所強調的人文城市，重要的一面是文化活動空間的擴大。在砂拉越這片文化荒原上，缺少一個真正的學術界或文化界。一個具有創造力和能夠產生一股思想潮流的學術界或文化界。在教育、文學和藝術方面，缺乏一股原動力。我們可以看到現時的文化活動只限於低層次的層面上，對於較高層次的學術研究並不重視與支持。

本來教育機構是產生學術的地方，可今天的教育已變質，市儈思想以及客觀環境的壓力，已把文化精神的建設排除了。為了生活需求的教書匠，固然缺乏心智發揚優質文化，原是啟迪民智，宣揚文化的媒體報章，也因極為狹窄的生存空間，難有效的發揮文化推動力。在極端勢力操控的環境中，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偏向物慾的追求，而偏廢了人文精神的建設。

誠然，文化底蘊的深淺，有著時間與空間的因素。砂拉

越文化土壤長期的貧瘠，需要更多時間與人力的培育。由於缺少新思想的激素，社會普遍陷入一種消極生存狀態中，這對國家與社群的發展都將產生不利因素。

回頭談到城市規劃。古晉是一座較具歷史意義的城市，源自於百多年前布律克統治時代的老街與舊建築物，至今仍呈現出其舊有風貌，彰顯出其沉重的歷史風骨。城市的發展誠然不能脫離高樓大廈的崛起，不能缺少聲光影像的設備，但保存舊有的老街陋巷，可以反映出時代與社會變遷，彰顯出其人文的厚度。

長期住在一座鋼骨森林的城市，我們所能看到是繁忙的街市，科技的幻影，冷漠的嘴臉，那並不是一個人可安居的地方。

大城市居民，時而會患上精神抑郁症，而嚮往純樸的鄉間。鄉間居住可能會是寂寞與孤獨，但它更能發人思考。因此如何使一座城市的發展，在強調物質文明的同時，也能加強精神文化的建設。

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的詩：

人充滿勞績，但還詩意地安居于大地之上。

在砂拉越這片人口並不密集的土地上，發展出可以詩意安居的城市，應是可以期望的。

2005年4月23日

的也。此外，由於我的研究興趣是中國一戰前的婦女救國文藝活動，因此我學過與我論述主題最有關聯的幾種語言學方法。

首先是詞法。詞法研究是語言學研究語法的重要方法，也是對語言大綱進行研究（如「morphology」這個字）的基礎。為此我研讀了

許多關於中國語法學導論的書籍，特別是馮國治的《普通國語文法》和馮國治的《國語文法》。這兩部書都指出國語的構詞法與英語的構詞法有許多相似之處，這對我理解國語的構詞法很有幫助。

其次是句法。句法研究是語言學研究語法的重要方法，也是對語言大綱進行研究（如「syntax」這個字）的基礎。為此我研讀了

許多關於中國語法學導論的書籍，特別是馮國治的《普通國語文法》和馮國治的《國語文法》。這兩部書都指出國語的構詞法與英語的構詞法有許多相似之處，這對我理解國語的構詞法很有幫助。

第三是語法。語法研究是語言學研究語法的重要方法，也是對語言大綱進行研究（如「grammar」這個字）的基礎。為此我研讀了

許多關於中國語法學導論的書籍，特別是馮國治的《普通國語文法》和馮國治的《國語文法》。這兩部書都指出國語的構詞法與英語的構詞法有許多相似之處，這對我理解國語的構詞法很有幫助。

第四是音韻學。音韻學研究是語言學研究語法的重要方法，也是對語言大綱進行研究（如「phonology」這個字）的基礎。為此我研讀了

許多關於中國語法學導論的書籍，特別是馮國治的《普通國語文法》和馮國治的《國語文法》。這兩部書都指出國語的構詞法與英語的構詞法有許多相似之處，這對我理解國語的構詞法很有幫助。

第五是語義學。語義學研究是語言學研究語法的重要方法，也是對語言大綱進行研究（如「semantics」這個字）的基礎。為此我研讀了

許多關於中國語法學導論的書籍，特別是馮國治的《普通國語文法》和馮國治的《國語文法》。這兩部書都指出國語的構詞法與英語的構詞法有許多相似之處，這對我理解國語的構詞法很有幫助。

第六是語用學。語用學研究是語言學研究語法的重要方法，也是對語言大綱進行研究（如「pragmatics」這個字）的基礎。為此我研讀了

許多關於中國語法學導論的書籍，特別是馮國治的《普通國語文法》和馮國治的《國語文法》。這兩部書都指出國語的構詞法與英語的構詞法有許多相似之處，這對我理解國語的構詞法很有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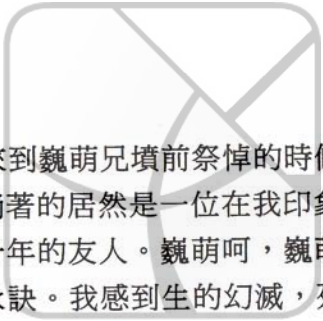
# 第三輯





# 天涯何處覓知音

～悼巍萌～



當我趕回古晉，來到巍萌兄墳前祭悼的時候，巍萌已逝世了兩個多月。墓中躺著的居然是一位在我印象中活生生的友人，一位締交近三十年的友人。巍萌呵，巍萌，天何其不測，相別數日，竟成永訣。我感到生的幻滅，死的無常。

五月中旬，我撥了個電話給巍兄，告知我欲到美里一行，巍萌尚囑我早去早回。如今當我回來，巍萌卻已作古，陰陽兩隔。5月25日，我落腳在民都魯縣，翻閱當日報章，報導謂巍萌在5月23日衛塞節晨早步行時，遇車禍傷亡。我彷彿再三，無論如何不能相信巍萌的死訊，但再翻閱多份報章，都做同樣的報導，打電話回家，確知巍萌已遭不測，且已出殯還葬。

然而，巍萌已故，且已殮葬，我身在異鄉，無法趕回送他一程。我感到愧對友人，愧對一位帶給我友情溫暖的友人。居然在他亡故之時，未能相送，未能瞻其遺容，我不禁落淚異地。那一夜，我輾轉難眠，面對民都魯的海浪起伏，

我思潮激蕩。我無法抑制悲思，魏萌的音容笑貌，揮也揮不去。

與魏萌締交近三十年，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上，我們攜手並進。在黑暗的時刻，我們以心靈的燈照亮對方。相濡以沫，相待以誠。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任職一家報社，兼編文藝副刊「文藝行列」，稍後主編《文藝生活》雜誌，魏萌與韓拍岸兩兄，乃是最得力的撰稿人。韓拍岸寫散文，魏萌則作小說與戲劇創作。韓拍岸稍後將這一時期所作散文結集成冊《生命的痕跡》。

那當子，我們都還年輕，作著青年特有的夢。我們搞文藝，將文藝作為社會武器，揭露黑暗，詛咒現實。那年代，政局風起雲湧，我們既無意或者不能成為一呼百應的猛士，只得以筆默默耕耘，或者，這並不是智者所應為，但我們卻也只能如此。

我們幾位，時相過從，編織著年輕的夢，不滿與詛咒，發而為文，也多憤世嫉俗。魏萌，作為一位寫作者，他不善空談，他默默的耕耘，創作小說，主題明確，走著寫實的文藝路線。搞文藝既難以謀利，求名也不易為，特別是在那黑暗的年代，發表文章更不想求人知，目的只是發泄胸中塊壘，揭露現實的黑暗。

魏萌五十年代初期即開始寫作。三十年來，所作篇章無數，以小說為主，結集成冊多部。他出身農村，小說題材也多以農村為背景，充滿鄉土氣息。他的為人，敦厚樸實，在一家華文小學執教三十年，不求聞達。他認真教學，甚得學生愛戴。



我曾計劃寫「馬華小說創作的社會意識」，探討馬華小說，以數位較有成就的作家為探討對象，巍萌即是其中之一。他一再鼓勵我早日完成，但因人事倥傯，俗務纏身，至今仍未寫就。然而，即使完成了，巍萌也已無緣一讀。

作為一位小說創作者，巍萌是踏實的。但或許是生活環境的局限，他的寫作視野仍然不夠開闊。早期作品的衝刺力更勝於後期，但這一切並無損於作為一位砂華文藝墾荒者應得的贊譽。他有意於退休之後計劃寫一長篇，如今已人亡文杳，造化弄人，一至於此。

近十年來，我們時相結伴遠遊。今年四月間的假期，他原邀我赴星馬一行，但我一時未能抽空出門，致使巍萌取消原訂計劃。如今雁行折翼，情何以堪！

我曾勸巍萌兄只作屋外晨運，不必在馬路上晨跑，主要是恐怕交通意外。不意話只數月，不幸竟如斯應驗，冥冥中自有天數乎？

我悲悼作為一位文運工作者巍萌的早故，乃是文藝界的一大損失。對其家庭更是一項重大挫折。巍萌的死，使我失去一位可互訴心聲的友人。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上，留下沉痛的回憶。

如今，巍萌確已身故。而我，身在異地，在寄居的會館裡，只能寫下這短短的文字，悼念這位我所敬愛的友人！

巍萌兄，安息吧！

## 悼林廣明

得知林廣明兄逝世，心情不免為之陰郁了一陣。廣明兄病了好一段時間，而且是患了肺癌，即使現今醫藥如何發達先進，一旦得了肺癌，恐怕還是難以得救。但做朋友的，總希望他能征服病魔，然而他終究還是走了。

事實上，生死本無常，壽命的長短並不能憑此窺見一個人的生命價值。一個碌碌無為者，即使是長命百歲，那又有什麼意義？廣明的一生，雖然不是所謂轟轟烈烈，但終其一生，卻也沒有白活。

年輕時，他是一個熱情的政治工作者，一個反殖民主義運動的領導人。在五六十年代，有理想有認識的年輕人都不免會走上這一條路。那時正是亞非拉丁美洲地區展開反帝反殖的熱潮，民族主義的思潮澎湃，受殖民統治的東南亞國家掀起爭取獨立的鬥爭，年輕人通過文字宣傳或政治工作，他們都在為一個理想而活著。

六十年代初，廣明到印尼邊境參加游擊隊，他曾經是一

名高級領袖，出席過不少國際性會議。然而由于形勢逆轉，這場斗爭結局已是盡人皆知。

多年前，我為了做砂拉越共產組織的研究，曾經與廣明長談。這場斗爭雖已是昨日黃花，但對於那個時代的青年來說，對砂拉越華人政治運動，確是影響深遠。

廣明有很好的語文根底，中、英、巫三種語文能得心應手。有好幾年的時間，他（詩巫林明）經常從英、巫文報章雜誌，翻譯一些政論文字供給我所編的言論版刊載。這些論文大抵都是馬來政論家所撰述，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馬來知識份子對國家政治演變的看法。因此不少讀者對這類文章都留下深刻印象。

究其實，他還在學生時代，即已開始翻譯工作，那時譯的是有關砂拉越土著社會介紹的文字，大都刊載在「新聞報」的副刊「矛與盾」。

砂拉越是一個文化落后的地方，即使與馬來半島比較，也遠為不如。文化人如果要靠文字來謀生談何容易。只是某些心中尚有熱誠，具有愛護民族文化的高尚情操，他們還能不求功利獻出微薄之力，廣明正是其中之一。當這類有心人的隊伍逐漸壯大時，文化的發展還是可以期許的。

近十年來，廣明似乎很熱衷于同鄉會的領導工作，這或許是當一個人已失卻政治的熱情，轉而謀求同鄉的福利，也同時為華人社會作些基礎工作，這又何嘗不是很有意義嗎？

以現在醫藥的先進，人類應可以有更長的壽命，但廣明只活了60個年頭，令人為之惋惜。他誕生在二戰時期淒風苦雨的年代，走的時候正是淒風苦雨之日，廣明的一生如此坎坷嗎？但他終究生在他所熱愛的土地，死在他所熱愛的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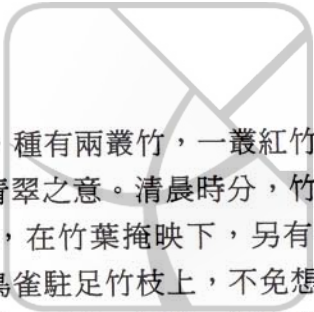
地，他已把生命獻給了這土地。寫到這裡，我想起艾青的詩句：為什麼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的深沉……就讓我以這篇短文遙祭廣明在天之靈吧！

1998年11月18日于美里



# 竹的懷想

～記中國老作家艾煊～



在古晉老家的屋前，種有兩叢竹，一叢紅竹，一叢是綠竹。這兩叢竹帶來些許青翠之意。清晨時分，竹葉扶疏，陣陣涼意。大熱天的午後，在竹葉掩映下，另有一種靜謐之感。黃昏夕陽下，偶有鳥雀駐足竹枝上，不免想起兒時樹叢間嬉戲，捕捉鳥兒的情景，而今一幌眼，雙鬢皆白了。

我喜歡竹。竹是常綠的植物，種類達千種之多，大小不一，小竹可做盆栽；大的高達數十公尺，高插雲霄，可以遮天蔽日。

竹的用途廣大，可用作建材，做樂器，造農耕器具，造紙的原料等。除實用價值外，竹被隱喻為有氣節的君子，與梅、蘭、菊並稱四君子。

「竹因空受益，松以靜延年」，這句話表示其謙虛正直的美德。蘇東坡有詩曰：「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對竹更是作出至高的贊美。

提到竹，使我懷想起中國老作家艾煊。

數年前，在南京大學研讀時，在南通一次文學研討會上，認識了艾煊。那時他是江蘇省作家協會主席。在南通回南京的途中，我與艾老同一車座，有較多的交談。他邀我回南京後，到他家坐坐。此后也就有過數次飯敘聚談。

艾老在文革時曾下放到一偏遠的農村，這農村位於江浙與安徽交界的山區，以盛產毛竹聞名。在秋末的一個日子裡，艾老用了省作協的專用車，請司機載送我們到這山區的農村。

由南京到這農村，車行大半天的時間，還得步行數小時的山路方能抵達。這十多哩的山路，沿途景色絕佳，路兩邊是連綿不斷的山群，曲曲折折的溪流流淌於山澗。一到這山村，望去盡是滿山遍野的竹林。毛竹竹幹粗大，可用來做建材及其他用途，鄉下的農人即靠種植與出售毛竹過活。

高大的毛竹，遮天蔽日，帶來一地的陰涼。即使正午時分，也不覺得炎熱，我們來的時候已是秋末，風一吹起這竹的海洋更覺涼意。

這鄉村是道地的純樸的農業社會。艾老告訴我，在村民能夠回憶的幾百年時間里，全村沒有中過一個秀才，也沒有出過一個大小官員，即使到了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的村民們，女子根本不需要讀書，男子也很少有機會讀書，能讀到初小或高小畢業，可以寫寫便條，就可回家務農了。這裡無人訂報，也不需要看報，農人聽聽有線電台廣播的歌曲，已經是一種享受。

文革時期，艾煊下放到這偏遠的農村，與農民一起幹活。在山腳建一座簡陋的石屋，與家眷數人就在這裡渡過了幾年的時光，那是一個痛苦的年代，多少知識份子被整得死

去活來，被下放勞動避過災劫，已是大幸。至於被關下牢獄或整死的，其中冤情更是罄竹難書。

作為一個老新聞工作者，艾煊在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中已開始出任新華社記者，是中國解放後第一個進入上海的戰地記者，後來轉業到江蘇省從事新聞和文藝工作，一直在領導崗位。艾煊以其豐富的人生閱歷，創作出多部長篇小說。《大江風雷》、《戰鬥在長江三角洲》、《鄉關何處》，已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巨著。然而，艾老的創作業績以散文收獲最大。在「煙水江南綠」總題下，出過多部散文集，《醒時的夢》、《綠醉天涯》、《海之潮》等。讀他的散文猶如迎面承受長江三角洲清涼的風，聞到江南的泥土氣息，甚至聞到碧螺春茶的清香。他以秀麗的文字，沉穩的語調，平實地記敘他的所為、所見、所思，以他的審美眼光和標準從事創作，寫下了一篇篇佳作。

這樣的一位老作家，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以後動盪的二十年歲月中，受到極左思潮的衝擊，長期擱下文學的筆，對於一位寫作人來說，無疑是最大的懲罰。1978年之后，中國的大地展現一番新氣象，艾煊與許多邁入老年的知識份子一樣。生活有了新的轉機。他定居南京，並且出任江蘇省作協主席，在往後的二十年中，有著更好的創作業績。

艾煊帶我到這偏遠的山塢農村，這個以盛產毛竹的鄉區，使我深深體味中國農民艱困的生活，他們默默的生息，為千百年來在曲折迂迴發展的神州大地流下辛酸的血淚，廣大的中國農民，你們何時才能過美好的生活？

我們相約於來年到黃河邊上的中原大地河南、山西等省市旅遊。我於2001年杪重訪南京，驚悉艾老於數月前作右，

讓我悼惜良久。

生也有涯，艾老走完了他曲折與充實的人生道路，像中國同時代許多的知識份子一樣，為中國的自由與富強而奮鬥，進而獻出了生命，我懷想著當年毛竹之鄉的旅遊，懷想起樸實謙和的老作家艾煊，當我翻閱著他贈送的小說與散文集的著作，更加深了悼念之情。



2004年8月25日



## 哲人其萎，我懷何如

～追悼房年勝兄～

房年勝兄過世已一年了，這些日子，我時時想到他都感到難過。2001年10月26日我到吉隆坡出席一項報業研討會，不意晚間九時左右蔡增聰兄從詩巫來了個電話，謂年勝在詩巫中央醫院過世，相信是心臟病猝發所致。

我聽了這個電話，頭部突感發麻，良久心情一直不能平復。那一晚吉隆坡報界同道宴請，前南洋商報總編朱自存與我同席，我隨之告知他這不幸消息，他也很感突然。朱自存是馬來西亞書藝協會主席，年勝則是詩巫書藝協會首任主席，兩人曾見過面。他印象中的年勝身體健朗，不意竟然猝逝，令人難過。

這些日子，我時時想到多年來與年勝過從的日子，二十多年的交往，肝膽相照，彼此間常互訴衷情。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我與年勝合作過一項“古晉華文中學生的閱讀調查”，隨后合撰了一篇報告，此篇報告長文後來收在我的一本著作《文學與社會》。那時我在古晉一家

報社任主筆。他則在一家中學任校長。這之后，他邀我到他出任校長的獨中任教，我只負責教高中部的華文與經濟學。但在這個學年結束之后，我已決定重返香港作研究工作。不料年勝也於同年底辭職，前往汶萊馬來奕中學掌校。

1982年初，年勝接受亞庇建國中學聘請出任校長。我到亞庇時，曾與年勝同訪華北同鄉居住地津橋村，留下一個美好的記憶。

也許是厭倦了外鄉的日子，在沙巴三年之后，年勝返回古晉，稍后出掌石角獨立中學。那時期，我個人生活也有所變動。1988年初，我舉家遷往美里，並在詩華日報出任主筆兼編輯經理。而年勝則受聘廉律中學掌校。兩人又在美里時相過從。

在美里這一年，年勝的日子過得並不愉快，一年之后，他就重返古晉，稍后到詩巫啟德行任職。九十年代中，又重返校園，接掌詩巫黃乃裳中學。以迄最后在任上逝世。

我這樣追述年勝的教學生涯，也可看出他一生執意於為教育獻身。他熱愛文化事業，熱愛教育工作，輾轉於砂沙汶三邦。出任過多間中學校長，但每於三數年時間即離任，這或許是年勝的性格使然，但獨中的校長本不易為，西馬的駱靜山於離任芙蓉中華獨中時，曾說過“獨中校長不是人做的”，引起教育界的慨嘆！

在詩巫生活那幾年間，似乎是年勝一生較為愉快的時期，於工作之餘，他勤於書畫藝術，並曾為此舉辦過個人書畫展，展現了他藝術方面的才能。他下過功夫為詩巫永安亭的碑記作過深入的考據工作，稍后撰述了專書《從永安亭碑記追溯詩巫大伯公廟的歷史》一書。考據的樸學功夫須踏踏

實實，沒有取巧捷徑，這也顯現了年勝踏實的作學問態度。

近些年，我與年勝兄常在詩巫聚首，每每與春富、增聰多位同道飲酒長談，留下愉快的回憶。但年勝竟因心臟猝發遽然而去。我慨嘆年勝過早的逝世，他原可在退休后在文化藝術諸領域有更好的成績，人生的不可測竟至於斯！

今夜我又客居詩巫。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為悼念劉子政先生逝世而舉行一項追思紀念會，我由吉隆坡趕來為子政的學術成就講幾句話。客途寂寥，夜晚拉讓江吹來冷風。想起與年勝曾多次在此相聚，而今他已離去一年，而子政兄又遽歸道山，“知交半零落”，倍增傷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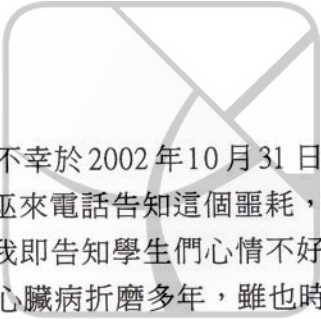
年勝走了，我悲懷不已，爰后寫下一首小詩悼念這位先行的朋友。

人生歧路多風雨，湖海年年西復東。  
多少前塵夢里事，化為秋雨轉成空。  
永安亭外人蹤杳，遺教長留在獨中。  
論舊相惊半為鬼，灘頭無語對黃昏！

註：詩中5, 6兩句，乃敘寫年勝兄曾努力於詩巫永安亭碑記的考據工作，一生長時期為獨立中學華教獻身。

2002年杪

## 追懷劉子政先生



劉子政先生不幸於2002年10月31日午間因心臟病猝發逝世。朋友從詩巫來電話告知這個噩耗，我正在吉隆坡一家學院講課，聽後我即告知學生們心情不好，無心繼續講課。

子政兄已為心臟病折磨多年，雖也時常往醫務所診治，但他似乎無意於繞道手術治理。事實上，現在醫術水準提升，心臟病手術成功率很高，但子政晚年似乎對生命感到壓倦，無意將之治好，最后終因心臟血管阻塞而去。

子政一生熱愛文史研究著述，他除了五十年代在中學教過幾年書之外，就長期在木山營工作，在遠離城市寓居山林的日子，努力收集資料與執筆為文，數十年間，已出版著作近二十部，這些著作乃是他一生的心血結晶。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時期，砂拉越華族史的研究仍然是一片荒漠，作為一位民間學者，一位業餘的研究人員，子政雖沒有受過學院式的專業訓練，但能在前輩諸如許雲樵、連士升等鼓勵下追求與探索，秉其契而不捨的精神，進而在

華族史研究方面，開拓出一片新天地。這已使其令名永誌文化史冊。

我與子政在七十年代相識，那時他到古晉訪問，但也沒有時間長談。他返回詩巫之后，不時來信聯系。八十年代，我主持的「拉讓出版社」，計劃出版「砂拉越文化叢書」，包括文史方面的著作。子政很樂意的交來數篇長稿，我將之選出七篇，定名為《砂拉越史事論叢》。那時期，砂州的出版與印刷條件還很差，因此拉了頗長的時日子政的著作才能問世，我為之很感歉疚。這期間，子政每隔數天即來一封信聯系，我則由於疏懶，每每以電話回覆。子政勤於寫信，可能是他居住山林較有時間通過信函與朋友聯系。七十年代末，我在新加坡與許雲樵見面，他告訴我他一生中與友朋通信，子政乃是最勤寫信的一位。子政過世后，應保留有大量來往信件，不知他的後人如何處理？

九十年代，我因報社工作關係常到詩巫，子政也常回到詩巫處理業務得與之見面，他身體雖無大礙，但煙癮極重，不斷的吸煙以致常有咳嗽氣喘現象。朋友都勸他注意身體，子政除了表示他的身體沒大問題，也常會說出不願活得太長命，透露出一些傷感情緒。這或許他長年在外工作，生活有所變故，加之世態澆漓，而有壓世之感。他在過世前數年已不再寫作，並且將所剪存的資料與藏書，捐贈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設立“劉子政資料室”，這已有終老的打算。作為朋友，我們除了勸他保重，又能作些什麼呢？

子政過世之后，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在同年12月間為他舉行了一項追思紀念會，這是非常難得的。在砂拉越這樣一個對文化人漠視的地方，還能有這樣一場追思會，一方面是

子政的成就，也顯現他在朋友心目中的地位。我受邀為子政的學術成就講幾話。子政雖常感到自己沒有學位而有所不如，但這又何損於他的學術成就。上世紀的五十年代處於偏遠地區的砂拉越，由於客觀環境，又有多少人能到外國受大學教育。但子政一生的努力成果，遠勝於許多擁有高級學位者，與會的朋友都為子政的離去感惋惜，但也為子政的成就感欣慰。

子政已過世兩年，於今墓木已拱。作為一位同道，我只能為他寫下這篇短文。或許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可考慮設立「劉子政紀念室」以供后人研究，並藉之悼念這位砂華族史研究的先行者。

子政兄，你的努力與成就，已為你留下人生的光彩。祝你在天之靈安息！

2004 年杪

# 開拓“華族研究”新領域

～《砂拉越華族史論集》序言

晚近以來，「華族研究」已逐漸成為一門學術研究課題，學者們應用歷史學，社會學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從事這門學問的研究。

華人自唐宋以來即開始遠涉重洋南渡，而以清末民初為移民的高潮，至1950年代之後而逐漸絕跡。此乃導因於中國國內政治局勢變化所致。自有清一代以迄於今，華人南渡移民已歷兩百多年。這兩百多年來，華人對於東南亞國家的發展，貢獻至偉，影響至大。作為移民社會的華人特殊的社會結構，文化形態，經濟生活，皆成為學者們的研究課題。戰後以還，東南亞國家逐漸取得獨立自治權，華人在這社會變遷中，所產生的諸多社會問題，更為學者們所專注。

在「華族研究」的領域里，西方學者早著成績。這一點，戰前東南亞國家，原就是西方殖民地，西方學者在資料搜集以及社會調查具有多種便利。維多·巴素(Victor Purcell)的《馬來亞華族史》(1948)和《東南亞華族史》(1952)，美國的史基

納(G. William Skinner)所著的《泰國的華人社會》以及英國的斐利門(M. Freedman)等人的學術著作，都是這方面的代表。

這幾位西方學者，他們應用社會學的調查方法進行專門研究。他們開始研究時，乃從「華僑社會」的調查和分析入手。華人學者方面，田汝康於四十年代末期南來砂勞越，進行華人社會調查工作，而後所撰述的《砂拉越的華人》(The Chinese Of Sarawak)至今仍然是權威之作。台灣的李亦園教授以人類學所選述的「一個移殖的市鎮」(馬來亞華人市鎮生活的調查研究)，亦是這方面佼佼者。李亦園以詢問法和參與觀察法兩種方法作為主要的調查手段，他所進行的麻坡華人領導層分析，顯得極為深入。

戰後以來，日本的學者群也加入了「華族研究」的隊伍，而且表現極佳。他們的樸學考據功夫，造詣甚深。諸如日比野丈夫的青雲亭研究，今堀城二的基爾特探討（劉果因譯有今堀城二之著），以及許多年青學者輩出。

由於華族移民來自中國，因之在中國本土進行海外「華族研究」，自然更為直接。許多學者的研究成果，吾人已耳熟能詳。然而，自五十年代之後，由於中國政治變化，影響了學者們的研究工作。1978年之後，中國逐漸採取開放政策，因之，海外華人研究再度受到重視。許多大學或科學院都設有這方面的研究所。華南的暨南大學、中山大學與廈門大學，北方的北京大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都設有「海外華僑」研究。這顯示中國對這方面的重視。

在學術領域內，砂拉越華族研究，仍然是年輕的一環。過去西方學者在這方面著力極少，除上面所提及的田汝康博士之外，有之，則是一些殖民地官員的短篇論述文字，以及



外國學府的學位論文。表現較佳的，恐怕還是本土的年青學人。

砂拉越華族研究的成績不夠理想，原因大抵是因華族史料的匱乏。我們所見的文件資料，仍然以博物院所收藏的百年來出版的《砂拉越憲報》最為珍貴，至於英國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所收存的官方資料，至今仍不易獲得。

民間方面，華人社團以及新聞報章，原是這類資料的保藏處。但由於遭受第二次大戰的摧毀，戰前所出版的華文報章已喪失殆盡，這是最令人痛心的。至於華人社團，一向並不重視資料的記錄與保存，以至於不易從此方面獲得研究資料。

為彌補研究資料的不足，學人有必要從田野調查著手，從廟宇、碑銘與木刻以及搜尋散落四方的文獻，包括紀念特刊、圖片、私人日記和信件等。

鑒於早期華族移民文盲率比數較高，他們往往無法通過文字記錄所見、所思、所聞，為彌補這方面的缺漏，口述歷史將可發揮積極的作用。在西方，口述歷史已具有其學術地位，各大學多有口述歷史部門之設。東南亞國家方面，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與新加坡的檔案局，皆設有口述歷史部門。而新加坡的口述歷史活動，在政府協力下，更為積極展開，成就顯著。

據說砂拉越博物館原有口述歷史計劃，但未曾積極展開工作，因之民間社團應有口述歷史的計劃與活動，藉以通過錄音訪談方式，保存歷史資料。這一點，各地的華人社團總會應該負起領導工作。砂拉越第一省華人社團總會有歷史研究組之設，當可在這方面有所表現。

這是一個社會變遷迅速的時代，「華族研究」已顯得益為迫切。我們深知所負的責任，因之不揣淺漏，希望在「華族研究」方面略盡棉力。這本《砂勞越華族史論集》的出版，正是這研究工作的初步表現。

1985年6月

註：本文乃砂拉越第一省華總出版“砂勞越華族史論集”序言。



## 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

～序饒尚東博士著“海外華人問題研究文集”

華人移居海外，源遠流長。“漢書”已有通印度航路的記載，自唐以後，華族南遷，史籍多見。及至宋代，有關華人南渡，已有專著。明初鄭和下西洋，更是中國與東南亞諸國外交往來的盛舉。但華人大量移居東南亞，則是十九世紀之後，清末國事腐敗，民不聊生，閩粵兩省人民大量移居東南亞，迄今東南亞華族的後裔，也以閩粵兩省籍為多，蓋因此。

早年華人南來，主要是謀生，能衣錦還鄉者，固是光宗耀祖之事，但更多的是勞祿一生得以溫飽已算祖宗積德。華人南來，關心的仍是祖國的命運與前途，對居住國，往往處以淡漠的態度；這一方面是十九世紀的東南亞，已成列強的殖民地，殖民地宗主國對華人的歧視與壓迫，難以令華人有歸屬感。

一百多年來，華人對東南亞的發展作出偉大的貢獻，如果沒有華人的勞動力，以及商業和貿易，東南亞實不復有今

日繁榮面貌。新馬的發展與建國，華人的貢獻尤為顯著。馬來半島與砂拉越的許多城鎮，皆是由華人所開闢，華人的斑斑血淚灌溉了這片土地，也繁榮了這片土地。

二次大戰時，新馬華人參與抗日救亡運動，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亞非拉掀起的反殖反帝，爭取殖民地的獨立鬥爭，新馬華人率先參與領導這一政治運動，這反映華人雖也關心中國的命運，更為居住國的獨立鬥爭付出重大代價。

五十年代以後，隨著東南亞華人社會結構的變化，也隨著時代的推移和中國國內政治情況的激變，海外華人的認同觀念已起了根本的變化，這就是從“華僑意識”轉為認同居住國為祖國。從以往的“落葉歸根”觀念轉變為“落地生根”。

華人認同觀念的轉變，他們在居住國爭取公民權，爭取合法的公民地位，乃是一種自然的趨勢。然而，戰後東南亞國家所掀起的土著民族主義浪潮，往往對華人採取忌視的態度，置疑華人的效忠觀念，當這些國家在政治和經濟發展上產生問題或弊病時，華人往往成為代罪羔羊。經濟衝突和反華政治情緒向來都是互為依存，觀乎東南亞某些國家，迄今仍多不公平的政策，不利於華人的政治與經濟發展，也為此等國家制造不安局面，導致經濟衰退，這顯示偏差的政策有必要迅速糾正，從而帶動經濟的發展與政治穩定。

近數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大大改善了它和東南亞的關係，由於中國和東南亞的貿易關係迅速成長，東南亞華人在這之間扮演一個重要角色。然而這種新的局面給華人帶來新的挑戰，他們的效忠問題再次被挑起，一些國家領導人，時而埋怨華人富商把太多的資金投在中國，而沒有顧慮到當地

人的感受。

事實上，東南亞華人只把中國視為一個市場，而非他們祖國，他們的目的不外是賺取利益，理性的判斷和經濟效益的考慮，才是新一代東南亞華人在中國投資的態度。這一切反映出東南亞某些國家仍對華心存有不信任的心理。這種不信任的心態無疑是阻礙了國民的統合。如果要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局面，種族間的互相信賴與依存是極為重要的

華人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的轉變，這是時代的進步使然，也是東南亞華人必然的出路。他們生於斯、長於斯而終於斯。這種對國家的效忠是不容置疑的。近年來，海外諸多有關華人問題的研討會，即曾廣泛涉及此項課題，饒尚東博士在出席有關國際研討會時所提出新的理念與論據，以及他在本書中的諸多篇章，正是表達了東南亞華人的心態與立場。

作為一位人口地理學家，尚東兄近年更專注於東南亞華人社會的研究，尤其是新馬華人社會研究。近年來由於他執教於汶萊大學，他更致力於搜集研究汶萊華人社會史，其專著“汶萊華族會館史論”乃是這方面的開山之作。而他對新馬華人社會的研究，成績更見卓著。本論文集的出版，乃是一個積極的貢獻。

我與尚東兄夙識，近年更曾合作編輯《砂拉越華族研究論文集》，他的勤懇治學態度，對我無疑是一個策勵。

尚東兄作為一個學者，我自然希望他於學術研究之外，也能盡知識份子的言責，他近期在報章上所發表的論文，突顯現出他關心社會，關心人類，這正是一個知識份子的積極行為。尚東兄這本“海外華人研究文集”問世，標誌著他學

術研究的另一成果，以他的學歷與勤奮，更大的學術上收獲，自可預期。我不揣簡陋，寫下這片言只語，互共勉之。

1995年4月 美里  
詩華日報編輯室



# 理想者與實踐者 彰顯知識份子的本色

～序沈觀仰評論集《野地裡的政治獨白》

近年來，我國的華文報章相繼刊行言論版，提供公眾輿論的園地。對華文報章來說，知識性與社會性並重的評論文字，具有啟迪民智，加強社會良知良能的作用，而華文報章也能由此發揮社會輿論的功能。

當然，這裡所指的社會評論必須具有健康的社會意識，公正不阿的立場。而社會輿論素質的提高，正反映出一個社會的健康程度，因為，一個獨裁專制的社會，是不可能公眾輿論的存在。

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一個最完美的制度，也沒有一個最好的政府，因此實行民主政制的國家，容許反對黨的存在。反對黨即扮演著監督的作用，社會評論同樣發揮著督導社會的角色。由此引申開去，一個社會的正常發展與改善，正需要健康的社會批評，倘若諱疾忌醫，必將導致社會腐化而危殆。

誠然，真正的社會評論，必須切中時弊，評論者對現狀

作出建設性的批評，這就難免開罪某些權勢集團或當政者，而由於報章的言論自由仍然有所約制，評論者往往得應用曲筆，難以暢所欲言，這正是社會評論寫作人的痛苦。

一位社會評論者固然需要積極的社會意識，透視社會與人生，這就非有廣博的學識與洞察世態的敏銳眼光不可。作為一個政治工作者，沈觀仰先生的積極“政治參與”，提供了窺透社會各個層面的有利條件，而他的博學深思，令他所撰寫的評論具有深層的意義，從而確立了他在評論界的地位。

年來，我由於在東馬一家華文報紙主持筆政，同時負責言論版，得以有機會時常閱讀觀仰先生每週一篇的評論文字，也時常閱讀他刊登在南洋商報的特約評論。這些評論文字涉及廣泛的課題，但不論是批評國家政策，或是就土著社會文化乃至人生哲理的探討，觀仰先生無不審慎而懇切地提出意見，反映出一個知識分子的特立獨行，以及對國家與人民真誠的愛心。他在〈在自己鄉土上的異鄉人〉一文中寫道：“這份清醒雖然是在自己鄉土上做異鄉人的清醒，但它卻是植根於危機意識，準備承受的清醒，因而它激發之思想創造的欲望，愈加強烈，也許我僅不過在體現令人類追求完形的心理傾向吧了。”他的這種筆鋒常帶感情的文字，表達出一個“政治工作者”清醒中的痛苦。這種危機意識與痛苦，乃是一個知識分子對自己鄉土的熱愛所激發出來的深沉感情。

魯迅在《吶喊》的自序有一段文字寫道：“假如有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



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雖然積極邁向現代化，但社會上仍瀰漫著無知、偏見與迷信，任何一個有良知的社會工作者，不論是從事政治或文化教育，他們應感同身受，為毀壞密封的鐵屋，喚醒昏睡者，即使那是荒野的呼喚，也將會有孤寂的回聲。

就人生的意義來說，每個人有不同層次的看法與追求目標。作為知識分子，不論是積極的政治參與或更高層次的文化工作，都應具有時代使命感。殷海光說“知識分子是時代的眼睛”。希爾斯 (E.SHILS) 所指的知識分子則是社會中一群關心人類、社會、自然和宇宙的人。這麼說來，知識分子不僅必須具有廣博的學識，他更應關心社會，具有促進社會改革超越個人私利的理想，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多年來，觀仰先生以其政治工作的表現，通過文字評論，反映了對社會改革的認知精神，而文字中的感時憂患，關懷民族命運，又何嘗不是體現了知識分子的本色與風骨。

觀仰先生和我以文字結緣，讀他的評論文字，自覺獲益非淺。現在這本評論集問世，我遂不揣簡陋，樂而為之僭書數語，是為序。

## 對人類社會關懷的交匯

～序嚴建安評論集《盡在我言中》



(一)

建安兄的社會評論集《盡在我言中》行將出版，我首先感到的是喜悅。這些文章大抵都在我近年所編的副刊〈論壇版〉刊登過，作為編者，往往是文章的最先讀者，因此說幾句話也未始不可。從建安兄評論範圍的廣泛與深入，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勤于讀書、關懷人民、關心社會的知識份子。

本書所收的文章共分四輯，即政治、社會、經濟與文教。經濟原是建安兄學習的專業，但他似乎更關注于政治與社會，這一方面是建安乃是積極的政治參與者，言論也就不免偏向這一方面。

實際上，一個具有政治懷抱的知識份子，除了務實工作之外，也應同時通過文字對人生社會表達政見。前人有云：“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乃是一個社會改革者最低要求。

## (二)

評論文章在大馬華文報章的湧現，約始於七十年代初期。但在東馬的砂拉越，則要遲至八十年代末之後，這主要是東馬寫評論的作者不多，加之時空的局限有以致之。

當我編言論版時，也常感到稿源的拙缺。因此若要我們去回溯三、四十年代的中國言論天地的寬闊，那種水平高，立論精深的文章，簡直無從比較。但時代的不同，社會的差異，大馬自有自己的天地，評論作者對時事提出評議和論見，在啟迪民智和制造輿論方面，也起著某種程度的作用。

言論是一種民意，在民主國家，問政、言論乃是人民的基本權利。言論批評也具有監督政府的作用，換言之，從言論的自由度和品質，反映出社會的政治和文化，不過就大馬政治現實來看，言論是否具有這種力量，不免令人懷疑。但即令如此，知識人也還能在有限的空間中，用文字表達意見，批評時政，這是另一種問政的形式。

究其實，問政可以通過直接的政治參與，也可以通過文章表達政見，在一個開明的社會，書生論政一樣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只是大馬的種族政治現實，太多的法令箝制，深令論政者氣餒。

盡言責既是評論者的職責，而時事評論者又常以公眾代言人自居，在政治環境諸多限制下，只得運用曲筆，這固然是無可奈何的事。由此反映出大馬有必要進一步開放，使評論者可以向權威說真話，那將是人民最大的喜悅。

### (三)

從建兄評論文章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敢於說真話的知識人。誠然，每個人有其不同的立場與觀點，讀者也不盡然同意作者的觀點，但評論者必須先有說真話的勇氣，這正是讀者對評論者最起碼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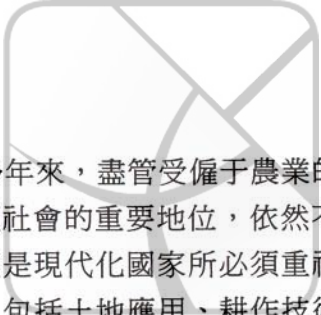
建安兄七十年代在紐西蘭讀書，學的是經濟學，但他更多涉獵政治學的著作。七十年代東西方的冷戰，熾熱的越戰正膠著世人的腦際，世界瀕臨戰爭邊緣，在澳紐深造的亞洲學生，通過學生運動表達了他們對世事的關懷，對國家前途的關心，於是反核武，反饑餓與反壓迫的運動此起彼落，建安正是積極的參與者。畢業之後，他為了深入社會底層，到工廠去體驗生活，這種生活歷煉，開拓了作者的視野，助長了一個知識人的社會改革意識。

本書中的評論文章，作者的眼光不僅僅囿限於華人社會的問題，更多的是議論開闊，題旨廣泛，顯示出一個有理想的知識人的社會意識。

多年來基於職務，讀建安的文章固多，每感於他文字的真誠，這本評論集出版邀序於予，我遂不揣簡陋，樂為之序，謹此，以志墨緣。

# 土地改革與農業生產

~序黃孟祚著《邁向永續農耕》



自工業革命兩百多年來，儘管受僱于農業的人口比例逐漸減少，但農業在人類社會的重要地位，依然不變。因此對農業發展的研究，仍然是現代化國家所必須重視的。農業發展所涉及的廣泛層面，包括土地應用、耕作技術、生態環境保護等課題，都應深一層的研究與改進。

農業生產所依賴的是土地，自古以來土地就與人類的的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一個國家土地改革是否成功，足以影響這個國家的興盛與衰亡。土地應用得宜對促進經濟生產起著積極作用。然而問題在于土地應用的最後決定擁有權，是操在土地擁有者或是政府呢？這就涉及徵用土地，及其徵用標準、程序和監督的機制是否公平合理的建立。

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農業國家，新中國成立之前，土地大部份為地主豪紳所有，農民的生產力受到很大的束縛。中共建立政權之初，開始進行土地改革，可以這麼說，土地改革解放了農民的生產力，中國“以世界耕地的7%，養活了世界

人口的21%”為豪，（中國人口佔地世界人口的1/5），事實應是如此。新中國成立之前漫長的千數百年，農民因缺乏土地耕作，深受地主豪紳壓迫，而不斷發動革命鬥爭，閩粵一帶的農民也多因缺乏土地耕作生活所迫而遠徙東南亞諸國。

在馬來西亞，國家多年來致力於工業發展，農業生產就相對的不那麼受重視，政府這種偏差態度，造成糧食必須依靠入口，一旦遭遇非常情況，勢必增加國家的經濟負擔。1977年中發生經濟風暴，政府鼓勵農業增產，減低糧食入口，從而減少外匯流失，即在於糾正以往的偏差政策。

以人口比例來說，馬來西亞可說是地廣人稀，尤其是東馬砂拉越和沙巴兩州。然而我們注意到砂拉越廣大的華族農民，卻面對缺乏耕地的困擾，以致影響農耕活動與收成。而事實上，砂拉越有大片的政府保留地寧可任其荒蕪，但卻有許多農民缺乏土地耕作望地興嘆。

西馬的華族農民也面對相同情況，根據半島菜農協會的報告，半島有自己土地的農耕者只占11.86%，持有臨時地契者占18.64%，以租地方式耕種者占37.75%，而佔用非法土地者31.75%，這數字反映出農耕者缺乏土地耕種的情況。這種情況反映出，農耕有因缺乏土地，將難以積極進行農業生產，政府必須盡速進行土地改革，開放土地供農耕者申請。

在砂拉越，這個一向以木材採伐與原木桐出口為主的州屬，由於木材資源逐漸枯竭，政府逐漸轉向土地開發，於是土地徵用衍生諸多糾紛，尤其是徵用土著習俗地。鑒於砂拉越土著習俗地法例：徵用習俗地是一件棘手的事，政府對此也未妥善處理，衝突事件於是不斷發生，甚至搞到人命傷亡事件。99年9月間在民都魯烏魯尼亞的命案，可以說是土著

不滿土地徵用最顯著例子，判案仍在進行中。

砂拉越政府徵用土著習俗地，供作大規模油棕種植用途，但它是否能真正造惠原習俗地擁有者呢？倘若單只偏重經濟利益，不顧原住民文化的侵蝕與前景的憂慮，最終使原住民成為城市的邊緣人，而所衍生的不滿，必將導致社會不安，政府土地徵用政策是否應再檢討呢，看來這是無可避免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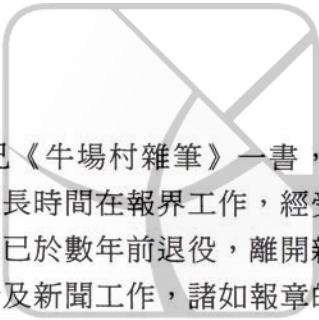
土地徵用應該是雙方都有好處，強制性的處理與單方面的利益，必將導致糾紛不息，農業發展須要土地改革，而改革的出發點應基于全民的利益。

黃孟祚先生在其著作《邁向永續農耕》一書中，探討了土地的應用與農業的發展。長期以來，作者致力非政府組織與環保工作，在其許多論文中，深刻地表達一個知識份子關懷人類社會以及工業化對人類社會多層面的衝擊，這本書展示出作者的深思與真誠的理念。我深深感到在一個人文精神萎落的社會，正需要更多這類勇於追求改革的知識份子。是為序。

2000年6月美里

～序徐然著

## 《牛場村雜筆》



讀罷徐然兄《牛場村雜筆》一書，使我驚覺時間的飛逝。我們都曾經長時間在報界工作，經受過新聞界風雨晦明的日子。徐兄雖已於數年前退役，離開新聞界，但我們在言談中話題仍多涉及新聞工作，諸如報章的新聞寫作、標題用字、版面設計及副刊內容等。此無他，當一個人在報界工作，由青年至中年，這是人生中段最美好的時光，那即使他已退出新聞界，但又怎能忘情過往工作中的辛酸與歡樂？

徐兄於六十年代初，自南洋大學畢業之後，即返回詩巫出任詩華日報主編。中間雖曾短期離開報界，但七十年代末又重返詩華，在美里分社出任主編，報社的地點即是牛場村。

觀其〈牛場村雜筆〉及編輯生涯回憶諸篇章，反映出砂拉越新聞工作者更多的是辛酸的一面。

七十年代末的美里，較之現時九十年代中落後得多。其時美里人口少，工商業落後，雖因石油與木材的開伐所湧現



的生機，逐漸改變了美里的社會面貌，但社會的進步並非短時間所能達成的。在這樣的地方從事新聞工作，資訊與人文的落後，其苦況可知。如苦不是熱愛新聞工作，又何能過這種晨昏顛倒的日子。

在新聞戰線上，要有突出的表現，往往得在一個富有挑戰性的時代。以中國的新聞事業來說，由北伐至中共建政之前，由於中國局勢動蕩，外強侵凌，新聞工作者通過言論呼吁人民抗御強寇，喚醒中國人民保家衛國，這段時期，新聞工作者所發揮的堅苦奮鬥精神，不僅閃耀著時代的光輝，也為中國新聞史上寫下可歌可泣的一頁。

在這二十幾年間，湧現了許多著名新聞工作者，王芸生、范長江、薩空了、胡政之、胡愈之、蕭乾、徐鑄成等輩，在新聞戰線上作出了極大貢獻，也為他們的人生留下光輝的篇章。而大公報、文匯報及新聞報等大報所扮演的角色，不論在社會與文化各層面的建設，都是不可磨滅的。

誠然，在砂拉越這個落後的地方，新聞工作的挑戰遠不如中國，甚至比星加坡或馬來半島也還來得落後。但數十年來，由戰前的新民日報、古晉新聞日刊及詩巫新聞日刊等手抄的報章，而發展到鉛字時代以迄於今進入電腦化時代，這期間的發展與變化，又何嘗不是浸淫了無數新聞工作者的血汗，沒有一磚一瓦，又怎能建成高樓大廈。徐然兄長期服務報界，他的辛酸與歡樂，已化成為一磚一瓦，成了大廈的基石，這又何嘗不是可貴的貢獻。

我與徐兄都曾先後在詩華日報美里分社任職，徐兄在早期的牛場村，而我則在後期的卑雅騷。一九八八年初，我重來到美里，沒想到在詩華日報那一座小樓上，也就過了那麼

些年。我自然深刻體會過新聞工作的艱辛，不論是早年在衛報或是稍後詩華日報任主編，三更雞啼還得在孤燈下編寫的日子，至今記憶猶新。即使如此，在瀰漫著無知與涼薄的社會中，對新聞工作者的回饋是不相稱的。

然而，新聞工作終究有它絕對的社會意義與使命，這正是許多具有良知良能者賴以長期堅持這份工作的原因。

讀罷徐然兄的《牛場村雜筆》，使我感觸良深，這感觸乃發自一個長期過著文字工作者內心深處。承徐兄厚意，囑我為序，我遂不揣簡陋，僭書數語，是為序。



1994年10月下旬

# 放眼紅塵不應有淚

～序許敬平散文集《紅塵有淚》

一九八八年四月，我來到北砂的門戶美里工作，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敬平兄。那時他到砂師訓學院任教不久，一次邀我到學院講砂拉越華族移民史，這之後我們也就常有來往。

敬平畢業於馬大中文系，他的數位授業老師與我稔熟，也許是年齡的差距，與敬平的談話也止於一般的學術範圍。然而，我也因此知悉敬平熱愛寫作，寫的多是散文，也曾偶交了幾篇散文刊登在我編的雜誌。讀了這些篇章，我感到作者在字里行間有著淡淡的哀愁，一個離鄉的知識青年的愁郁以及對國事家事的苦悶情懷。年輕知識份子有著這種情懷是可以理解的，一個有著懷抱的年輕人對籠罩著種族氛圍的國家，本民族文化發展受到壓抑，而政黨政治的傾軋，難免感到苦悶，發而為文，也就不免具有濃郁的愁緒與不滿之情。

散文這種無拘無束的文體，最能直接表達作者的情懷。五四運動以來諸多名家的散文中正反映了當時中國知識份子

對追求理想的迷離與苦悶，何其方，陸蠡，吳伯簫等名家的散文無不如是，五十年代以後，許多中國知青來到香港，他們所寫的散文無不浸染著國愁家恨，司馬長風的大量抒情文字正是此中表表者。

敬平的散文字里行間所具有的愁緒又何異於上述諸家的文字，這種傷情文學正是時代的產物。從敬平的文字中，清晰的坦露感時憂國以及對追求理想的執著。作者以其悠美的文字，文中偶然用些古詩詞，更顯出文氣的飄逸與淡靜。

美里是一個寂寞的城鎮，文化氣息低落，我來美里數年，深沉感到置身在曠野中，曠野的呼喚也難得有回響。敬平在《倦客夢》有段文字：「回首前塵路，暗暗；瞻望紅塵路，暗暗，就如客房內的那一盞花雕床頭燈，孤寂的照亮一角。喜歡在這種氣氛，懷著一種莫明的心情，高處遠眺，想想來時路，任他舊歡新愛，一律煎熬到子夜。」這種落寞的況味，也常在我心間低回。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一個年輕知識份子之所以時常感到孤寂與落寞，乃是因為脫離了群眾與社會，而低徊於自我感情的氛圍，這顯然是不健康的。在一個民主與人權受到壓制，正義難以伸張的社會，知識份子所應扮演的是一個改革者的角色，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發揮有效的作用。作者抒情言志的散文，也應具有時代的使命感。

來美里幾年，敬平卻能在師訓學院教課之餘，積極指導與鼓勵學生從事寫作，壯大寫作的隊伍，這正是一個有志向的文化工作者在文化低落的地方所應負起的社會責任。他近幾年所作文字，已逐漸走出個人圈子，放眼紅塵中的人間社會，這是一個可喜的改變。

敬平的「紅塵有淚」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然而，他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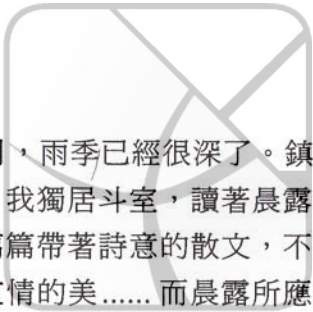
跨出堅實的一步。誠然，作者還須要更多的生活歷練，使文章的內容更具姿彩。我確信，只要他能承受陽光和雨露。溶入迅速變遷中的人間社會，則敬平在文學的成就則是可以預期的。我期待著。

1996年8月美里



# 在荒野中開出文學之花

～序晨露散文集《荒野裡的璀璨》



南國的十月，雨季已經很深了。鎮日雨滴，叫人心頭感到荒涼。然而，我獨居斗室，讀著晨露一篇篇散文，心情卻轉向溫馨。這篇篇帶著詩意的散文，不論是憶舊談今，或憶述父母的愛，友情的美……而晨露所應用深具感情的文字，更增加了詩意的美。

是的，晨露原就有一支詩筆，多年來，她一直都寫詩，偶而改寫散文，文字應用的意象美與情感的抒陳皆具詩境。

讀著她記述父愛的篇章，「一串珍珠」、「阿爸」讓我深有感觸。「船」一文更是意境悠遠……遠遠看看，可望不可觸的一竄淒美的夢，尤其是深夜時分，江霧迷蒙中，船上那一朵燈花，正在低低的訴說著什麼樣的故事哦？……

我突地想起晚唐詩人許渾的詩句：「勞歌一曲解行舟，青山紅葉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還有什麼比站在日暮時分的江岸上，目送所愛的友人行舟而逝，而更使人惆悵呢？

事實上，抒情的散文最能表達作者真摯的感情，沒有真感情的人，寫不出真感情的文章，即使勉強寫出，也是一堆垃圾文字。

中國現代文學家們幾乎都是散文的能手，魯迅，朱自清、郁達夫、徐志摩、何其芳……他們在文學與學術各領域都卓然有成，但在散文方面即使偶或為之，卻都能使人在讀後韻味無窮。這原因是這幾位文學名家不僅是有豐富的學識與見識以及深廣的人生閱歷，而胸中所蘊蓄情感的深厚，更增加了散文的美。

對海外寫作人來說，中國作家的影響是深遠的，寫作人無不是讀著這些先輩的文字成長，晨露也一樣吮吸著「五四」以來中國作家的奶汁長大。晨露告訴我，讀中學時，朱錫煬先生是她的華文老師。她深受朱氏的教導而走上文學的道路。朱先生對中國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有著很好的研究，他教過的學生都能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與朱氏有著多年的同事情誼，那是在他由中學教職退休之後，到來詩華日報任職。有多年時間，我們分擔著詩華日報的社論撰寫工作，雖說我與他年紀相差近二十年，但我仍然常受到他的爽朗與豪邁之氣所感染。我相信在他的教導生涯中，受過他教導的學生，都會與晨露一樣長相懷念。朱氏已於數年前作故令人深深悼惜。

晨露有一支感情的筆，她的散文也多是個人情感的抒解，從中也表達出個人的哲思。雖說文學有其社會的使命感，應該深入到廣眾的社會。但美的文章可以淨化人心，使人產生美好的感覺，同樣可以發揮文學的功能。晨露也還年輕，當她有著更豐富的人生閱歷與見識之後，必能寫出更好

的詩與散文。

晨露的努力，將能在砂華文學的荒野中，開出璀璨的花實，我堅信著。

1998年10月

寫於美里卑雅騷

詩華日報社





# 從廟宇古蹟追尋華人社會的根

～序陳漱石博士、周澤南合著《追根、探緣》

華人從中國來到馬來西亞這片荒漠土地勞作生息已歷數百年。古城馬六甲所留下的遺跡，諸如青雲亭、三保山乃是歷史證物。在其他類如檳城、吉隆坡、古晉等古城鎮，許多古老的廟宇更見證了歷史的發展與社會變遷。作為華裔先民奉祀的宗教場所，廟宇提供了先民精神寄託與心靈慰藉。早期的廟宇也往往是社區中心及鄉親組織的場所。以古晉為例，鳳山寺是閩南人祭祀的廟宇，也是早年福建會館及學子們求學的地方。椰答街的上帝廟同樣是潮汕人鄉親組織與祭祀所在。青雲亭更是馬六甲華人社區中心。

廟宇的四周記錄了先民開荒拓地的史實，而後成為聚落中心。早年古晉以閩南與潮屬人士為多，市中心的商營活動也為這兩屬人操控。幫權結構是古晉早期華人社會的特徵，由於移民群中說不同方言而造成隔閡的格局所形成，不同方言族群的商業活動與聚落也有明顯的區分。閩南人的商業活動在海唇街及友海街一帶，潮屬人士的活動中心則在甘蜜街

及椰答街上段。兩間古老廟宇的周圍即是兩屬人士的聚落中心。

但值得注意的是，鳳山寺與上帝廟時有迎神廟會，其規模之大，幾與古晉區全體華人共襄盛舉無異。盡管所屬方言群各異或奉祀神尊不一，但藉由慶典活動從而把原互不相屬的華人方言群聚合一起，以利華人社會的和睦相處。這種活動，迄今仍歷久不衰，這是古晉華人社會特有現象。

廟宇中的碑銘或建廟徵信錄，提供了研究華人社會的參考資料。古晉古老的福德祠、鳳山寺、上帝廟及詩巫的永安亭，這些廟宇的碑銘與徵信錄，揭示了捐款人的經濟地位以及彼等作為早年華人社會領導層的資料。

盡管廟宇作為歷史遺跡，對華人社會是如此重要，不幸的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許多廟宇遭到損傷，甚至讓位給道路發展或商業大樓的建造，而有些美其名為重建或重修，使廟宇內裡的匾聯碑銘遭到極大的破壞。近期古晉鳳山寺與早些年青山岩的重建，乃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一些不學無術的所謂華社領導人，無視於自家歷史文物的灰飛煙滅舉動，令人慨嘆。

一個漠視本族歷史和古蹟的族群，對歷史的詮釋將趨於薄弱。特別是處在一個多元種族社會，對一個人口相對減少的民族是非常不利的。

陳漱石與周澤南訪求全馬的諸多古老廟宇宗祠，以此來追尋華人社會的根。多年在炎陽烈日下，或在破屋古廟裡，出入塵囂之中，揮汗操勞，而後以田野訪求所得，參照相關資料，加以論述。這種精神，令人嘆服。

筆者作為華族歷史研究的同道，樂意看到此書的出版，也等待著彼兩人論述廟宇與教育關係另一著作的問世。是為序。

2003年（癸未）·端午



～序蔡宗祥著

## 《伊班族歷史與民俗》

晚近以來，不少人類學者著眼於土著社會的研究。就這方面來說，國立台灣大學的人類學系以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著力甚多，對台灣高山族的研究已取得豐碩的成果。

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土著社會的研究無疑是可以得到極大的啟示。

傳統從事人類學研究的人有種不成文的規矩，即是首先要選擇一個「異文化」的民族作為實地田野研究的對象，從異文化的體會中瞭解文化的基本法則，然後再回頭來研究本民族的文化，或從事比較文化研究。台灣多位人類學者，依循這條道路，在研究上有著可觀的成績。

砂拉越是個多元民族聚居的地方，在那茂密的叢林裡，居住著超過二十種以上的土著。伊班族不僅是土著人口最多的一個族群，同時是砂拉越最大的民族，與華族、馬來族合為三大民族。對砂拉越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伊班族無疑影響至鉅。因此研究砂拉越的歷史、文化乃至政治經濟，不

能不著眼於伊班族社會的研究。

在英殖民統治時代，研究伊班族歷史與文化以西方學者為多，特別是殖民地政府官員，他們藉諸工作上的方便，對伊班族社會進行深入的研究。但以華文寫作的研究者，在這方面就不多，宗祥兄（山椰）乃是取得最佳成績的一位。

宗祥兄以其公務人員職業的方便，與土著人員多有交往，以及長期在美里省工作（美里省峇南河流域居住著十多種以上的土著），為他開拓了研究土著社會新領域。多年來，他勤力搜集資料，經於數年前出版了「伊班族與拉者王朝戰史」，在這基礎上，他繼續鏗而不捨，進行田野工作，寫下了大量有關伊班族歷史與民俗的文字，這本新著的出版，正標誌著他在土著社會研究方面的可貴收穫。

在砂拉越，從事學術科研乃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非在文化上具有雄心者不為之。這原因是文化的傳承與推廣得靠有識之士推行。宗祥兄以其一向勤奮的工作態度，必將能在土著社會的研究，乃至本民族文化的研究邁步前進。

1992年4月

## 衝出雲霧迎向朝陽

～序煜煜散文集《迎向朝陽》

在汶萊與砂拉越的華文文壇上，煜煜是一位勤奮的文學工作者，她利用教學之餘，默默耕耘，除了寫下數量可觀的短篇小說，同時寫下許多清新可喜的散文。收錄在《迎向朝陽》一書裡的散文，表現出作者對至善至美的追求，也展現了作者在面對逆境時跨著堅毅的步伐迎向太陽的勁力。

散文是情理傾訴的藝術，作者可以通過敘寫一段回憶，一段思念或感想，它是思維活動的實錄。現代文學把散文分為“抒情散文”和“小品散文”。煜煜的散文大多是抒情散文，從情感的漩渦中發掘靈思，寫下情理交投的作品。

親情、友情，和對人類的感情，是煜煜大部份散文的主題。她對筆下的人物、父母、兄弟姐妹、朋友，無不流露出真摯的感情。由於作者父親早年身故，因此他寫下不少篇章表達對父親的懷念。

在〈親恩〉一文中，作者寫道：

今天是父親節，我對父親的思念越發深切。坐立難安，

心情更加沉重。走進廚房，見母親默默地準備著晚餐。“媽，您休息一下，我來幫您。”母親望我一眼，無言。我卻發現母親眼角濕潤。一陣心酸，我不禁熱淚盈盈。

在同篇“文章”中，作者敘寫父親給她的鼓勵與勇氣。“傍晚收工後，乘一夥人等著吃晚飯的空檔，父親要我採指定的幾束紅毛丹給他們品嚐。我抬頭往上望，那深紅色的果實藏在樹梢末端的枝葉間，風吹樹擺，若隱若現，父親打趣地：“敢敢爬上去，若跌下來我會接著。……終於把紅毛丹全採下來，贏得樹下眾人高聲歡呼喝采。這份“榮譽”，我迄今深印腦際。父親的鼓舞與賞識，另一種定義是培養了我克服困難的信心。”

父母之愛原都是偉大的愛，寫母愛的文章固多，但朱自清的〈背影〉對父親的深摯懷念，已成為散文名篇。煜煜對父愛表達的真摯之情，又何嘗不是海外文學中的佳構。


生長在一個華族農家的煜煜，對農村、對土地有一份深厚的感情。她長期在汶萊執教的生活，雖然近乎刻板，但卻能由此品味人生。樸實無華的教學生活，作者不忘暇時游覽於青山綠山間，欣賞自然之美。〈清幽伴我〉雖有淡淡的哀愁，但這又何嘗不是人生的另一況味。

我想起了宋人張炎的〈西子妝慢〉一詞：斜陽外，隱約孤村，隔塢間門閉。漁舟何似莫歸來，想桃源、路通人世。危橋靖倚，千年事，都消一醉。謾依依，愁落鶉聲萬里。

孤寂的生活，寄情山水間，樂而忘憂，從而體悟人生的另一面，這是萬丈紅塵以外人生一樂事。何況煜煜的生活正如她在〈享受孤寂〉一文中所寫下的“孤獨寂寞已成了一個虛無的表面名詞，實際上，我對生活感到豐實無比”。

收集在《迎向朝陽》一書中第二輯的報導文學，說明了作者在努力創作之餘，也與同道努力於推動文運的發展。汶萊留台同學會寫作組是一個文學組織，這個組織網羅了大部份的寫作人，積極推動文學工作，煜煜參與這個組織，除了編輯文學副刊，也參與許多有關的文學研討會，書中的報導文字不僅概述了作者的文學活動與社會觀點，更是寫作組多年來活動的實錄。

事實上，一個文學工作者除了勤於讀書創作外，能夠參與推動文運，進而發揮社會改革的功能，這是文學工作者的使命感。我在寫序之餘，也寄望於煜煜能在這方面作出更大的貢獻。



2001年6月于美里



～序黑岩著

## 《各舉門神的風采》

黑岩先生《各舉門神的風采》一書，收集的是近年來所寫的短評雜文與部份有關攝影及戲劇藝術的評介文字。作者是一位具有生活歷練與強烈社會意識的知識人，以其敏銳的觀察，洞悉世情冷暖與人間百態。例如他在「餐草上的友誼」一文中寫道：

有位彼此認識不及三個月的某兄，「友誼指數」隨著熱線上升，原來他是垂青了我那塊後山「不毛之地」，總想以友誼價錢割愛給他，丟下那有這等便宜之事，結果割愛不成，「友誼指數」也隨著陷入低點，餐桌友誼也步入冰河世界。……

這不正是反映了現實社會中，某些利益至上者的嘴臉。

讀他豐采那部份的文章，往往顯出作者對某些社會現象的鞭撻與抨擊。雜文作為一種文體，可以不拘一格，隨心所欲發揮開去，對黑暗勢力的鞭撻，對不良社會現象的抨擊。這正是一個具有社會良知的知識人所不能推卸的責任。

黑岩先生同時是一位戲劇藝術工作者與攝影名家。收集

在本書後半部「日落的掌聲」的有關文字，說明他長期以來對戲劇舞蹈藝術的關愛與期待。作為一位戲劇工作者，黑岩在五六十年代初曾在拉讓江中區的詩巫省參與話劇的演出與導演工程。那個時期，正是左翼文學藝術蓬勃發展與收穫的季節。話劇工作者通過舞台表演表達對現實社會的不滿與抗爭。盡管其所表演的劇本多來自中國與新馬劇作家的作品，但卻能在不同時空下對砂拉越劇壇發揮了顯著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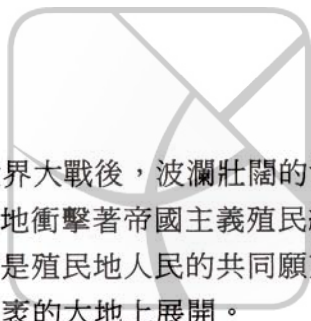
在砂華文學多種類型（詩歌、小說、散文）的創作中，戲劇創作是較弱的一環。但舞台話劇的演出卻曾在文藝活動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二戰時期的抗日救亡運動，以及戰後反殖運動中，話劇演出有過特出的表現，只可惜這方面的資料收集與撰寫工作都作得很少，我很希望黑岩先生能在這些方面作出努力。

本書有不少篇章曾對五六十年代左翼運動作出片斷的回顧，「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文即是。參與過五六十年代左翼運動的年輕人，都曾熱烈的追求著一個理想，有不少朋友甚至犧牲了生命。盡管這理想終至于幼滅，但參與過這一運動者都會珍惜這一段過去的歷史，有那一個熱血青年能無視於社會的黑暗與醜惡，而自囚於自己所築造的夢幻牢獄中？社會的演進往往是迂迴曲折的，沒有過暴風雨的洗禮何來晴朗的天空。又有誰可以否定二戰後新馬兩地爭取獨立鬥爭運動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有心人應寫下這歷史的一頁，別讓它受歪曲乃至於淹沒。

讀黑岩著《各舉門神的風》，使我深有感獨，從而寫下這簡短的感言，是為序。

# 不容青史盡成灰

～序于東著《風雷激蕩的歲月》



二十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波瀾壯闊的世界性民族解放運動，一浪高過一浪地衝擊著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這是殖民地人民的共同願望。反殖反帝的運動由此在東南亞廣袤的大地上展開。

經受過英國長時期殖民統治的星馬婆（汶萊、砂拉越、沙巴）在戰後所展開的獨立運動衝擊著殖民統治政權。儘管砂拉越位處婆羅洲的一隅，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戰後這股政治思潮的衝擊。公開政黨的成立，砂共武裝鬥爭的展開，為此寫下血淚長篇。

五、六十年代的砂拉越，學運、工運、農運已蓬勃發展，爾後公開政黨的成立，顯示出左翼運動的力量。然而，1962年12月8日汶萊人民黨武裝起義，導致英帝國的鎮壓以及之後連串大逮捕，不但波及砂拉越，甚至將之逼上另一條道路，砂共由此展開武裝鬥爭，從而寫下歷史另一篇章。

歷史的發展往往不由人的意志所左右，許多不可預測的

事件也由於某些突發事件導致它的曲折發展。倘若汶萊人民黨當時不發動武裝政變，砂、沙、汶會走向一條怎樣的政治道路？

### 砂共歲月

數十年後的今天，一些秘密文件顯示，汶萊人民黨的起義，或許是英美間諜在幕後策動，因為它由此可以對汶萊及砂拉越左翼運動展開鎮壓撲滅，讓馬來西亞的成立步上坦途。這固然有待進一步的資料研究，但汶萊人民黨的這場武裝起義，的確使砂拉越的獨立運動走上更曲折艱苦的道路。

砂共成員1963年初潛往印尼接受軍訓，準備武裝鬥爭。其時在砂拉越土地上正展開大規模反馬來西亞計劃，印尼正值蘇加諾當政，印馬對抗給予砂共一個較寬鬆的天地。然而，1965年9月30日印尼一場政變，確立了蘇哈多的軍事統治。

局勢突變。砂共成員被逼潛返砂印邊境，爾後更潛返砂拉越境內，繼續展開武裝鬥爭。數年之內，武裝鬥爭一度發展到高潮，使政府軍疲於奔命。但不可預測的終於發生，1973-1974 的斯里阿曼和平行動導致砂共勢力趨於式微。

雖然以後在「出多留少」的政策下，森林里仍然潛存著一股武裝力量，但時不利兮，時不我予的情況下，1990年與政府和平談判，全部卸下武裝，走出森林，正式結束了這場歷時三十年的森林里的鬥爭。

于東先生所著《風雷激蕩的歲月》，記述這場鬥爭所涉及及的學運、農運與民運。我讀完這本書，深有所感。對在那

場動蕩歲月中，許多勇士由此為理想而犧牲了自由與生命，致以默默的悼惜。

理想是一把火，在那煉獄的時代，多少青年懷著一個理想，拋頭顱，灑熱血，投向一個不可知的未來。儘管這場鬥爭的結局是如此無奈，但他們的血已澆出獨立之花。正是那股反帝反殖的浪潮，數以千計沛然莫之能御的勇士，使這塊土地掙脫英國殖民地的枷鎖。就這點來說，馬共與砂共的鬥爭在歷史進程中，已扮演了積極的角色。

這場武裝鬥爭的結局，自有它的多種因素，或許可說是歷史的必然。但它的影響卻是如許的廣泛，因之有人要通過文字記述，讓歷史的另一面真實存在。近年來，這類著作在東馬兩地陸續問世，這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于東先生所著《風雷激蕩的歲月》，自有其價值與意義。我期待著更多同類型著作的出版，以免青史盡成灰，是為之序。

2003年8月

于吉隆坡

～序方竹詩集

## 《明月石上流》

方竹先生交來《明月石上流》的詩文稿要我寫篇序，已有一段時日，由於我在吉隆坡的大專學院教課一拖就是半年，心裡深感歉意。

詩與文原是不能分開，要寫好詩，先得寫好文章，古來的詩家都是能文之士，但現時往往有一種反常現象，一些文章的基本功都還未能掌握好，即先開始寫詩，寫出來的也就不知所云，真不知為何要如此浪費筆墨。

方竹寫詩寫文，已有頗長時日，他在現實生活中有所感悟時，往往發之為文，這一方面是人生閱歷，以及對文學的認識。他固然寫些與居住國汶萊有關的文字，但對世界所發生的事態也予以關注。例如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結束了百年殖民地統治，他有感而發寫下了〈重復，再重復這故事〉：

這故事是一百五〇餘年民族恥辱

國家受不平等條約說不出「不」  
爺爺抬不起頭挺不直脊骨生存  
爺爺在自己國土上向洋鬼點點頭  
有苦有恨淚水往肚內流  
誰叫自己窮讓八國分割

我胸中燃燒著一股火苗  
兒女今日開始對洋人說『不』  
孫兒們將指尖指向他們說『不！不』  
挺起胸膛昂首走向世人面前  
平等是我們對世人誓言是『承諾』  
重復，再重復我祖先的故事

詩以言志，表達了海外華人的民族感情，對中國富強的寄望。實際上，這也是海外華人普遍上所具有的民族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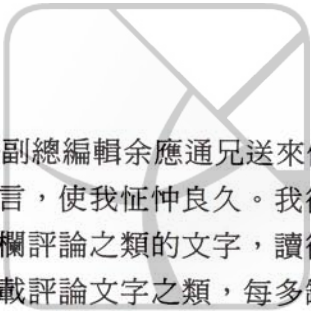
從另一個層面來看，文學工作者的視野與自己所處身的國土是不能分開的。汶萊是一個小國，人口不多，靠石油生產而富裕，在這寧靜的國土上，文學作品的視野都不免有所局限。如何開拓新境界，這應該是汶萊文學工作者努力的方向。方竹有著長久的寫作經驗，我寄望他會有更好的成就。是為序。

2002年8月1日

于吉隆坡

～序何春萍評論集

## 《萍水相逢》



《國際時報》副總編輯余應通兄送來何春萍的書稿，要我讀後為之寫篇序言，使我怔忡良久。我從報界離休之後，偶或讀報，但對專欄評論之類的文字，讀得不多。砂州華文報章雖偶或也有刊載評論文字之類，每多缺乏社會意識。甚或寫些身邊瑣事，過目即感厭煩。

然而，翻閱春萍這數十篇感言式的評論，卻有不同的感想。作者雖或也寫身邊瑣事，但更多的是觸及社會文化課題。儘管也還年輕，但由於新聞採訪工作，擴大了視野，寫起評論來也就能得心應手。

誠然，真正的社會評論，必須切中時弊，評論者對現狀作出建設性的批評，敢於說真話。不過就現時報章的生存環境諸多制約，難以暢所欲言，這正是評論寫作人的痛苦。

春萍初入報界，即能有相當表現，不論是採訪或寫評論，感性文字或理性文字，思緒論理明晰，這是難能可貴的。



學而后知不足，春萍於年前毅然赴台灣深造，進一步探求學問，這證明他的好學，與一些不知進取的同學實不可同日而語。我期望春萍的努力開拓前景，此後或再繼續新聞工作有更好的表現，由此樂而為之僭書數語，以為之鼓勵，是為序。

寫於 2003 年 11 月 16 日



～序張野波著

## 《風水叢談》

風水之學，其說也玄，但玄中自有其科學根據。究其實，風水與環境原出一轍，以居住環境論，倘若居地湫隘，陰氣濃濁，居者不順可以預見。而設若居於危崖山邊，沒有安全之感難有好氣運。風水者，求氣之通，理之順也。

中國風水之學淵源於易，談風水離不開易經的道理，易經蘊藏世上最高深的自然人文科學及物理哲學，可以說是萬學之精華。

孔子曰：「仰以觀于天文，俯于察地理，且以知幽冥之故。」又曰：「易之為書也，廣大博悉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仁者要山，智者要水。」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由上引先聖之言，可知堪輿乃天道與地道兩相配合之學說，而此學說自有其科學之依據也。

宇宙天地間，表面似乎平靜，事實上是永遠處於動態之中，可說是靜中有動。人身為一小天地，亦是同理。大地表

面上看來是寂靜不動，但是其中有地氣在流動，地下有水在流動，地心有熱力在活動。同樣是靜中有動。所以宇宙天地人事萬物，都是無時無刻不在動。天有天理，地有地理，人有道理，物有物理，事有事理。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們由此悟出天地間的道理。

以大地而言，中國先賢經長期觀察印證，而發現地理風水之學，著書留傳給后世之人，以作為趨吉避凶之人生哲學，故曰：「人法地。」地就是地理風水之道。

視此，風水之學，淵源已久。然江湖術士，則以此詭騙，怪力亂神之說，沾污了堪輿之學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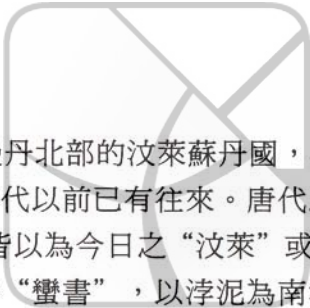
野坡學弟早年習畫於港台，二十多年來已是畫壇名家，但他為探究五術之奧秘拜師名家，潛心研究，早已大有心得，近更發而為文，以深入淺出及實例來說明風水之原委，破解迷津。今刊布《風水叢談》於世，廣為流傳，實乃有心人之所為也！

1996年歲次丙子

# 中汶歷史淵源的見證

～為南京文物局長楊新華教授

《汶萊》書序



地處加里曼丹北部的汶萊蘇丹國，與中國有著很久遠的  
通好歷史。在唐代以前已有往來。唐代以後，史書皆稱之為  
“淳泥”，論者皆以為今日之“汶萊”或“婆羅乃”之古名。  
唐朝末年樊綽作“蠻書”，以淳泥為南海中一大帝國，其勢  
力最盛時，統轄十四省，凡婆羅洲北部之地，包括今之砂拉  
越（Sarawak）及沙巴（Sabah）以及菲律賓南部諸島嶼，皆為  
其統治範圍。

自唐以還，淳泥屢遣使人貢中國。宋代史家趙汝括在其  
著作《諸蕃志》一書中（成書於公元1225年），對淳泥與中  
國貿易情形，有頗詳盡之描述。

明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後，首先即擴展海軍，添置能遠航  
大海之船艦，預備用來發展沿海貿易和宣揚國威。他一方面  
派遣艦隊遠航南洋，到蘇門答臘和婆羅洲，力求發展外交和  
貿易關係。由於明代初年這一連串的努力，其后十年乃有市  
舶司之設，而東印度之貿易也有顯著之發展。然而，到了十

四世紀末期，到中國朝貢的使者卻逐漸減少。明代史籍記載：為了重振國威，朱元璋在洪武初年，即“派兵攻打位於蘇祿與爪哇附近之淳泥，成功而退……”（見《明史》，卷二二五“蘇祿”條。）

十五世紀明朝永樂帝時與海外接觸最為頻密。自1405-1433前後28年間，明朝派遣三寶太監鄭和七下西洋。所到之處，包括馬六甲西部及印度洋，最遠到達阿拉伯半島及非洲東岸。據說鄭和下西洋途中，曾兩次道經婆羅洲，其部份隨行人員曾停泊於此，則是完全可能之事。在1405年鄭和第一次遠航之後，淳泥王麻那惹加那（Mavajakali）遣使入貢中國，明史對此次入貢事有云：成祖為懷柔遠人，特賜麻那惹加那“淳泥國王”之封號，並親贈國書，附以印信。淳泥王甚喜，親自於三年後即1408年偕王妃、子女、隨員一百五十餘人到中國朝貢，受到明成祖朱棣熱情招待。不幸的是，麻那惹加那此次訪問中國，未及回國，即客死南京。明成祖以王禮將這位國王葬於南京城外之石子崗，墓冢至今仍存，這是中國和汶萊友好交往史上重要篇章。南京文物局局長楊新華先生多年來，依據大量史料，詳細記述了麻那惹加那國王古墓的發現，並以此成書《淳泥國王墓探源》，對中汶兩國友好交往歷史作出有價值的考證。

事實上在汶萊首都斯里巴加灣早年即曾發現“宋碑”，其碑文為：“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應甲立”。說明在南宋（1127-1279）時，已有中國人到此經商居留。在汶萊，有一條“王總兵路”（一說是“王三品”路），這和鄭和下西洋有關。鄭和的船隊到過汶萊，王總兵應是船隊的領航人，當地人民為了紀念這位航海家，修建此路作為紀念。

2004年中，楊新華先生帶領數位南京文物局工作人員重訪汶萊首都，對新近的汶萊發現的一些唐宋時期所遺留的陶瓷、古錢幣等出土文物作過精確的考證，進一步說明中國與汶萊的貿易往來已有久遠的歷史。

歷史發展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傳統友誼和合作關係進一步得到發展。中國和汶萊也於1991年9月30日簽署聯合公報，兩國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此后兩國領導人時有互訪，加強彼此間的合作，對東南亞的穩定與世界和平起著良好的作用。

1997年，我到南京大學作訪問研究時，初次認識了南京文物局局長楊新華先生，在數次酒敘交談中，知道他曾訪問過汶萊，並對汶萊國與中國的歷史淵源有過深度的研究，《淳泥國王墓探源》一書，乃是這一方面的學術成果。除此，他對鄭和研究也下過很深的功夫。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外，他對南京的文物之調查研究和保護作了大量工作。其所編著的《南京明清建築》及《南京民國建築》兩巨冊，圖文並茂，付出精力之艱辛，令人感佩。

現在，楊氏新著《汶萊》一書，行將面世，這是他的另一學術成果，兼具學術意義和社會意義。本書對促進和加強中汶兩國友好關係應能發揮積極的作用。我在拜讀本書之後，自覺得益良多，樂為之序。

2004年10月8日  
於馬來西亞砂拉越寓所

## 附 錄

# 讓歷史告訴現在和未來

——讀田著《砂拉越華人社會的變遷》

南京 ◎ 韓雪臨博士 ◎

我們的生活從來不是簡單地呈現在一張白紙上，在出生的剎那，就已經烙上了種族與民族的印記。每一個族裔、每一個社群都有自己的民族集體共同記憶。作為華人，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應該是我們共同的顯在特徵。華人的文化則在千百年的戰亂、徵服、遷徙的過程中從來不曾被磨損過，經歷了歷史的淒風苦雨之後，它用它的韌性堅持著存在，用它對別族文化的兼收並蓄頑強地發展著。自古以來，中國南方各省人民由于戰亂和貧窮，赴東南亞各國墾荒謀生，他們走到哪里就把中國的文化帶到哪里，那時，他們還期待著“葉落歸根”，戰后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很快地在居住國歸化，由“葉落歸根”而“落地生根”。對於年長一代，對他們而言，要完成政治身份認同情形顯得稍微複雜些，對年輕的生于斯長于斯的他們而言，這種身份認同則簡單得多。但是在全球一體化的語境下，民族集體共同記憶常常在全球化的態勢中隱退到后場，從這個方

面來說，全球化對少數族裔，對弱勢族裔的文化而言不啻是一個夢魘，民族身份認同感再一次受到挑戰，文化身份的識別問題又進一步進入我們的視野。“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又要到哪里去？”這是一個對現代人生存困境的天問式的表達，它同樣表述了現代人在面對全球化的文化語境時對自己民族文化如何進行審視的迷思。催人思考如何讓本民族的文化和習俗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在場而不致迷失，思考如何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認識你自己”是人類有自覺以來一個恆久的命題，對於年輕一代的華人而言，如何從文化上確定自己的身份，必須通過對歷史的追尋、溯源才能夠實現，也即尋找自己的文化之“根”，方能進一步認識本民族文化在一定地域內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田英成先生的《砂拉越華人社會的變遷》一書在這些方面呈現了獨到的思考。

田氏早年是以詩人的身份登上文壇的，早歲他出版《子夜詩抄》(1965年)后“自七十年代以來，我即開始對砂拉越華人歷史及社會結構進行資料搜集與探詩”，此書刊行之前，于1977年田氏已經出版了該研究課題的階段性成果《砂拉越華族社會結構與形態》。但該書距《砂拉越華人社會的變遷》刊行的1999年已逾廿載。唐人詩云：“十年磨一劍，雙刃未曾試”，田氏此作可謂“廿載磨一劍”了。此書的序言中，田氏回顧該書的寫作：“奈何生活迫人，缺少時間進行系統的撰述”，“1988年我來到北砂美里，負責詩華日報的編務與社論撰寫，精力幾已用盡，間中只能作些短文”。時至1997年，他又赴南京大學進行訪問學者的研究工作。也就是說，從七十年代末期以來，本書的撰述經過了兩次較長時間的中斷。又從該書封面的創作履歷可看出：自六十年代



中后期以來，田氏經歷了一個由充滿激情能在子夜賦詩的詩人、乃至今天的華人歷史研究的學者這一角色轉換的過程。

廿載一書，使搜集的史料能夠在現實的時空中發酵，從而去粗取精，使作者在引用史料的時候翔實、審慎、精確，從而使作品含英咀華。對於田氏而言，出一本書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難能可貴的是他面對所研究的課題能夠“暮色蒼茫看勁松。亂云飞度仍從容”，在此二十年的研究和寫作過程中，他個人與外在世界都經歷了一個激變的時代，卻拿出和別人比“慢”的精神，且“慢”而不“怠”。即便是在南京訪學期間，他也念念不忘與大陸學者切磋交流，專程赴上海拜會砂華史專家田汝康先生，所謂“慢工出細活”不過如此了。其中，更讓我有所感觸的是，在進行這項研究的時候，田氏完全奉行了學術自由的原則。在此書撰述期間，田氏是完全利用自己的業餘時間進行的，並且不隸屬於任何學術研究機構，不歸屬在任何學術制度範圍內。在全世界學術研究越來越制度化，越來越官僚化的今天，他的做法讓每一位處于學術制度中的人都應該感到汗顏。田氏從事這項工作完全本于內心深處對中華文化的熱愛，它已經超越了世俗層面的功利意義，表徵了學術走向民間。這大概是他在學術制度化的今天。在倉促而浮躁的時代面前敢于“比慢”的原因之一吧。

田先生于南京訪學期間掛于胡若定教授名下，我因是胡先生的弟子而得緣與其相識。后來他與我們一班年輕學子、詩人、作家成為好友。論年紀田先生是我等長輩，但他在我們面前從來不端長輩架子，極具親和力。大概因為他是詩人的緣故吧，詩人總是率真的，熱情的。不過，從他的創作履

歷來看，那時他已進入了學者的角色。這和他的作品的轉型不能說沒有關係。在現實生活中，詩人和學者代表了兩種生活形態和思維方式：詩人感性，學者理性；詩人靈感來時如火山爆發，學者“板凳一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由詩人而學者，是不乏其人的。在中國現代史上，王國維、郭沫若、聞一多是極為成功的例子。但這幾位詩人作為學者的成功和他們的精神氣質息息相關，詩人氣質直接推動了他們的學術研究。詩人大抵敏感而執著，田氏對華社變遷的關注恰說明了這一點，數二十餘年而不改其志。

詩人的細膩和敏感也滲透到對具體個案的研究中，他能于細微處見精神，發常人所未發。綜觀全書，田氏主要進行個案的研究。近年來，對歷史的研究也引發了許多的爭論，但有一點不容質疑，歷史應包括史料和史實、史識。歷史著作的敘述不外在這三者之間進行平衡，從而形成各家史著的特色。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作者前后花了十年左右的時間專司資料搜集工作。在內容上，避免了大而空的“宏大敘事”。華人在整個東南亞各地都有分佈，但作者緊扣自己所居住的砂拉越地區華人進行研究，這樣就使研究的範圍進一步縮小。在砂拉越地區華人的研究中，他首先著手從單一籍貫華人移民的移殖來進行，如《砂拉越福州人的移殖、經濟活動與社會組織論析》，或者從一個華人鄉鎮的演變入手進行對華人社群的研究，如《馬魯帝華人社會的變遷》、《一個客家村鎮的社會變遷》。從題目看，切口比較小，“小題大作”，使研究不至于蹈空，問題能夠說得透，說得清。

當然作者的敘述不僅于此，作為用華語寫作的學者，來自于中華文化的史學傳統也在在滲透于作品中。如《砂拉越

福州人的移殖、經濟活動與社會組織論析》、《砂拉越華人政治演變》、《戰后砂拉越華人社會的變遷》。其中敘述上“以史證論”，“論從史出”，使材料本身說話，觀點從材料中來。其中的許多資料來自于自身的經驗研究。

在考察社會變遷的時候，田氏對自己的詩人式的激情是擯棄的，他的語句和敘述顯得極為克制和內斂。在行文中，作者首先徵引大量的史料、圖表，通過一系列的數據來考察華人的變遷，以及華人在歷史的變動中所承受的艱苦和酸辛，“早期砂拉越華人…他們早年飄洋過海，艱苦備嘗投身南洋，最重要的是謀生”，“福州人的勤勞苦幹，從早期落后的農業經濟，跨向現代的工商業經濟，這是一個艱辛的過程。當年黃乃裳帶領屬人從家鄉移民至砂州，如今福州人挾其雄厚的經濟力量走向世界。”他努力不讓自己對華族的熱愛而沖淡文章的理性與說服力量，從而使“變遷史”成為“信史”。一般說來，治史者對同一個學術問題得出不同的結論，不外乎三個原因：一是掌握資料的量與質不同；二是看問題的角度與研究方法不同；三是知識結構與價值體系不同。選擇與完善論據又恰恰是學術研究的難度所在，田氏在這個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身處砂拉越得到資料上可謂近水樓台先得月。其次，身為砂拉越華人，除了在獲取華人歷史的資料方面佔盡天時地利任何的條件外，他的個人經驗也在此項研究中也凸顯了重要的作用，直接導致本書形成自己的學術特色，在對砂拉越華人社會變遷的觀察角度和價值評估上有別于大陸的東南亞研究。他的個人經驗本身也使他的研究有自己的出發點和關注視野：“晚近以來，研究海外華人社會的變遷，大多著眼于人口較多的城市，而忽視了人

口較少的鄉鎮，……這些小鄉鎮基本上是由華族帶動了經濟的發展，進而改變了鄉鎮的面貌。”

在現代社會學研究領域，經驗研究是不可忽視的一種方法。“經驗研究”一般是指通過現場觀察、訪問和社會調查來搜集經驗資料的研究，它有別于“圖書館研究”或文獻研究。前者是直接從研究對象那里獲得第一手資料，而後者則間接地搜集第二手資料。在這一用法中，“經驗研究”包括調查研究、參與觀察和社會實驗。因此，田氏除了大量的閱讀外，他掌握了許多第一手資料，有些更是以自己親自做田野調查而獲取資料。比如：《馬魯帝華人社會的變遷——一個砂拉越華人鄉鎮的考察》、《一個客家村鎮的社會變遷——美里廉律地區的調查研究》。作為生活在多元開放社會的作者，他在研究手段上也採取多元開放的態勢和方法。田氏不服膺于任何學術機構與體系，就使他在研究方法上不以一種方法為宗。文集集中的多篇文章，除採用了社會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外，還運用了統計學的數據比較、圖表等方法。

田氏個人歷時數二十年進行社會調查，結撰此書，讓我們讀者常常思考在文本背后，田氏緣何能夠窮數十年而不捨的潛在動力是什麼？我也曾就這個問題和田先生作過一些溝通，首先他個人經驗中包含著對華社的熱愛，對中華文化的情感，實際上，這大概也是所有落地生根的華人對自己民族文化的情感。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不斷地用史料證實了華人的這種情感，得出結論：“海外華族移民有一個共同特性，即是熱愛民族母語教育，盡管早年在殖民地政府統治下，實施各種殖民地語文政策，華族移民一樣在困境中堅持發展民族教育，讓后代子孫接受母語教育”。

二戰之後，東南亞的華人經歷國家認同的轉變。1950年代後，“華人仍具有雙重認同，他們認同于入籍國，又仍然意識到自己是華人。其中包括從民族觀念中演化出來並曾佔據支配地位的中國民族主義認同。”這種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之間的矛盾直到1955年才明顯轉變。心理上對於這種矛盾的解決在現實生活中還必須仰賴制度的支持，在一段時期內，國家認同常常覆蓋或取消文化身份的認同，因而，華人由僑民而成為合法公民以後，作為現代國家的公民急欲解決的是華人文化身份的合法性地位問題，在多元化的現代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格局中獲取自己的一席之地，田氏這樣論述：“這種思想意識的轉變，使砂拉越華人認真看待居住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教育的發展，對不公平的待遇表達了不滿與抗爭”。在經過漫長的努力和抗爭獲得了文化身份的合法性後，華人公民積極投身到現代國家的建設中。

在這一轉變過程中，田氏經過諸多個案的研究，還發現：早期“移民社會的幫權結構，不僅顯現于各方言群體的鄉團組織，職業結構，也同時表現于教育領域。”“華人是一個喜歡結社的民族。早年華人移居海外，需要同鄉互相扶持照顧，各種地緣性公會于是應運而生。而后血緣、業緣性的公會隨之而來。”然而同宗同鄉的情況在現代政黨政治的衝擊下發生了變化。“傳統的華人社會，在獨立前扮演了樞紐性的角色，尤其在負起代表性的政治責任，通過宗教文化教育的活動，去維持中華文化特性的生存契機更是如此，可以說，華人在馬來西亞的生存與發展，華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時移勢易，華團傳統代表性的角色，正面對政黨政治的衝擊。”政黨以主流姿態取代了華團的地位後，這正

標志著華人面對新的形勢，逐漸融入現代國家體系中。由華人社團進而政黨政治，順利地完成了華人組織的現代化的轉型歷程，儘管實現它的過程充滿了鬥爭、衝突，不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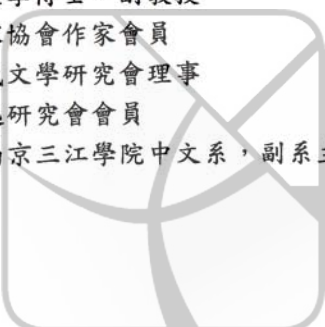
實現由僑民意識到公民意識的轉變，實現華人社團向現代政黨的轉變，這都是順應歷史的潮流的。田氏在著作中也是持肯定態度的。但是，對此對“社會與政治體系，文化體系和心理體系互相推動，加速了社會的變遷”也不無憂患。田氏隱約表達了他對華人傳統文化式微的危機感，傳統與現代似乎是一對矛盾，“隨著教育的普及與傳統文化的沒落，年輕一代將會減少方言的運用，原有的鄉親觀念也隨之淡化，對同鄉會組織來說乃是一種潛在的壓力與危機”，如何維持傳統華人文化和現代馬來西亞社會之間的平衡，既不失民族文化固有之血脈，又不失現代馬來西亞的精神，本書提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課題。

閱讀本書之際，同時可以看出，在結構上作者選入該書的六篇文章中，有過半篇章提到華人重視文化教育，田氏在序言中稱中國為“我的故國”，字里行間洋溢著對中華文化的熱愛。在田氏的視野中，“文化中國”、“中華文化”的概念始終植根在華人的心中，田氏出版此書迄今，代表個別富國利益文化霸權的全球一體化意識甚囂塵上，此書出版的意義也即在此吧：在全球化的語境下新一代華人重新思考華族文化的演變和發展，了解本民族文化存在的意義，識別自己的文化身份，知道自己“從哪里來？現在哪里？到何處去？”進一步認識到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華人于砂拉越乃至整個馬來西亞、東南亞，在追求政治、經濟、文化的平等上走過了筭路藍縷的漫長崢嶸歲月，華人文化終頑強地

日復一日地在那里沐浴著，扎根成長，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逐步發展成具有東南亞特色的華人文化。砂拉越華人對中華文化的這份熱愛可謂“椰風蕉雨中華魂”，為華族文化的發展不懈地努力著，對華族文化的探索“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 【作者简历】

韓雪臨：南京大學文學博士，副教授  
江蘇省作家協會作家會員  
江蘇省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  
江蘇省魯迅研究會會員  
現任職于南京三江學院中文系，副系主任





犀鸟丛书之四十九

# 歲月章回

---

作 者：田農著

---

出 版：砂拉越華文作家協會  
PERSATUAN PENULIS ALIRAN TIONGHUA SARAWAK  
P. O. Box 1356, 93728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印 刷：聯華印務有限公司  
LIANG HUA PRINTING SDN. BHD.  
No. 1958, SEDC Industrial Estate,  
Jalan Piasau, P. O. Box 841,  
98008 Miri, Sarawak.

版 次：2006年5月初版  
國際書號：983405504-8  
定 價：馬幣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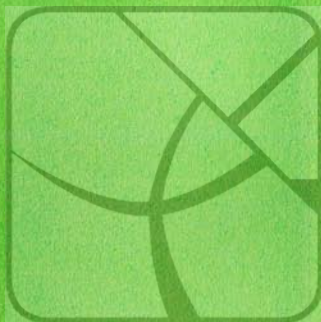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作者已出版著作

1. 香港與中國（特稿） 1965年
2. 中國經濟發展與香港問題探討  
（特稿）（譯稿） 1975年
3. 文章與教育 1983年
4. 中國經濟發展與香港（主編） 1987年
5. 中國與共產組織研究 1991年
6. 中國經濟發展研究論文集  
（劉健儀與博士合編） 1993年
7. 南美的時鐘（特稿） 1994年
8. 中國經濟生物稿 1995年
9. 政論選集 1997年
10. 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 1998年
11. 中國文化論集 2001年
12. 歲月來回 2003年





雁鳥叢書之四十九

歲月華章

作 者 王興雲

出 版 砂拉越華文作家協會

PERSATUAN PENULIS ALIHAH HONGHUA SARAWAK  
P.O. Box 1356, 93728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印 刷：豐華印務有限公司

LIANG HUA PRINTING SDN. BHD.  
No. 1968, SEEC Industrial Estate,  
Jalan Pissau, P.O. Box 841,  
98008 Miri, Sarawak.

版 次：2006年5月初版

國際書號：983403504-3

定 價：馬幣2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作者已出版著作

1. 子夜詩抄（詩集） 1965年
2. 砂勝越華族社會  
結構與形態 1977年  
1991年（再版）
3. 文學與社會 1983年
4. 砂勝越華族史論集（主編）  
1986年
5. 砂勝越共產組織研究  
1990年
6. 砂勝越華族研究論文集  
（與饒尚東博士合編）  
1992年
7. 解凍的時刻（評論）  
1994年
8. 砂華文學史初稿 1994年
9. 政論選集 1997年
10. 砂拉越華人社會的變遷  
1999年
11. 田農文史論集 2004年
12. 歲月章回 2006年



ISBN 983405504-8



9 789834 055042

定價：馬幣20元